



馬恩列斯毛

市  
乙  
合  
四

論農民土地問題

31

31

大岳新華書店發行

MG  
A216  
2

馬恩列斯  
論農地土問題

土地問題研究會編

木岳新華書店印行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3 2169 4146 2

## 例言

農民土地問題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只有正確地解決這個問題，才有可能發動廣大人民的偉大力量，來戰勝敵人，取得勝利。目前各解放區農民正在進行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的鬥爭。我們搜集了這個小冊子，給參加土地工作和研究土地問題的同志們作一般理論的參考。

本書的編輯方法，是按照社會發展的順序，列舉出各個歷史時期農民鬥爭中所提出的問題，以無產階級政黨在不同的革命階級上，對農民所採取的政策，這是想使讀者易於從歷史的發展過程上率研究農民土地問題。從這樣的歷史觀察中，我們看到一個為中國、俄國以及其他國家的農民運動經驗所證明的真理：即一方面說來，在以農民為主的國家，無產階級必須爭取廣大的農民群眾作為自己的同盟者，才能領導革命（無論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好，社會主義革命也好）走向勝利；而另一方面，農民的革命鬥爭，又只有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才能夠得到真正的勝利，才能夠徹底解決土地問題，才能夠達到最後解放自己的目的。

本書的內容，都是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以及毛澤東同志的文獻中摘錄的，主要是直接摘自原著，但有時也摘錄間接的引用文（如列寧引馬克思的文章，「聯共黨史」引列寧的文章），因為這些引用文內容組織得較完整，所以就不再摘原文了。關於中國農民土地問題部分，除摘錄外，

轉印了毛澤東同志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與「農民問題序言」兩文的全文。這兩篇文章解決了中國農民運動的方法和立場問題，研究全文比摘錄更好。

本書的編輯，只限於短時間內手邊能夠找到的材料，因此內容免不了要有許多遺漏。同時材料的編列也難免有不恰當的地方。只能等以後有機會再補充修正了。

編者 一九四七年七月

# 目錄

## 一 封建制度下的農民……………一六

- (一) 列寧、毛澤東論封建剝削底特徵……………一六
- (二) 馬克思、列寧論地租及其各種形式……………一五
- (三) 恩格斯、列寧論農民所遭受的封建政治壓迫……………一四
- (四) 恩格斯、毛澤東論歷史上農民起義及其失敗的原因……………一四

## 二 資產階級與農民……………一七

- (一) 馬克思、列寧論封建財產關係成了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而必須被打碎……………一七
- (二) 列寧論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兩條道路——農民所要求的土地國有和保存農村封建殘餘的土地改良……………一九
- (三) 恩格斯論農民是三次資產階級大革命中的戰鬪軍隊……………二三
- (四)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資產階級在革命中出賣農民……………二四
- (五) 恩格斯、列寧、毛澤東論農民階級的分化……………二六
- (六)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資本主義下農民所受的剝削……………二六
- (七)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農民是一種動搖力量沒有革命的主動權力，必須在無……………二六

農階級領導之下，才能擺脫地主資本家的統治。……四一

### 三 無產階級與農民……………四五一—一三六

- (一) 農民問題的提法……………四四
- (1) 斯大林論農民問題的提法……………四四
- (2) 列寧關於工農革命聯盟與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四七
- (3) 斯大林論俄國共產黨在農民問題上的三個基本口號……………五二
- (二) 聯合農民，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五二
- (三) 列寧論資產階級不能實行民主革命到底；農民能夠實行到底；無產階級必須聯合農民，徹底完成民主革命……………五五
- (2) 列寧論以農民革命為內容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農民革命是民主革命形式之一，無產階級必須領導這個革命……………五八
- (3) 列寧論農民要求土地國有……………六八
- (4) 列寧論土地革命必須與政治革命聯系……………六八
- (5) 列寧論無產階級政黨在民主革命中必須保持嚴格的獨立性……………七一
- (6) 列寧論工農革命民主專政是徹底完成民主革命及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  
唯一保證……………七四
- (2) 斯大林論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農民……………七六
- (三) 聯合黨實行社會主義革命……………七九

(1) 列寧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所提出的無產階級與資產專政的口號.....八〇

(2) 列寧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所提出的土地綱領並論立即沒收地主土地的意義.....八二

(3) 列寧論達到將土地真正交與勞動者的兩種步驟——組織貧弱農與實行共同耕作.....八七

(4) 列寧於十月革命爆發次日所起草而經蘇維埃政府頒佈的土地令——廢除地主土地所有權.....九二

(5) 列寧論社會主義革命在農村的展開——成立貧農會，開展反對富農鬭爭.....九四

(6) 斯大林論俄國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農民.....九八

四) 依蘇貧農、聯合中農、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一〇二

(1) 斯大林論蘇聯基本農民群眾能够被吸收到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一〇二

(2) 列寧、斯大林論依蘇貧農，聯合中農及對中農的政策：不能急躁，不能用強迫手段，要用說服辦法，成立自願的堅固的聯盟.....一〇四

(3) 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對富農的政策.....一〇六

(4) 斯大林論小農經濟發展的兩條道路——資本主義道路與社會主義道路.....一一八

(5) 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經過合作道路把農民經濟納入社會主義建設軌道.....一二〇

(6) 蘇聯實行農業集體化及其偉大成就.....一二三

#### 四 中國農土地問題

(一) 列寧、斯大林論殖民地半殖民地農民問題.....一二七

(1) 列寧論要善於把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應用於農民為主要群眾的國度.....一三七

(2) 列寧論殖民地半殖民地無產階級政黨要與農民建立一定的關係.....一三八

(三) 斯大林論民族——實質上是農民問題……………三〇

(四) 列寧論孫中山「平均地權」的意義……………四〇

(二) 斯大林、毛澤東論中國革命是反帝反封建兩支巨流之匯合。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四一

(三) 毛澤東論中國必須實行土地改革、解放農民及在解決農民民主民生問題上的綱領路線……………四九

(四) 毛澤東論新民主主義的農業發展道路——在個體經濟基礎上實行勞動互助，以提高生產力……………五二

### 附 錄

(一)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五七

(二) 「農村調查」序言（毛澤東）……………六五

# 一 封建制度下的農民

## (二) 列寧、毛澤東論封建剝削底特徵

在研究現代地主經營底制度時，必須以農奴制時代盛行的這一經營底那種制度做出發點。那時經營制度底本質，就在於土地經營底一定單位，即一定的世襲領地底全部土地，會分為兩部份：領主的土地和農民的土地；農民的土地，係交給農民作為分與地，而農民（除此以外，他們還得有其他的生產手段，如森林，有時還得有牲畜等）則以自己的勞動與農具來耕種這塊土地，以維持生活，農民底這一種勞動底生產品，用理論政治經濟學底術語來說，乃是必要的生產品，對於農民既是必要的，因為可給他以生活資料，對於地主也是必要的，因為可給他以勞動力，恰如在資本主義社會內抵償資本價值的可變部份的生產品，乃是必要的生產品一樣。農民底剩餘勞動，則為他用自己的農具去耕作地主的土地；這種勞動底生產品則歸地主所有了。因之，在這裡，剩餘勞動在空間上是跟必須勞動分開了的；給地主耕耘領主的土地，給自己耕耘分與地，一星期之中給地主工作幾天，而其餘幾天則給自己工作。這樣，在此種經營制度之下，農民底「分與地」就成為物品工資（用適用於現代概念的語來說）或給地主保存勞動者的一種手段了。農民在其分與地上的「自有」的經營，會成了地主經營底際

件。其目的不是給農民「保證」生活資料，而是給地主「保證」勞動者了。

我們把這種經營體系叫做賦役制。顯然的，它的盛行，則以下列的必要條件為前提：第一、自然經濟底統治。農奴主底莊園，本身必須是一個與其餘世界聯系很薄弱的自給自給的、閉關自守的整體。特別是在農奴制存在底最後一個時期發展起來的地主，為了出賣而進行的穀物生產，正是舊制被崩潰底前兆。第二、對於這種經營，須要給直接生產者被分與一般生產手段，特別是土地，不僅此也，而且還須要使直接生產者束縛於土地，因為不然的話，地主便沒有得到勞動力的保證了。因之，獲得剩餘生產品底方法，在賦役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之下，是彼此正相反對的；前者是以給生產者分與土地為基礎，而後者則以生產者解除土地為基礎的。第三、這種經濟體系底條件，是農民底個人依賴於地主，假若地主沒有直接支配農民個人的權力，那麼，他便不能強迫被分給土地而進行自己的經營之人替他作工了。因而，像馬克思在評述這種經濟制度時所說的一樣，就須要「把經濟的強制」了。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馬克思將這種經濟制度列在工役地租這個範疇以內。見「資本論」卷三，中文版六七四頁），這種強制形式及程度，可以是極不同的，從農奴地位起至農民的等級制的無權利為止。第四、上述經濟體系底條件及結果便是非常低下、非常保守習習的技術狀態，因為經濟底進行，是在被壓抑、被人格的附庸及愚昧所屈辱的小農手中的緣故。

（列寧：「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列寧選集」，卷一，一三七—一三八頁）

誰都知道，從法律的、行政的和社會生活的觀點上來看，農奴制會是什麼東西了。但是，很少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在農奴制之下，地主與農民的經濟關係之本質究竟在那裡。在那個時候，地主會給農民分與了土地。有時地主還借給農民其他生產手段：如森林、牲畜等等。這種地主土地之分與農民農奴有什麼意義呢？如果以適於現代關係的話來講，那末那個時候的分與土地，就是想當於工資的形式了。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工資是用貨幣來付給工人的。資本家的利潤，以貨幣的形式算出來。

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即償付維持工人生活資用的勞動與給資本家予以無酬的剩餘價值的勞動）結合在一起而為工廠中的同一個勞動過程，結合在一起而為同一個工廠工作日等等。但在力役制度之下，卻不然了，在這裡也有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正如奴隸經濟中的有它們是一樣的。但是這兩種勞動，在時間與空間上，却是可以分開的。農奴農民給領主工作三天，給他自己工作三天，他是在地主的土地上，或者收對地主底糧食給領主工作。他在公共與地上給自己工作，自己給自己及自己家族獲取那為地主維持勞動所必要的糧食。

因之，不論在農奴的或力役的經濟體系之下，或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下，勞動者所獲得的都只是必要勞動的生產品，將剩餘勞動的生產品，即無酬地交給生產工具的私有者了，以此說來，農奴的、或力役的經濟體系是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相同的。不過在下邊的二個關係上，農奴制是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第一、農奴制經濟乃是自然經濟，而資本主義經濟則是貨幣經濟。第二、在農奴制經濟中，剝削底工具，是將勞動者束縛於土地，分與他以土地；但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勞動者是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了。為了取得收入（即剩餘生產物），農奴主在他的土地上須有握有分與地、錢其和牲口等的農民。無地、無馬、無業的農民，對於農奴制剝削是沒有用的對象。資本家為了獲取收入（利潤），却正需要既無土地、又無財產，而不得不到自由的勞動市場上出賣其勞動力的勞動者。第三、領得分與地的農民，必須在人格上依附於地主，因為他握有土地，如不用強制手段，他就不願担任領主的工作了。於是在這裡的經濟制度產生了「超經濟的剝削」、農奴制、法律上的依存性和無權無利等等現象了。反之，「理想的」資本主義，乃是在自由的市場上私有者和無產者之間的契約底十足的自由

（列寧：「十九世紀末期俄國底土地問題」，「列寧選集」，卷一，二七二—二八頁）  
中國封建時代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由以下各個主要特點構成的：

一、自足自給的自然經濟佔主要地位。農民不但生產自己需要的農產品，而且生產自己需要的大部份手工業品。農民交付地主貴族的地租，也主要是地主們自己享用，不是為了交換。那時雖有交換的發展，但在整個經濟中不起決定的作用。

二、封建的統治階級——地主、貴族以至皇帝，他們擁有最大部份的土地，而在農民則很少土地，或完全沒有土地。農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耘地主、貴族和皇室的土地，並將收穫的四成、五成、六成甚至七成，奉獻給地主、貴族、皇室們享樂，這種農民實際上還是農奴。

三、不但地主、貴族和皇室依靠剝削農民的地租過活，而且地主階級的國家又強迫農民繳納實稅並強迫農民從事無償的勞役，去養活一大群的國家官吏及為了鎮壓農民之用的軍隊。

四、保護這種封建剝削制度的，便是地主階級的封建國家。如果說周是諸侯割據稱雄的封建國家，那末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就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仍舊保留着封建割據的狀態。在封建國家中，皇帝有至高無上的絕對的權力，在各地地方設官職以掌兵、刑、錢、穀等事，並依靠地主紳士作為全部封建統治的基礎。

中國歷代的農民，就在這種封建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之下，過着貧窮困苦的生活。農民被束縛於封建制度之下，沒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對農民有隨意打罵甚至處死之權，農民是沒有任何政治權利的。由於地主階級這樣殘酷的剝削和壓迫所造成的農民的極端窮苦和落後，就是中國社會幾千年在經濟上和社會生活上停滯不前的基本原因。

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

而在這樣的社會中，只有農民與手工業工人是創造財富與創造文化的基本的階級。

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 卷二

## (二) 馬克思、列寧論地租及其各種形式

### 勞動地租

地租的最單純的形態，是勞動地租（*Arbeitsrente*）。在這場合，直接生產者，以每週的一部份，用那實際上或法理上屬於他的勞動工具（犁，家畜等等），用在那實際屬於他的土地上，而以每週的同一部份，在地主的土地上，無代價地，為地主勞動。如果我們就這個最單純的形態考察，事情是十分明白的。在這場合，地租和剩餘價值是一致的。在這場合，無給付的剩餘價值，是以地租，不是以利潤為表現形態。勞動者（自給的農奴）在這場合，能在必不可少的的生活資料之外，得到怎樣的餘額，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名稱來說，他究能在工資以上得到怎樣的餘額，在其他情形不變的條件下，要看他的勞動時間，是用什麼比例，分爲自己的勞動時間和為地主的無償勞動時間。所以，必要生活資料以上的這個餘額（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內表現為利潤的東西的萌芽），完全是由地租額決定的。在這場合，地租額不僅直接是無給的剩餘勞動，且也表現為無給的剩餘勞動，表現為生產條件（在這場合，生產條件就是土地，即令不是，它也是附屬於土地的）所有者的無給的剩餘勞動。

5

……在這場合，依照我們的前提，直接生產者佔有他自己的生產手段（他實現他的勞動，要生產他的生活資料，必須有這種生產手段，作為對象的勞動條件）；他獨立地經營他的農業以及與農業相結合的農村家庭工業。這種獨立性，並不因有下述的事實，便消滅。那事實是像在印度一樣，這些小自耕農民會自行組成一種多少帶有原始性的生產共同體。因為，這所謂獨立，是對名義上的地主認識的。在這個條件下，那種為名義地主的剩餘勞動，只有用經濟以外的強制手段（不問它所採的形態是

低級)，方才能够榨出。它和奴隸經濟，或殖民地經濟就是從這一點區別的：即，奴隸是用他人所有的生產條件，不是獨立的。它必須具備人身的隸屬關係，必須在某程度內沒有個人的自由，必須當作土地的附屬物，而不能和土地離開，那末，這必須是嚴格的隸屬制度（Hörigkeit）。假設他們不是隸屬於土地私有者，卻像在亞細亞一樣，隸屬於對於土地所有者同時又為主權者的國家，地租和課稅就會併在一起的，或者說，不會再有和這個地租形態不同的課稅了。在這種情形下，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隸屬關係，就是對國家的巨屬關係，不會在這以上，有更奇詭的形態。在這裡，國家是最高的地主。在這裡，主權就是全國的累積的土地所有權。在這裡，沒有土地私有權，不過對於土地有私人的和共同的佔有權和使用權。

## 實物地租

從經濟學的意義來論，勞動地租轉化為實物地租（*Produktrenten*），並不會在地租的本質上，引起任何變化。這所謂本質，就我們現在所考察的形態說，是由這一點權成的：即，地租是剩餘價值或剩餘勞動的唯一的支配的通例的形態。它還這樣表示：即，直接生產者要佔有他自身再生產所必要的勞動條件，是祇在地租形態上，對土地（在這個形態下，那是一個包括一切的勞動條件）所有者，提供剩餘勞動或剩餘生產物。而在另一方面，它還表示在這個事實上：即，只有土地，是當作他人的所有物，當作人格化為土地所有者的勞動條件，而與直接生產者相獨立，相對待。在實物地租成為地租的支配形態和最發展形態的限度內，前一種地租形態（即地租直接在勞動即直接勞動形態上付納的形態）的殘餘，多少會伴在一起。就這一點說，土地所有者究為私人，抑為國家，是全然沒有關係的。實物地租假定直接生產者已有較高的文化形態，從而假定他的勞動和社會一般的勞動，已有較高的發展階段。它和前一個形態的差別點是：剩餘勞動不復在它的自然姿態上，不復在地主直接的監督和強制下實行，而直接生產者將受精銳的觀察，不受直接的強制，將因法律的規定，不由國家，那樣是，由自己負責

來担一種剩餘勞動。在這裡，剩餘生產（*Meibut-Darfton*），條件是直接生產者必要欲望以上，但在實際屬於直接生產者的生產場所（即由他實際利用的土地）以內，不像前一場合在領土所有地（這種所有地，和他實際利用的土地相並存，並且在他實際利用的土地之外）內進行的生產——已經成爲一種自明的定則了。在這個情形下，直接生產者對於他自己的勞動時間全部的利潤，已經多少可以自行支配了，雖然這個勞動時間的一部份（原來是剩餘部分的全部），現在和以前一樣，要無代價的，屬於土地所有者。不過，土地所有者現在已不能在勞動的自然形態上直接受得這種剩餘勞動了，他只能在生產物（勞動就在這上面實現的）自然形態上，把它取得了。那種爲土地所有者的勞動，會由僱役勞動的管理，引起一種苛擾的中斷。這種苛擾的中斷，在實物地租純粹出現的地方，在僱役勞動仍與實物地租並存但在一年中所佔的時期已經縮短的地方，是消滅了。生產者爲自己的勞動，和他的爲土地所有者的勞動，不復在時間和空間上顯明分開了。不過，純粹的實物地租，雖也能殘存在更發展得多的生產方法和生產關係上，但它依然是以自然經濟爲前提。

由於實物地租的形態（那與一定種類的生產物和生產本身結合着），由於農村經濟和家庭工業的結合（那是實物地租不可缺少的），由於近於完全的自給性（自耕農民的家庭大都是自給的），由於它和市場和生產運動及歷史運動（那是在它以外的社會圈內發生的）相獨立的事實，總之，由於自然經濟的性質，這個地租形態，對於靜止的社會狀態，例如亞細亞的靜止的社會狀態，成了恰好的基礎。在這個形態上和勞動地租的形態上，地租都是剩餘價值的從而是剩餘勞動的通例的形態，那就是直接生產者無代價（在事實上還是強制，雖然這種強制已不復在舊時的野蠻的形態上表現）對土地（必要勞動條件）所有者所必須提供的全部剩餘勞動的通例的狀態。

## 貨幣地租

在這裡，我們說貨幣地租，要和那種以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為基礎的產業的或商業的地租相區別，那是指平均利潤以上的剩餘——是指那種由實物地租轉形而生的地租，像實物地租只是轉形的勞動地租一樣。在這裡，直接的生產者不是把生產物付給土地所有者（不問他是國家還是私人），而是把生產物的價格付給土地所有者。單是一個在自然形態上的生產物剩餘，已經不夠了；那還須由這個自然形態轉化為貨幣形態。雖然直接生產者的生產資料的最大部分，還是由他自己生產，但現在已有一部分生產物要轉化為商品，當作商品來生產了。因此，全生產方法的性質，也多少要發生變化。它把它的獨立性喪失了，它不復再與社會的關係相隔離了。生產成本不在那多少有貨幣支出加在裡面了）的比列，成了決定的了；無論如何，在總生產物中，除了那必須當作再生產手段和直接生活資料的部分，還有一部分必須轉化為貨幣。這一部分，現在是取得決定的作用了。但這種地租（雖然這種地租也正在向着解體的途中）的基礎，還是和實物地租（那是它的出發點）的基礎一樣。直接生產者依然是世襲的或傳統的土佔有者，他依然要為地主（這個最必要的生產條件的所有者）担任剩餘的強制勞動。那是無給付的，無代價的，不過它所採的形態，是已經轉化為貨幣的剩餘生產物的形態了。在前一個形態上，與土地不同的勞動條件，例如農具及其他動產，就已經先在事實上，後又在法理上，轉化為直接生產者的所有物了；在整個貨幣地租形態上，那是更以這件事為前提了。實物地租到貨幣地租的轉化，最初是間或的，此後則多少以國民的規模進行。但這種轉化，還以商業，都市產業，商品生產一般，和貨幣流通，已有顯著的發展為前提，它還以生產物有一個市場價格，并以接近於價格的價格出售這個事實為前提；在前幾種形態上面，就不一定要如此了。……

……貨幣地租同時還是以上考察，各種地租的崩潰形跡。我們以上考察的地租，是和剩餘價值及剩餘勞動顯然一致的，是剩餘價值之通例的支配的形態。

在進一步的發展上，貨幣地租——把一切中間形態，例如小組地農業家的地租，除開不說——不是使土地轉化為自由的自耕農財產，就採取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形態，變為資本主義租地農業家支付的地租。

在貨幣地租發生時，土地所有者和佔有土地耕作土地的農民一割分開的傳統的習慣的關係，必然要轉化為一種契約的依照明支法規來確定的純粹的貨幣關係。所以，佔有土地的作者，就在性質上，成為單純的租地農業家了。這種轉化，一面會在一般生產關係許可的限度內，漸次把舊式自耕的土地佔有者剝奪，而以資本主義租地農業家代替他們；一面又使向來的土地佔有者贖免他的納租義務，並轉化為獨立的自耕農民，而對於自己耕作的土地，享有完全的所有權。實物地租到貨幣地租的轉化，不僅必然會伴有一個階級的成立，並且必然要以這個階級的成立為前提，這個階級就是不佔有土地，為貨幣而出賣其自身的日傭勞動者。……

再者，地租一經換得貨幣地租的形態，納租農民和土地所有者間的關係，一經取得契約關係的形態——這種轉化，在世界市場，商業，製造業皆已達一定的相對的發展階段時，才會成為可能的——資本家租地經營的事情，也就必然會出現。這種人一向是立在農村限制以外，現今却把他們在都市上賺得的資本，把那已經在都市上發展的資本主義經營方法（在這種經營方法上，生產物是當作商品生產的，當作佔有剩餘價值的手段生產的），移到農村和農業上來。

（馬克思：『資本論』。卷三，中文版六七四至六八三頁）

租地在農民經濟上底意義，是誰都知道的。土地底需要，引起了以此為基礎的五花八門的奴役關係。像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的一樣，農民的租地耕種，本質上常常是地主經營的工役制——是領主獲得勞動力的一種奴役方法。因此，我國農民租地底農奴的意義，是用不着懷疑的。不過在我們面前的既是一個國度底資本主義的演進，那我們就應當專門來研究各階級的關係在農民租地中是怎樣表

現出來，並且是否表現出來了？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仍需要關於農民各種經濟類別的統計材料，而不是關於整個農村公社或整個鄉村的資料。舉例來說，比如卡爾什夫先生在「地方自治會統計底總結」中曾承認「自然地租」（即不是用貨幣納租，而是以折半或工役納租），通例是到處比貨幣地租昂貴，並且昂貴之多，有的時候，竟達兩倍，其次，這種自然地租，在最貧窮的一類農民當中發展得最厲害。稍微小康一點的農民，都竭力用貨幣租地耕種。「借戶利用極小的機會用貨幣繳納租金，以便減低使用別人土地底價值。」卡爾什夫，同書二六五頁）

這是說我們租佃制底農奴特徵，把全部重担都放在最貧的農民肩上了。富裕農民力謀解除中世紀的羈絆，只有在他們握有足够的貨幣時，他們才能做到這一點。要是有錢的話，你可以按照普通的市場價格以現款租得土地。如果沒有錢的話，你就受奴役，以折半制的方式或以工役制的方式，以三倍的數目繳付地租。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工役制下的勞動價格，比自由僱傭的價格要低多少倍。

如果有人要問我們，那一種租地在俄國最佔優勢，是糧食的租地呢，還是企業的租地，是因爲貧困而租種的租地呢，還是富裕農民的租地，是農奴制式的租地（工役制或農奴式的），還是資產階級的租地，那麼答案只有一個。就租種土地的農戶數目來看，毫無疑義的，多數的佃農，是因爲貧困而租地的。對於絕大多數的農民，租地是一種奴役。就出租的土地數量來講，毫無疑義的，不下於多數的租地，是集中於組織資本主義農業的富裕農民，鄉村資產階級底手裡。

……貧農不得不以高於平均數三倍的破產的價格去租種土地。富農則很便宜地「躉購」土地，當然，往往以百分之二七五高的利潤轉租給貧窮的鄰居。這裡有着種種租地，有農奴制式的奴役，有愛爾蘭式的租佃，有土地的買賣，有資本主義的租佃制。

（列寧：「十九世紀末期俄國底土地問題」，

### (三) 恩格斯、列寧論農民所遭受的

#### 封建政治壓迫

#### 德 國

諸侯從舊貴族中發生了。他們幾乎脫離皇帝而獨立，掌握大部份的統治權。他們自由宣戰和媾和，他們維持常備軍，召集地方會議，徵收賦稅……就內部言：他們的統治是專制的；僅僅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才召集等級會議（*Reichstag*）。徵收賦稅和搜刮貨幣，只要他們認為適宜「就隨時幹起來」。等級會議對於賦稅的批准權是難得到承認的，實行則更不易了。就是到了召集會議的時候，諸侯們照例佔大多數，因為騎士和僧侶是個個免除賦稅而且分沾餘潤的等級。諸侯們貨幣的需要，隨着奢侈、宮廷和常備軍以及政費之擴大而與日俱增。賦稅成爲有加無已的壓迫，城市在許多場合受着特權（*Privileg*）的保護，所以賦稅的全部重担落到農民身上，不論是諸侯本身下「隸屬」之農民，或是諸侯家臣的騎士下「隸屬」之農奴和奴隸，都是一樣；在直接稅不夠用的地方，間接稅就採用了；財政上厲行竭澤而漁的方法以填滿國庫的漏洞。當無計可施的時候，當無物可以典押和無自由帝國城市允許放債的時候，或鑄造最劣的貨幣，或濫發最賤的貨幣，或專爲諸侯的便宜而抬高或降低法定貨幣的價格。出賣城市的和其他特權以後，不久又用暴力奪回，以達實行出賣之目的；和利用每次反抗的企圖以爲口實，乘機縱火搶掠等等，都是當時諸侯在收入上不竭的和通常的來源。法庭也是諸侯經常的和不可輕視的出賣工具。總而言之：除了「受」諸侯「剝削」以外，還須滿足各種官吏熱望的人民，已經嘗够了

「父權」制度 (Fatherly System) 的味道。……

……騎士「支配下」的人民之供給賦稅，比從前更難。這些尊貴的主人為滿足日進不已的要求，便採用諸侯所實行的相同手段；農民就年年受這些主人更巧妙的掠奪了。農奴「的血液」榨乾了。奴隸在一切可能的機會負擔各種各色的新租稅。徭役呵、欠款呵、地租呵、田契稅呵、死亡稅呵、保護金呵、以及這一類的名目，不管舊時的契約「怎樣」，都是任意增加的。法庭拒絕「人民的陳訴」，或者出賣「案件」以得金錢；在騎士不能從農民手中搜刮貨幣的地方，則不惜把農民下獄，強迫他交納贖金。

一切階級的基础——除了平民反對派以外——是立於大多數被剝削民衆即農民之上的。載着社會一切階層的重担者是農民，這些階層就是諸侯、官吏、貴族、僧侶、閹閹之家和中等階級。無論農民是隸屬於諸侯、帝國勳爵、僧正、寺院，或「隸屬於」城市，他在各處都被當成牛馬，或比牛馬更壞的東西看待。如果他是農奴，那他要完全聽從其主人的驅策。如果他是奴隸，由契約所規定之法律的束縛就可以完全壓倒他，甚至這些束縛一天天加重。他們大部分時間，消磨在其主人的產業上面。從他不多的自由時間之內所得到的東西，又要拿出來繳納什一稅、欠款、地租、戰爭稅、土地稅、帝國稅和其他開支。他不支付主人的錢，不僅不能結婚，並且想死也死不了。除了這些正規的賦役之外，他不得不替其主人收集乾草、摘莓、採橘、收集犒牛穀、打獵、砍樹等等。釣魚和打獵屬於主人。農民睜開眼睛看着自己的收成受野獸的踐踏。農民的公共牧場和森林幾乎到處被其主人強迫沒收。而且主人可照處理農民財產的方法，更糟踏到農民的本身和他的妻女。主人有初夜權。無論何時，他可任意把農民投之獄中，在獄內拷問農民正和現在預審法官拷問犯人一樣。無論何時，他可撲殺農民，或者把農民斬首。加洛林納（編者按：係十六世紀一種刑法，由皇帝查理五世於一五三二年所公佈）法

與各章中，指出「割耳」、「割鼻」、「挖眼」、「斷指」、「斬首」、「車裂」、「焚燒」、「夾火餅」、「砍四塊」等等，沒有一項不被「仁慈」的貴族和主人任意實行。誰能保護農民呢？法庭被勤儉、儉儉、閹割之家或法律家坐滿了，他們深知自己為榨壓而享受薪俸。帝國的一切官吏是不虛擲農民血液的啊。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錢亦石譯，六一—六頁）

……在農奴制度之下，農民不得地主底允許不能娶妻。現在，農民可以不得任何的允許而自由娶妻。在農奴制度之下，農民必需按地保（註：在農奴制度之下地主所指定的一鄉底代理人和管理者）所指定的日子替自己的地主老爺做工。現在，農民可以隨便選擇替那個東家，在那些日子，要多少工費才去做工。在農奴制度之下，農民不得地主老爺底允許就不能離開鄉村。現在，如果村社允許他，如果他沒有欠賬，如果他能得到護照，如果省長或縣警察長不禁止移居，則農民可以自由外出。這就是說，農民現在也還沒有行動和遷徙底完全自由，農民仍舊還是半農奴式的。……

在農奴制度之下，農民不得地主老爺底允許，不能獲得財產，不能購買土地。現在，農民可以由購買任何的財產（退出村社的完全自由，任意處置自己土地的完全自由，農民在現在也還沒有完全獲得）。在農奴制度之下，農民要受地主底肉刑。現在雖然農民還沒有免除肉刑，可是地主已不能親自處罰自己的農民了。

……歐俄的全部土地——農民的份地和私有土地都在內，約有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俄畝（國家土地除外，關於這點我們以後要特別講到）。其中屬於農民的，即屬於一千萬以上的農家的共有份地一三一、〇〇〇、〇〇〇俄畝。而在私有者手裡的，即是在不滿五十萬家手裡的有一〇九、〇〇〇、〇〇〇俄畝。這就是說，就拿這些數來講，那末每個農家祇有十三俄畝，而每家私有主則有二百一十八俄畝！可是，土地分配上的不平等更厲害得多，這點我們在下邊就要看見。

私有主底一〇九、〇〇〇、〇〇〇俄畝中，七百萬俄畝是在皇家手中，即是歸皇室中人所有。沙皇與他的皇族，這是俄國的第一等地主，是最大的地主。一個皇族所有的土地，要多於五十萬農家！其次，教堂和廟宇所有的土地約有六百萬俄畝。我們的牧師向農民宣傳不要貪財，而要戒慾，自己則用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抓取了大批土地。

（列寧：『告鄉村貧民書』，『列寧選集』，

卷三，二九九——三〇〇，三一〇——三一頁）

#### （四） 恩格斯，毛澤東論

### 歷史上農民起義及其失敗的原因

#### 德 國

自從路德對天主教權階層宣戰，把德意志一切反對派分子投入運動漩渦的那一瞬間起，沒有一年，農民不起來提出自己的要求。當一五一八年到一五二三年之間，在黑森林和斯哇比亞上郡，各地方的暴動接連而起。自一五二四年春天以來，這些暴動帶有系統的性質。一五二四年四月馬黑達爾寺院區域內的農民拒絕農奴勞動和賦稅；同年五月聖伯拉辛的農民拒絕農奴付款；六月門根附近斯大海的農民宣佈他們不納什一稅及其他賦稅；七月和八月喬爾加的農民謀反，旋歸平靜；一部份由於基利黑的調停和約，一部份由於聯盟大批屠殺的殘暴行為。最後，左右全局的暴動起於斯托林根伯爵的領域，次暴動可看作農民戰爭真正的發端……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錢亦石譯，七〇頁）

雖說農民在可怕的壓迫之下被煽動了，然而要發覺他們暴動却不容易，因為散居各地，想使他們得到一個共同的了解極感困難；世代相傳的服從習氣，在許多地方缺乏武器使用的練習，制備程度的深淺視其主人之個性而異，凡此一切使農民安靜了。因這些原故，雖然中世紀曾有過廣大農民的地方暴動，可是——至少在德國——在農民戰爭以前沒有看到全國的農民暴動。況且，農民與諸侯、貴族和城市有組織的權力對峙，不能單獨起來革命。只有與其他階級聯合，農民才有勝利的機會。但是——當他們被其他一切階級同等榨取的時候，如何能和其他階級聯合呢？……

地方和各省的分離及由此所必然發生的地方和各省的偏狹性如何毀滅了整個運動；中等階級、農民、平民如何不能為一致的民族行動而聯合起來；各省農民如何只為自己而行動，經常不肯援助鄰近區域的暴動農民，以致在個別的戰爭中順次為不及暴動群眾總數十分之一的軍隊所剿滅；——所有這些情形，讀者從這種解釋中必定看得十分清楚。個別農軍與敵人所締結的休戰條約及協約，也構成其同事業的叛變行動；各種農軍不是按照自己行動或大或小的共同性，——唯一可能的聯合，——只是按照與自己對抗之特別仇敵的共同性而聯合，即為各省農民彼此漠視的明顯證據。

（恩格斯：一德國農民戰爭，錢亦石譯，一六——一七，二二頁）

中 國

地主階級對於農民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曾經不能在歷史上掀起無數的農民暴動以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從秦朝的陳勝、吳廣、項羽、劉邦，漢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黃巾、銅馬，隋朝的李密、竇建德，唐朝的黃巢，宋朝的宋江、方臘，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國，總共不下數百次，都是農民的反抗運動，都是農民的革命戰爭。

中國歷史上農民暴動與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所沒有的。只有這種農民暴動與農民戰爭，才是中國歷史進化的真正動力。因為每次農民暴動與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

治，因而也就多少變動了社會的生產關係與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只是由於當時還沒有新的生產力與新的生產方式，沒有新的階級力量，沒有先進的政黨，因而這種農民戰爭與農民暴動得不到先進階級與先進政黨的領導，如同現在的無產階級與共產黨能夠正確領導農民暴動與農民戰爭。這樣，就使當時的農民革命總是陷於失敗，總是在革命中與革命前後被地主資族利用了去，當作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

毛澤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第一章，「毛選」卷二

## 二 資產階級與農民

### (一) 馬克思、列寧論封建財產關係

#### 成了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而必須被打碎

這樣，我們看到了，資產階級靠着他們而形成起來的生產與交換手段，在封建社會內就已經創造了。在這些生產與交換手段發展底一定階段上，封建社會底生產與交換在其中進行的那些關係，農業與工業底封建組織，一句話，封建的財產關係，現在不能適合發展了的生產力了。它們妨礙生產，而不是發展它。它們變成了它的桎梏。必須打碎它們，而它們是被打碎了。（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產黨宣言』，博古譯，三〇頁）

由此觀之，凡以農奴制的方法（折半租佃制及小租佃制）所耕種的地主的土地，其產量實較分與地爲少！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因爲它無可爭辯地證明，俄國農業底落後性，全部國民經濟底停滯以及農民在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卑微，其主要而基本的原因，便是工役制，即農奴制度底直接的殘餘。只要農奴制的大莊園底壓迫傳統、經營方法存在一日，則不論什麼貸款，不論什麼農業改良，不論對農民的什麼補助，以及不論官僚及自由主義者所喜歡的什麼贊助方法，都是不會有什麼大的成績的。

。反之，只有那消滅地主土地佔有制度和摧毀舊的中世紀的農村公社的土地革命（比如實行土地國有，即可摧毀這種農村公社，而不須用警察式的或官僚的方法了），才能確切不移地成爲十分迅速和真正廣泛的進步基礎。折半佃地和租佃地底難以令人相信的低下收成，就是由於「爲豪強貴族作工」的辦法所造成的。要是現在在同一個農民，從「爲豪強貴族作工」辦法之下解放出來，不僅這些土地收成可大大增加，而且分與地的收成，也不可免地單單因對經濟底農奴制的障礙之廢除而會增加的……

土地問題及土地危機的本質，決不在於剷除阻止農業興發的障礙，而在於如何去剷除這種障礙。是那一個階級及用什麼方法去進行這一剷除。

剷除阻止國內生產力發展底這種障礙是絕對必要的，——不僅是在主觀上，而且也是在客觀上都 是必要的，即是說，這種剷除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力量都是不能防止它的。

夏寧先生底錯誤（關於土地問題的許多作家也犯了這種錯誤），就在於他把提高農業技術必要性底正確命題把握得太抽象，未估計到俄國農業中農奴特徵與資本主義特徵交織之特殊形態。俄國農業生產力發展之主要而基本的障礙，乃是農奴制底殘餘，即首先是工役制與奴役，其次是農奴的年貢，農民的無權無利，以及農民在上層身份者面前的卑賤等等。這些農奴制殘餘底廢除，早已成爲經濟的必要了，十九世紀末年農業危機之所以令人難於相信地加強，就是因爲俄國從中世紀制度下解放底過程太「延緩」了，工役制及奴役「壽命」延長得太久了。在一八六一年以後它們壽終正寢得太慢，以致新的機杼還須要迅速剷除這種農奴制底暴力手段。

（列寧：「十九世紀末期俄國底土地問題」，

「列寧選集」，卷一，三四三—三五，九四—九五頁）

## (二) 列寧論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兩條道路

### ——農民所要求的土地國有和保存農村

### 封建殘餘的土地改良

國爭底限中釘，就是農奴制的大地產；這些大地產，是俄國農奴制度遺跡最顯著的化身，最堅固的柱石。商品經濟及資本主義的發展，將絕對必然地把這些遺跡剷除淨盡。在這一點上說起來，俄國只有向資本主義發展的一條道路。

可是這種發展形式，可以有兩種。農奴制度遺跡之消滅，可以用改租地主經濟的方法或是用消滅農奴制大地產的方法，換句話說，可以用改良的方法或用革命的方法。資產階級的發展可以有兩條道路：或者是以大地主經濟為主腦，讓它漸漸變成資產階級的經濟，而用資本主義剷削方法來代替農奴制度剷削方法，以推進資本主義的發展；或者是，由小農經濟為主腦，用革命的方法，來把社會機體中農奴制大地產這些「贅瘤」剷除出去，而後來沿着資本主義的法麥<sup>①</sup>道路自由發展。(式道)

資本主義發展底這兩條客觀可能的道路，我們稱之為普魯士式的與美國式的道路。照普魯士式的道路來發展，則由農奴制地主的經濟，漸漸變成資產階級的翁克<sup>②</sup>的經濟，農民經過幾十年的剷削與

① 資本主義的法麥 (capitalist-farmer) 就是用資本主義的方式經營農業的那種農民，亦可簡稱為「農業資本家」。這是美國最盛行的一種農民。

② 翁克 ( Junker ) 是普魯士土地所有者 (或地主) 底稱號。

壓迫的痛苦，而後才產生少數「大農」。至於照美國式的道路發展，則地主經濟或者本來就沒有，或者是用革命方法來把封建大地產沒收分割，完全消滅地主式的經濟。於是農民就成為農業中唯一的人物，而漸漸進行成為資本主義的法麥。根據前者，進化民主要的內容，就是在封建地主壟克土地上，由農奴制的剝削轉入資本主義的剝削。根據後者，主要的內容是宗法社會的農民變成資本主義的法麥。

（列寧：「俄國社會民主黨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

革命中的土地綱領」，「列寧選集」，卷五，一八八—一八九頁）

這種土地佔有制是可以一下子斷然地用斬斷舊制度的方法來消滅的。這種方法就是一九〇五年—一九〇七年這個期間，一切農民代表多少一貫所要求的土地國有。土地私有制底推翻，一點也沒有改變商業與資本主義土地佔有制底資產階級的基礎。再沒有比以為土地國有與社會主義甚或與土地佔有用之均平主義，好像有什麼共同的意見更錯誤的了。至於社會主義，那大家都知道，它是在於消滅商品經濟。土地國有，是將土地變為國家底私有財產，這種轉變，一點也沒有觸動土地底私人經營。不論土地是私有財產還是全國——全體人民底「財產」，而土地底經營制度，是不會因此改變的，同樣，不論富裕農民是永遠「購買」了土地，是租種地主或公家的土地，抑或「集合了」落掉了的貧農分與地，但是他的（資本主義的）經營體系是沒有改變的。交換既然存在，那談社會主義是可笑的。而農業生產品與生產手段底交換，是跟土地佔有制底形式完全沒有關係的（我在括弧中要聲明，我在這裡只是說明土地國有底經濟意義，而不是當作綱領來擁護它。關於這種主張，我在上面所述的著作中已經擁護過了）。

土地國有底經濟意義，並不在於人們常常所追求的地方。它不在於反對資產階級關係底鬥爭（馬克思早已指出，土地國有乃是資產階級的最徹底的手段），而在於反對農奴關係的鬥爭。中世紀的土

地佔有制底腐雜性，是在阻礙着經濟的發展；身份的體制是在防害着商業的流轉，舊的土地佔有制與新的經營底不相適應，是在產生着尖銳的矛盾；由於大莊園關係，地主延長了工役制底壽命，農民被牢牢地封閉在「格特」<sup>①</sup>以內，被牢牢地封閉在分與地的佔有制以內，生活每步都在破壞着這種土地佔有制底體制。土地國有可以把土地佔有制中的一切中世紀的關係掃除得乾乾淨淨，推翻土地上的二切人爲的區劃，使土地成爲真正自由的——這是爲誰呢？爲了「一切公民嗎？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兒。我們已經看到，沒有馬的農民（即約三百二十五萬戶），其自由是在於出租分與地。土地成爲自由的了，——這是爲了主人，爲了真正希望而且能够依照現代一般經營條件，特別是世界市場條件所需要的去耕種土地的人們。土地國有也許要促進農奴制度底滅亡和純資產階級的農莊在解除了一切中世紀坡拉的、自由的土地上的發展。這就是十九世紀末年所形成的在俄國土地國有之現實的歷史意義。

至於爲資本主義墾殖土地佔有制的另外一條在客觀上並非不可能的道路，那像我們看到的一樣，就是富人底加速對農村公社底剝奪和富裕農民土地私有制底鞏固。在這種情形之下，工役制和奴役爲主要泉源，是毫無變動，地主的大莊園依舊保存着。很明顯地，這種爲資本主義清除道路的方法，與上述的一種方法比較起來，是很少能保證生產力底自由的發展的。因大莊園既是保存着，那奴役的農民，折半佃制，小的按年租佃制，農民用自己器具耕種「貴族」土地的辦法，也不可免地要保存着，就是說，最落後的文化與叫做家長制的農村生活的那種東方野蠻制度也要保存下來的。

①「格特」(Gut)爲西歐中世紀城市內專爲猶太人居民所劃定的住區，禁止猶太人在該區境界以外居住。在帝俄，猶太人居住區（即除享有特權的若干集爾外，猶太人只能住在一定的省份）是與這相適應的——俄文版註。

（列寧：「十九世紀末期俄國底土地問題」，

「列寧選集」，卷一，九六一—九九頁）

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發展初期所碰着的土地佔有形式，是不符合於資本主義的。資本主義從舊的土地佔有形式（封建地主的、農民村社的及氏族制）中，造成功符合於自己的土地關係形式。

馬克思又同時把資本造成符合於自己的土地佔有形式的各種方法，互相對照。在德國，中世紀的土地佔有制之改造，是用改良的方法，是適應着舊俗與傳統，適應着漸漸變成翁克經濟的農奴制大地產，適應着漸漸變為大農及雇農的懶惰農民腐舊的小地產（請看「剩餘價值論」第二卷上冊二八〇頁）：「農業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底條件——由懶惰農民變為工業家」。在英國，這種改造是採取革命強迫的方法完成的，但是這種強迫，是用以擁護地主，壓迫農民階級的；這種農民，受苛捐雜稅之壓迫，被人逐出鄉村之外，只得遷居，只得死亡，只得逃往他國。在美國，這種改造，也是用強迫的方法，可是強迫是用以反對南美奴隸主經濟的。這兒強迫是用以反對農奴土地主的。他們的土地，分發成塊，封建大地產，一變而為小資產階級的地產了（參看考茨基底「土地問題」——德文原本第一三二頁——中「關於南美奴隸制度崩滅後小農之增加」）。在美國自由土地中，為新生產方法（為資本主義）建設新土地關係的這一作用，是由美國「土地平分運動」，四十年代之抗租運動及保障小土地私有主不至喪失土地的那個法律來完成的。當德國共產主義者克雷格一八四六年宣傳美國土地平分時，馬克思則譏笑這種社會革命黨的成見及其小資產階級假社會主義的理論；可是馬克思同時却非常重視美國反對土地私有制運動之歷史的意義，把這個運動看做先進的代表美國生產力發展利益的，代表美國資本主義利益的一種運動。

（列寧：「俄國社會民主黨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革命中

的土地綱領」，「列寧選集」，卷五，二七二—二八頁）

### (三) 恩格斯論農民是

#### 三次資產階級大革命中的戰鬥軍隊

以上，我說到了日益生長着的資產階級必然要與已存的教會發生衝突的兩點原因（編者按：一為天主教教會的權力；一為科學的發展），但已經足夠證明：第一，在反對天主教會權力的鬥爭中，最有直接利害關係的是資產階級；第二，一切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在當時都要帶上宗教的外衣，而且首先必然要反對教會。但是如果職團的呼聲是從大學裡和城市商人中發出來的話，那末，這一呼聲一定能够在鄉村民衆中在農民中獲得有力的反響——當時農民到處向教會的和世俗的封建主進行劇烈的而且是生死的鬥爭。

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制的偉大鬥爭，在三次大的決戰中，達到最緊張的程度。

第一次鬥爭是德國的宗教改革。路德底反教會暴動的口號，喚起了兩次政治起義；起初是西普根領導的下級貴族底起義（一五二三年），以後是一五二五年的偉大的農民戰爭。這兩次都失敗了，主要的是由於最有切身利益的黨派、城市資產階級底不徹底。至於不徹底的原因，我們在這裡不能詳述。

資產階級的第二次大起義，是將加爾文教看做現成的職團的理論。這次起義發生於英國，城市資產階級給了它第一個推動，而鄉村中的中農，則使運動獲得勝利。奇特的現象是：在所有三次資產階級大革命中，職團的軍隊都是農民。而農民却正是這麼一個階級，它在勝利之後，却反因這一勝利的經濟結果而破產了。克倫威爾之後一世紀，英國的自耕的小土地所有權差不多完全消滅了。可是，

正是由於這些小土地所有者與城市平民份子底參與，鬥爭才能達到徹底的結果，並將整理第一推上頭查。

法國大革命就是資產階級第三次起義，但這是完全丟開宗教外衣，公開的在政治基地上作戰的第一次起義。這也正是第一次實行鬥爭到底直到交戰的一方（貴族）被消滅而另一方（資產階級）完全勝利的起義。……革命與過去的傳統完全地斷絕了關係，消滅了封建制度底最後遺跡，並在「民法」中使舊「羅馬法」巧妙地適應於現代的資本主義關係——它差不多是馬克思所稱為「商品生產」的經濟發展階段之法律關係底最完備的反映——它適應得這樣巧妙，以致革命的法國民法，直到現在還是一切國度（連英國也在內）用來改革財產法所根據的範本。……（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博古譯，二四——三一頁）

(四)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

資產階級在革命中出賣農民

一七八八年的德國革命，不過是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諷刺的詩篇。

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在佔領了巴士梯（係巴黎監獄名字——編者）三星期之後，法國人民在一天之內把一切封建的負擔都解除了。

一八四八年七月十一日，在三月革命之後四個月，封建的負擔却把德國人民征服了。吉爾克和漢塞曼是通開作弊的（按漢塞曼是大資產階級的政黨開員；吉爾克是漢塞曼內閣的土地總長，曾起草了一個土地問題草案，名為「消滅封建負擔」，而事實上僅取消了小而不要的

★  
德 國  
★

負擔，保存了或購買最重要的。——編者）

一七八九年的法國資產階級，沒有一分鐘曾經聽過自己的同盟者——農民，它知道自己統治的基礎，是消滅鄉村中的封建制度，造成自由的佔有土地的農民階級。

一八四八年的德國資產階級，毫無良心的出賣了自己最自然的同盟者，這種同盟者是與德國資產階級血肉相聯的，德國資產階級沒有農民是無力反對貴族的。

保存封建的權利，用贖買（自欺）的形式，來准許這些特權的存在，這就是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的結果。「泰山生了個老鼠」。

（引自列寧「兩個策畧」，單行本一九一一年二頁）

……普魯士的農民，像奧地利的農民一樣（但力量較弱，一般的說來，封建壓迫在普魯士並不如在奧地利那樣厲害），利用革命一下子解脫了一切的封建枷鎖。可是在這裡，由於上述的原因，中等階級立即轉而反對他們最早的最不可少的聯盟者——農民；與資產階級同樣害怕所謂攻擊私有財產的民主黨，也不再支持他們；像這樣，在三個月的解放之後，在流血的鬥爭與軍事的屠殺之後（尤其在西萊西亞），封建制度便在昨天還是反對封建的資產階級手裡恢復了。再沒有比這更可恥的事實，來反對他們的了。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黨派犯過同樣的叛變罪惡，出賣了最好的同盟者，也出賣了自己。不管這個中等階級政黨將來要遭受怎樣的屈辱與鞭撻，爲了這一種行爲使一切都是罪有應得。

（恩格斯：「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五五—五六頁）

## 法 國

議會共和國的三年的嚴酷統治，使一部份的農民擺脫了拿破崙的剝削，使他們革命化了（雖是那時還只是表面上的），可是當他們每次起來運動時，資產階級就用暴力把他們鎮壓下去。在議會的共和國之下，法國農民底近代意識與其傳統意識進行了鬥爭；這一鬥爭表現於鄉村學校教育與僧侶之間的不斷鬥

爭之形式上，資產階級推倒了學校教師。農民第一次作了努力，以圖對於政府的行動，採取獨立的地位。這表現於特長與短事之間的不斷的衝突上。資產階級把特長吞下了。最後在議會的共和國時期，法國各地農民，起來反對他們自己的子息——軍隊。資產階級以殘酷與死刑來懲罰他們。這一資產階級，現在却高喊群眾底愚昧，高喊可惡的群眾把它（資產階級——譯者註）出賣給波拿巴。資產階級親自以暴力加強農民階級底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熱烈保持那些形成這種農民宗教誕生地之條件。當然，在民衆還是保守的時候，資產階級不得不害怕民衆底愚昧，可是在民衆一旦變成革命的時候，資產階級却又害怕民衆底有見識了。

（馬克思：『拿破崙第三政變記』，柯伯年譯，一四七頁）

## （五） 恩格斯、寧列、毛澤東

### 論農民階級的分化

我們說到廣大的小農及農民階級。這一階級加上附屬於它的農場勞動者，佔全國人民的大多數。但這一階級本身又分作不同的部分。第一是較富裕的農民，在德國叫作大農與中農，他們是面積不等的廣大農田的主人，每人都雇傭着幾個農業勞動者。這一階級的地位既處在不納捐稅的大封建地主與小農和農場的勞動者中間，那末很明顯的，他們底最自然的政治道路是與城市中反封建的中等階級聯盟。第二是小的自耕農，在萊茵區很佔優勢。這兒的封建制度已經在法國大革命強大的打擊之前屈服了。相似獨立的小自耕農在其他各省也到處都存在着，在這些地方，從前加於他們土地的封建捐稅，他們

已用金錢買銷了。可是這一階級只是一個名義上的自耕農階級而已，他們底土地大都已經在極苛刻的條件之下極可悲地抵押給了人家，以致真正的地主不是農民，而是放債的高利貸者了。第三是封建地主的勞動，他們雖不易被驅逐離開所租的土地，但他們却必得永遠納租、或永遠為領主服力役，報効若干的勞動。最後是農業勞動者，在許多大的農業公司中，他們的生計狀況正像英國的這一階級一樣，由生而死，在任何時候都是貧窮飢餓，作他們雇主的奴隸。農民中後面這一階級——小自耕農、封建佃戶與農業勞動者，在革命以前從不怎樣關心政治，但這次革命事變（編者按：係指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顯然為他們開闢了新的事業，充滿着光明的前途。革命對於他們每個人都都有利益，革命運動一旦被適當地開展，可望每個人都會參加。

（恩格斯：《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一三三—一三四頁）

## 俄國

如果按其經濟實力來看各種農民的經濟，那我們就可以看見：富農每戶平均有一〇五三。三盧布的收入和八五五。八六盧布的支出，即有一九七。三四盧布的淨餘收入；中農每戶平均有四七三。八盧布的收入和四七二。六一盧布的支出，即每戶只有二。一九盧布淨餘收入（欠債和欠稅尚不在內）——這種農戶顯然是未必能夠以其所得來的償其所出的，十一個農戶中的五戶是有虧空的；最低類的農戶即貧農，簡直是以資本來經營的，收入是二〇二。四盧布，而支出則等於三二三。七八盧布，即有二二

在萊茵區，由於它在拿破崙第一當政時屬於法國，法國革命的直接影響是很大的；

這兒的封建關係在十九世紀初葉就廢除了，當一八一五年這區域劃歸普魯士的時候

，封建關係並未恢復。另一方面，普魯士的封建關係的要素還存留着。到一八四八

年革命時才廢除。——編者按註

三、八盧布的租金。顯然，如果我們把這些農戶混在一起，並拿出一般平均數來（淨餘收入總數於四四〇一一盧布），那我們就把實際的情形完全曲解了。那時我們就會忽畧（好像克里元科先生忽畧了那樣）那所有的確得淨餘收入的六戶富農都雇有雇農（八八）的事實，這件事實向我們說明他們的農作經濟的性質（他們適渡為農業企業家）。這個經濟給於他們以淨餘的收入，並幾乎完全使他們不必從事於「鹽業」。這些農戶（大家算在一起），只有百分之六點五的收支額是由鹽業來抵消的（六三一〇。五盧布中抵四一二盧布）。而且這些鹽業按雪爾內納先生的一個指示說——是如（運載）或甚至於（包買鹽羊）二類的業務，就是說不僅不是證明依賴於他人，反而是以剝削他人為前提的。（正是在後面這個情形下：積累起來的「儲金」就變為商業資本）。這些農戶有四個工業作坊，這四個工業作坊給他們以三三〇盧布，百分之五的收入。

中農的經濟，則是另外一種：他們——正如我們已在上面看見過的那樣——是未必能夠以其所得來償其所出的。耕作業是不能抵消他們需要的，他們百分之八九的收入是靠那所謂鹽業得到的。這些鹽業究竟是什麼？——我們將在雪爾內納先生的論文中看見，在該論文中指出，七個戶主所從事的是鹽業：其中只有兩個戶主是從專于獨立鹽業勞動的（縫衣和縫紉），其餘五個戶主則是出賣勞動力（一到下江去賣人割草），「在鹽酒坊裡作工」，「在繁忙時候作短工」，「替人家牧羊」，「在本處地主用莊裡作工」，這已經是在半農半工了，旁的業務使他們脫離自己的經濟並以此而最終破壞這個經濟。

至于說到貧農，那麼他們的耕作業是簡直虧本的：「鹽業」在他們的收支表中的意義更大（佔收入總數百分之二四），而且這些鹽業幾乎完全（只有一家除外）歸結于出賣勞動力。其中有兩戶主要是以鹽業（當雇農）作為主要收入的，即佔收入總數三分之一。

由此就很顯然，我們所碰見的是完全分化着的小生產者，其上層集團變成資產階級，而其下層集

區則變成無產階級。當然如果我們拿一般平均數目來說，那我們就會完全看不見這件事實，就會得不到任何一個關於農村經濟情形的概念。

(列寧：「什麼是「人民之友」」，莫斯科本，九五—九六頁)

農民在全國總人口中佔百分之八十，是現時國民經濟的主要負擔者。農民一般都是小資產階級，但他們的內部是在激烈分化的過程中。

## ★ 中 國 ★

第一是富農。約佔農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連地主一起共佔農村人口百分之十左右)，被稱為農村的資產階級。中國的富農大多帶有半封建性，並與城市資產階級聯繫着。但革命政府不應把富農看成與地主無分別的階層，不應過早採取打擊富農經濟的政策，因為富農的生產在一定時期中是不可缺少的。

第二是中農。中農在農村人口中約佔百分之二十左右。中農一般不剝削別人，在經濟上能夠自給自足(但在年成豐收時能有些盈餘，有時也利用一點雇傭勞動或放一點小債)，而受帝國主義、地主階級與大資產階級的剝削；除一部份富裕中農外，多是土地不足並沒有政治權利的。中農不但能幫助參加反帝革命與土地革命，並且是能夠參加社會主義革命的，因此全部中農都可以成為無產階級的可靠的同盟者，中農是很好的革命動力之一。中農態度的向背是決定革命勝負的因素，尤其在土地革命之後，中農成了農村中的大多數的時候是如此。

第三是貧農，中國的貧農連同雇傭在內，約佔農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貧農是沒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廣大農村羣衆，是農村中的半無產階級，是中國革命的最廣大的動力，是無產階級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國革命隊伍的主力軍。中農和貧農都只有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無產階級也只有同中農、貧農結成堅固的聯盟，才能領導革命到勝利，否則是不可能的。農民這個名稱所包括的內容，這裏說的也是廣義的中農和貧農。

## (六)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

### 論資本主義下農民所受的剝削

在原始階級的歷史中，一切對新興資本家階級有積極作用的革命，都是劃時代的，但多數民衆，突然地、強制地、由生活資料分離，當作自由的無產階級，而投到勞動市場上來的時間，尤屬如此。剝奪農業生產者即農民的土地，就是這全過程的基礎。這種剝奪的歷史，在各不同的國度，有其不同的色彩，它是不同的順序，不同的歷史時代，通過其不同的階段。其典型形態只見於英格蘭。……

#### 美 國

……對農民施行的大規模的土地剝奪，是被稱爲所有地掃除（Clearing Of Estates），那其實是把入從所有地掃除。以上考察過的英國一切方法，到這種「掃除」，才達於絕頂。照前章關於近代的情況描述看，現今已沒有一個要掃除的獨立農民存在了。……

至於十九世紀採行的方法，我們只要把蘇德蘭女公爵所成就的「掃除」作爲一個例子，就行了。這位女公爵通曉經濟，她一即位爲女公爵，立即在經濟上進行徹底的治療；她所治理的全州，其人口已由過去所行的類似方法，減到一萬五千人，她決心把這全州轉化爲牧羊場。由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二〇年間，這大約包含有三千家族的一萬五千人，都被有組織地驅逐了，剿滅了。他們的村落，被燒了，摧毀了，其田地則全部轉化爲牧場。英國的兵士，執行驅逐剿滅的命令，與住民發生衝突。有一個老婦人拒絕離去她的小屋，竟被燒死在烈燄中。這一來，這位高貴女公爵，把那不知從什麼時候

代起即爲氏族所有的七十九萬四千英畝土地，佔爲己有了。她爲那些被驅逐的住民，指定了海濱約六千英畝土地——一個家族約得二英畝。這種土地，在當時是聽其荒蕪，對於所有着毫無收入可言的。但這位女公爵，却以她的高貴的心情，把這荒蕪土地，以每英畝平均二先令六便士的地租，貸與那些被驅逐的，幾世紀來會爲她家流過不少血的族民。她把她掠奪來的族有地 (Clandon) 全部，分割爲二十九個牧羊租地，每個租地，不過居住一個家族，他們大抵是由英格蘭移入的租地。一八二五年，那一萬五千格爾人，已由三十一萬一千頭羊所代替。這些被驅往海濱的人們，只有依靠着漁業維持生活，他們成了兩棲動物，照一位英國著者所說，他們是一半在陸上生活，一半在水上生活。但雙方合起來，僅及生活的半分。

奪取寺產，欺詐讓渡國有地，盜竊公有地，掠奪封建所有地，把它在無所顧忌的恣情主義下，轉化爲近代私有財產，這種種，都是原始蓄積的牧歌的方法。這些方法，給資本主義農業以活動的領域，使土地併合於資本，同時並爲都市的產業，造出被追放的無產者的必要供給。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四章)

## 法 國

★~~~~~★

農村的人口——占法國人口全數三分之二以上——大部分是所謂自由的土地所有者。第一代大，由一七八九年底革命，把他們從其封建的重担解救出來，不付任何代價；他們取得土地，並沒有付價。但是，後代人，却以地價貶形態，償付他們的半農奴的祖先以地租、什一稅、賦役等等底形態所償付的。在一方面，人口越增加，在別一方面土地分割得越小小——那末，保有地底價權就越昂貴，因爲保有地越小小，對於地之要求就越大。不管農民是直接地購買他的保有地，或是從他的共同繼承人那裡把保有地當做資本而受得之，他對於其保有地所付的代價越高，農民之負債——即土地抵押——也必然地照着比例增高起來。以土地爲質的債權，稱爲土地抵押，是一張土地當票。正如特權存庫世絕的田莊之上築積

一樣，土地抵押在現代的小保有地之上集積。另一方面：在保有地不斷分割之制度下，土地對於其所  
 有者純然是生產手段。土地越分割，其生產性就按照同一比例而遞減。在土地上使用機器，分工，大  
 規模的改良方法如排水、灌溉、設備等等，都日益不可能施行。反之，耕作底免費却按照生產工具本  
 身底分割之同一比例而遞增。這一切，是不管保有地底所有者是否擁有資本。但保有地分割得越小，  
 小塊土地連同其極可憐的財產就成爲貧窮的資本之全部。投於土地的資本越少，貧窮就越缺乏利用  
 農業學底進步所需的土地金錢和改良，而土地耕作也就越退步。最後，農民的全家人，因有了土地，  
 以致不能從事其他的職業。可是，靠土地又不能過活，在這個時候，純收入就按照着總費用增加之同  
 一比例而減少。

所以，人口越增加，因而土地分割得越小，那末，生產工具——土地——按照同一比例而昂貴，  
 其生產性則遞減，農業按照同一比例而衰落，農民之負債則增加。而且，過去的結果，現在又成爲原  
 因。每一代人都留下一大堆債務給其後代，使後代的人負債更重，每一新代人都更不利的、更困難  
 的條件之下開始其生活。土地抵押產生土地抵押，當農民不能以其土地作抵押而借得新債時，這即是  
 說，當他不能再把新的抵押權叫作土地抵押時，他就直接落入高利貸之手，而高利貸的利息越發更大。

這樣，法國的農民付出土地抵押底利息，付出高利貸的無抵押的借款底利息，在這種形式中，他  
 們不祇是把地租，不祇是地產業利潤，一言以蔽之，不祇是把純利全部給予資本家，而且甚至把工資  
 底一部分也給予資本家，因此，他們在私有的名義之下降低到受爾爾個農地地步。

在法國，租稅負擔之不斷增加，以及打官司的費用，加速了這個過程。打官司的費用，一部分是  
 法國的立法對地產規定了許許多多手續所直接引起的；一部分是互相接續與互相交錯的許多保有地之  
 間的無數的紛爭所引起；一部分是農家底官廷所引起的。這些農民底財產底享用，只限於對他們

的想像的財產，他們的所有權愈熱狂的擴張。

據一八四〇年底統計表，法國土地總產額達五、二三七、一七八、〇〇〇法郎。其中，耕作成本，包括勞動的人所消費的東西，佔三、五五二、〇〇〇、〇〇〇法郎。餘下來的純生產物是一、六八五、一七八、〇〇〇法郎，從這裡要減去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付土地抵押底利息，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付法官，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付租稅，一〇七、〇〇〇、〇〇〇法郎付登記費、印花費、土地抵押手續費，等等。純生產物剩下的祇三分之一，即五三八、〇〇〇、〇〇〇法郎；把所剩下的純生產物分配於全人口，每人所得的純生產物不上二十五法郎。土地抵押以外的高利貸或律師費等等，自然是都沒有計算在內。

當共和政府在他們的舊有的重荷之上再添加新的負擔時，法國農民情況是可想而知的。我們可以看到，對他們的剝削與對工業工人的剝削祇是在形式上有不同。剝削者是同一的：資本。個別的家經土地押款和高利貸以剝削個別的農民；資本階級經國家稅以剝削農民階級。農民的保有地在名義上是農民所有的，資本一向就以農民底財產名義這個符號來把農民縛住，並以這個口實使農民與工業無產階級對立。祇有資本的倒台，才能提高農民；祇有無產階級反資本主義的政府，才能打破農民底經濟的窮乏和社會的墮落。立憲的共和政治是為民底聯合剝削者底獨裁政治；社會民主主義的赤色的共和政治，是農民底同盟者底獨裁政治。……

## 俄國

（馬克思：「法蘭西階級鬥爭」，柯柏年譯，一一一—一六頁）

而除了這種地主的壓迫——由於創造和實現改良的官吏之竟洪大式而得以及保存的壓迫——以外，還有資本底壓迫。貨幣底權力，這種權力甚至還壓迫了法國的農民——不是用可憐的半途的改良方法，而是以強有力的民衆革命方法來解除了地主政權的法國農民，這種貨幣底權力，其全部重担都壓在我們半農奴式的樸夫身上。無論

如何需要找錢：繳納爲惡善的改良所增加了的賦稅要錢，租土地要錢，稍許購買一點已在排擠農民家庭工業的工廠工業品也要錢，買糧食又要錢，其他處處地方都需要錢。貨幣底權力不但壓迫了農民，而且發毀了農民：絕大部份的農民不斷地破產，變成了無產者，少數的農民中間分出了一些數量不多而貪慾無厭的富農和善於經營的農夫，他們吞併農民經濟和農民土地，他們是在生長着的鄉村資產階級底幹部。改良後整個四十年內，完全是這種非農民化底過程，慢慢的痛苦死亡底過程。農民陷於極貧的生活程度：他們與牲畜同居一屋，穿着破爛衣服，吃着青草飯，他祇要找到逃身之處就要放棄自己的份地，他甚至倒贖份地，倒貼給領主，份地倒贖的價金超過了他的收入。農民極年受餓，荒年漸漸循環不已，農民死於飢餓和瘟疫的，往往成千成萬。

（列寧：「工黨與農民」，「列寧選集」，卷三，三二五—三二六頁）

在地租與上，同樣重要地要提到馬克思底分析，這分析指明勞役地租（這時候農民以自己的勞動在地主的土地上創造剩餘生產物）變爲貨幣地租或自然物地租（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創造剩餘生產物，而由於「超經濟的強迫」把它交給地主），再變爲貨幣地租（同樣是自然物地租，不過由於商品生產底發展而變成了貨幣，如舊俄的「貢金」）；最後，變爲資本主義的地租，這時候，藉助於單薄勞動而耕作土地的農業企業家代替了農民的地位。在講到這個「資本主義地租的起源」底分析時，應該提到馬克思關於農業中資本主義底進化的若干精細的（而且對俄國這類落後國度特別重要）思想：

「爲貨幣而得的無財產的日工階級底形成不僅必然的和自然物與地租底轉變爲貨幣地租同時發生，而且甚至先於這個轉變就發生了。在這個階級產生時，當它還僅僅稀疏地出現時，在較富裕的有納貢義務的農民中，自然地發展了爲自己的利益而剝削農村僱傭工人底經濟，——正如在封建時期，當地的農奴自己已保有農奴一樣。這樣，在這些農戶方面逐漸地發展了積累相當的財產並在將來轉化爲資本家底可能性。因之，在社會獨立經濟的舊的土地佔有着之中產生着資本

主義土地租優者底萌芽，它的發展是爲農村經濟之外的資本主義生產底一般發展所制約着的。」  
 「資本論」，卷三，第二冊，三三二頁……「剝奪和從農村中驅逐一部鄉村居民不僅給工業資本「解放了」工人，他們的生活手段，他們的勞動工具，而且亦創造了國內市場。」  
 「資本論」，卷一，第二版，七七八頁。

鄉村居民底貧困和破產，反過來又替資本創造勞動後備軍。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度內，一部分鄉村居民，因此經常處於變成城市居民或手工工廠居民（即非農業居民）的過渡狀況中。這個相對人口過剩底源泉經常流着……農村工人底工資減少到最低水平，他永遠是一隻腳站在赤貧的泥坑中。」

「農民對於他自己耕作的土地的私有權是小生產的基礎及其繁榮底條件，是它的典型形式。可是這個小生產只能與生產和社會底狹隘的、原始的範圍相容。在資本主義下，農民底剝削和工業無產階級的剝削，其區別只在形式上。剝削者是共同的——資本。個別的資本家經過典當和借貸剝削個別的農民；資本家階級經過國家捐稅剝削農民階級。」（見法蘭西階級鬥爭）」

「農民底小塊土地只是使資本家能夠從土地上榨取利潤、利息和地租的藉口，而留給土地耕作者本人的，無論他歡喜怎樣，只是取得自己的工資。」

普通，農民甚至交給資本主義社會（即資本家階級）一部分工資，而自己却陷於「愛爾蘭佃農的水平」——在私有者的面鏡下。」（見「法蘭西階級鬥爭」）  
 「在小塊土地佔有制佔優勢的國度中糧食價格低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度」  
 「資本論」，卷三，第二冊，三四〇頁）  
 底原因之一在那裡呢？

就在農民毫無代價地把自己一部分剩餘生產物交給社會（即資本家階級）。

「因之，這樣低下的價格（糧食及其他農產品）是生產者窮困的結果，而無論如何不是他們勞動生產率底結果。」（「資本論」，卷三，三四〇頁）

小土地私有制、小生產底常態形式，在資本主義下退化着、消滅着、減重着。

小土地私有制，按其本質說來，是和社會勞動生產率底發展、勞動底社會形式、資本底社會集中大規模的畜牧業、科學底日益廣大的應用不能相容的。高利貸和捐稅制度必然會迫使它貧困起來。用資本購買土地就使這個資本不能用於培植土地。生產手段底無止境的分割和生產者本身的分散，（合作社，即小農底團體起着非常進步的資產階級的作用，它只是削弱而並不消滅這個趨向，同樣不應忘記，這些合作社給富裕的農民很多東西。而給貧農大眾的很少，幾乎沒有什麼，而後來則團體本身成了雇傭勞動底剝削者。）「人力底巨大浪費，生產條件日益惡化和生產手段日益昂貴是小私有制的規律」。

無論在農業中以及在工業中，資本主義只是以「生產者底殉難」底代價來改造生產過程。

「農村工人底分散於廣大的地域破壞了他們的抵抗力，同時城市工人底集中增加了這個力量。在現代的資本主義農業中，正像在現代工業中一樣，勞動生產力底提高和它的巨大的活動性是以勞動本身底破壞和損耗為代價換來的。此外，資本主義老農底任何進步不但是掠奪工人的藝術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壤的藝術的進步……因之，資本主義雖然發展着技術和社會生產過程底結合，可是同時却破壞着任何財富底來源：土地與工人。」（「資本論」，卷一，十三章末）

（列寧：「卡爾·馬克思」，博古譯，三九、四三頁）

## （七）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農民是一種

動搖力量沒有革命的主動能力，必

## 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能擺脫 地主資本家的統治

小農構成龐大的群衆，它的成員，生活於相仿的狀態中，但相互之間，並沒有複雜的關係。他們的生產方式，並不使他們互相往來，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法國的惡劣的交通工具以及農民底貧困，加重了他們的孤立。他們所耕種的小塊土地，排除了任何分工與應用科學的可能。因此，也就排除了發展底多面性、天才的多樣性以及社會關係底豐富性。每一單個農家，差不多是自給自足的；它直接生產其消費品的大部份，因此，它之獲得其生活資料，得自與社會交換者少，而得自與自然交換者多。這裡是一小塊土地、農民及其家族；旁邊又是另一小塊土地、另一農民及另一家族。幾十個這樣農家，就集成一個村；幾十個這樣的村，就集成一個縣。這個樣子，法國民族底主要群衆，是由相同的數量簡單加起來的，好像馬鈴薯一袋是由袋中的馬鈴薯所構成的那樣。這數百萬家族所生活底經濟條件，既使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的利益以及他們的文化，與其他階級不同，並與其他階級絕對地對立，那末，在這個限度內，他們就構成爲一個階級。

……可是這些小農之間，既然只有地方的關聯，他們的利害底同一性，既然並沒有形成一種統一，一種全國的結合或一種政治的組織；那末在這限度內，他們又沒有構成一個階級。所以，他們沒有能力用自己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不論是經過議會也好，或者經過公會也好。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他們一定要由別人來代表。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成爲他們的主人，成爲站在他們之上的權威，成爲無限度的政府權力，來保護他們去對抗其他階級，並從上面賜給他們以雨水和日光。所以，小農政治影響之最後表現，就是行政權力使社會屈服於它。

（馬克思：「拿破崙第三政變記」，柯柏年譯，一四四——一四五頁）  
 法國雖暫時享有工商業的繁榮，人民大眾，二千五百萬的農民，却苦於大蕭條。過去幾年的豐收，把穀物底價格抑低到比英國的更要來得低，而使農民處於負債、被高利貸號務、和被租稅所壓碎這樣的情況，他們底地位決不是繁榮的。可是近三年來的歷史，充分地證明了人口中這個階級（指農民階級——譯者註）是絕對的沒有革命主動能力。

（馬克思：「法蘭西階級鬥爭」，柯柏年譯，一三六頁）

同時，這也是同樣十分明顯而且被一切現代國家的歷史所證明了的，就是：農民由於分散於廣大區域，權難得到大多數意見的一致，是永遠不能企圖得到一個勝利的獨立的運動的；他們需要城市裡集中、更有知識、更易動員起來的人民的領導和推動。……農民之間的不滿也在同樣地增長着，但人們都知道，這一部份人民在和平安靜的時候，是永遠不伴一個獨立的階級主張其利益取得其地位的，除非在已經實行普選制的國家。……至於參加這暴動的農村人民，他們大半是這樣被推進革命黨的懷抱裡的：一部分由於相當緊迫捐稅，一部分由於壓在他們身上的封建重負。

他們沒有自己底主動性，作了參加暴動的其他各階級底尾巴，在工人與小商人兩者之間搖擺着。季在一切場合裡，他們所走的路向都被他們自己底私人社會地位所決定。農業勞動者一般地都支持南季工業工人，小農則容易與小商人攜手。……

（恩格斯：「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柯柏年譯，三三及一三六頁）

在經濟上與政治上，把散漫的小生產者——農民聯合起來的，不是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之下，一切國度裡，在近代的一切革命中，都會經常是這樣的，並且將來在資本主義之下，也永遠是這樣的），便是無產階級（在近代史上，在若干最偉大的革命底最高的發展中，在一個短時期間，在

萌芽的形式上，即是如此；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在俄國，在更發展的形式上，即是如此。只有自時得意的胡雪斯，才會空談和夢想「第三」條路，「第三種力量」的。

（列寧：「論糧食稅」，「列寧選集」，卷十六，二五六頁）

在某種程度上十六世紀德國農民起義及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所共有的經驗教訓，乃是被迫階級方面，因其小資產階級的生活地位而來的行動之散漫性和集中化之缺乏——恩格斯曾經特別強調這種經驗中所得的教訓。從這一視角來考察問題，我們也可得到同樣的結論，就是小資產階級群眾底單純而大多數，還不能決定任何問題，也不能決定任何問題，因為，散漫的數百萬農村小有產者，只有在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來領導他們的時候，才能獲得行動底組織性及政治覺悟，和其勝利所必須的集中化。

（列寧：「論立憲的幻想」，一九一七年八月八日，

「列寧選集」，卷十一上冊，七四頁）

第二種力量，是立於資本底發展與無產階級之間。這就是小資產階級、小業主，這就是在俄國構成人口中最大多數的農民。他們主要地乃是小企業主與小農生產者。主要地就是小業主和小耕作。他們十分之九是這樣的，也不能不是這樣的。他們每天不參加資本與勞動間的尖銳鬭爭，他們沒經過訓練，經濟與政治的生活條件，沒有使他們接近起來，而是拆散他們，使之彼此隔離，互相排斥，把他們變成數百萬的單個的小生產者。這些都是事實，關於這些，你們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的。……從其政治情緒的觀點上來，這種力量是一種什麼力量呢？它是一個動搖的力量。在我們的革命當中，在全國各個角落裡，我們都看到了這一點——在俄羅斯是這種樣子，然而在各個地方，結果都一樣的：它是一種動搖的力量。……這種力量會動搖於資產階級領導與無產階級領導之間。然則，為什麼這個佔有人口絕大多數的力量，却不能領導自己呢？這是因為這些群眾底經濟生活條件是這樣

的，即是他們自身不能聯合起來，不能團結起來。……我們從自身經驗中知道——在一切革命發展中，我們也可以見到對於這一點的證實，如果我們只就近代，假定說，就一百五十年來，在全世界範圍內的事體而論的話——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其結果都是相同的，即：一般小資產階級，特別是農民，欲認清自己的力量，欲依照自己的方式去指導經濟與政治任何的企圖，歸根到底，都以失敗而終。或者是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或者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凡夢想此種中間道路的人，只是幻想家，只是夢想家而已。政治、經濟與歷史，都駁斥了他們。馬克思底整個理論指出，假定小私有者，成爲生產工具與土地底私有者，那從他們之間的交換中，一定要產生資本，同時也會產生資本與勞動間的矛盾。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這是不可避免的；這是一個已經在整個世界裡表現出來的規律；誰不願意欺騙自己的話，他是不會看不到這一點的。

這些基本的經濟事實便說明了，爲什麼這種力量不能用自己的力量把自己表現出來，爲什麼在一切革命歷史中它的這種企圖總是以失敗而終的。當無產階級還沒有力量領導革命時，這種力量總是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在一切革命中，情形都是如此。……第二種力量底經濟與政治上的規律就是這樣的。或者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這是一條困難的道路，但它可以擺脫地主與資本家的統治，——或者是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如像在先進的民主共和國，以至於在美國那樣，那裡，土地的無代價的分配（每一個新來者都可以無代價地分配到六十俄畝，再想像不出更好的條件了！）還沒有完全結束，在那裡，這一點一定要引導到資本底全部的統治。

（列寧：「在運輸工人全俄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七日，

「列寧選集」，卷十六，一八三—一八七頁）

照通常的概念說，農民是這樣一種小生產者階級，這些小生產者，好像一盤散沙，散佈在全國的面面上。各自在自己小的經濟上，用落後的技術耕種土地；這些小生產者，就是私有制度的奴隸，就

是被地主、富農、商人、投機者、高利貸者等所任意剝削的。在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民，如就他的基本群衆說，就正是這樣的階級。

(斯大林：「關於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斯大林選集」，卷五，二四五頁)

## (八) 馬克思、恩格斯

### 論農民離開資產階級走向無產階級

這種小塊土地所有制在法國土地上所生的根，剝奪了封建制度底一切營養物。小塊土地底分界石，成爲資產階級抗禦其舊日統治者的任何攻擊之自然堡壘。但在十九世紀的經過中，封建的領主，被城市的高利貸者所代替；土地上的封建義務，被土地抵押所代替；貴族的土地所有權被資產階級的資本所代替。農民的小塊土地，現在只是一個口實，在這個口實下，資本家可以從土地上取得利潤、利息和地租。而耕作者如何取得自己的工資却還要自己想办法。法國土地所負擔的抵押債務，每年從法國農民抽取如此多的利息，以致其數額，簡直與英國全部國債底每年債息相等。小塊土地所有權發展，不可避免地引到這樣被資本奴役的狀態；這種小塊土地所有權把法國民族的大多數人轉化爲爲農居人。一千六百萬的農民（包括婦女與小孩）居住在洞穴中，大部份的洞穴，只有一個小窗，其他的只有二個小窗，最差的只開三個小窗。而住處之必須有窗，正如頭腦之必須有五官一樣，資產階級制度，在十九世紀初，令國家保護新興的小塊土地並以月桂冠作爲它的肥料；這種資產階級制度已經變成爲吸血鬼，把小塊土地底血液和骨髓吸盡了，而後把它投入資本底煉金的鍋中。拿破侖法典現在只是執行法處轉讓、查算財產與強制變賣之法典。在法國，除了官場承認的四百萬（包括小孩

等等)乞丐、流氓、犯罪者和賣淫婦之外，還有五百萬人瀕於破滅。他們或者是居住於農村，或者是帶着他們的破爛衣服和小孩不斷地從農村跑往城市，從城市跑往鄉村。所以農民的利益，已不再像拿破崙時代那樣，與資產階級底利益相協調，與資本相協調，而是與資產階級底利益相對立，與資本相對立了。因此，農民在城市無產階級的身上(城市無產階級底使命是推翻資產階級的制度)找到了他們的自然的同盟者和領導者。……

我們看到：一切「拿破崙的觀念」，都是尚未發展的、少壯時代的小塊所有地底觀念，對於已經衰老的小塊所有地，這觀念是一種荒唐；這些觀念只是小塊所有地底臨死掙扎的錯覺，是變成空說的字句，是變成虛影的神靈。但要使法國人民大眾擺脫傳統的重壓要使國家權力與社會之間的對立以純粹的形式表現出來，那末帝國主義的滑稽模仿是必要的。隨着這小塊土地所有制的日益潰滅，建築在其上面的國家機構也要崩潰的。軍事的、官僚的政府機構是在反對封建制度的鬭爭中鍛鍊成功的，而近代社會所需要的國家中央集權，則只有在軍事的、官僚的政府機構底廢墟之上建立起來。

國家機器的打碎，並不是危及中央集權。官僚制度不還是中央集權低級的、粗野的、還被其對立物(封建制度)所煩擾的一種形式。在對拿破崙王政復古感到絕望之時，農民將捨棄自己對於自己小塊所有地之信仰，於是建築在這小塊所有地之上的整個國家構造，也就要崩潰了，那時無產階級革命，就得到了合唱，而如果没有合唱，那末，在一切國民國度中無產階級的革命底獨唱就會變成哀歌。

(馬克思：「拿破崙第三政變記」，柯柏年譯，一四九—一五四頁)

以往的一切革命，革命底結果都是某一個階級統治被別一個階級統治所取而代之，以往的一切統治階級，都只是少數者，小於被統治的廣大的民衆。某一個統治的少數者，這樣地被推翻；別一個少數者，奪得國家政權，依照自己的利益，改變國家制度。不論何時，這個少數者，是由經濟發展底狀

體，使能看統治的能力，並提牠以統治的地位的。前因爲這樣故，也只因爲這個緣故，在革命之繼續統治的多數者，或是加入上面所說的少數者這一方面，或是消極地袖手旁觀。可是，如果我們把各個場台的具體內容忽畧過去，那麼，這一切革命底共通形態是：牠們都是少數者的革命。就使是多數者參加革命，牠們也只是——不管是自願與否——爲少數者効勞而已；但正因爲這個緣故，或者只是因爲少數者採取消極的不抵抗的態度，所以，這個少數者在外觀上就好像是代表全體人民的。……

這一次的革命（編者按：係指法國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當然是由少數人所領導的，但這一次並不是爲着少數者底利益，而是爲着多數者真正的利益。在一切的較長久的革命時期中，自己擠到前面來的少數者，他們用一些動聽的騙人的主張，就很容易把廣大的民衆爭取過去，那麼，這些把他們的經濟狀態反映得最真確的思想，這些思想只是他們的要求——他們對於這些要求，自己尚未理解，而只是漠然感到而已——底明顯的合理的表現，廣大的民衆怎不爲這些思想所動呢？當然，民衆的這種革命心情，一旦幻想消失，失望襲來，就常常很快地轉變爲倦怠，或甚至驟變爲正相反的心情。但在這裡，不是要提出騙人的主張，而是要實現大多數者本身底最特有的利益。大多數者在那個時候，對於這些利益，一定沒有看清楚，但在實現這些利益之過程中，他們親自看到明白的事實，他們一定不久也就清楚了。現在，正如馬克思在第三篇論文（編者按：係指「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內）從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到一八五〇年三月十日一文中所證明的，從一八四八年「社會」革命所生出的資產階級的共和政府，在一八五〇年，其發展使實在的統治權集中於大資產階級——牠們是傾向保王黨的——之手；在別一方面，使一切其他社會階級——農民以及小資產階級——都團結於無產階級之周圍。所以，當共同勝利時和在共同勝利後，不是他們，而是無產階級——經驗使他們聰明起來了——一定變成決定的因素，如果現在的形勢是這樣，那麼，豈不是有充分的希望可把少數者底革命轉變爲多數者的革命嗎？

（德區）小農（大農屬於資產階級）可分為各種不同的成份。他們有些在農奴制度之下，受領主

和主人的束縛，因為資產階級未盡他的責任把這些人從農奴制度下解放出來，所以容易使他們信服只有從工人階級、方面）得到救助。有些是佃農，他們的狀況幾乎與愛爾蘭的佃農相等。地租是如此之高，即在豐年，農民和其家庭也難維持標準的生活；到了收成惡劣的年份，就老實餓肚子。當他不能繳納地租的時候，完全聽從地主擺佈。資產階級只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面才想法救濟。那麼，於工人之外，這些佃農從何處尋我救濟呢？

一還有別一種農民集團，他們自己有一小塊土地。在大部份場合，他們負了典押重担，以致依靠高利貸者，正如佃農依靠地主一樣。他們所得到的，實際上只是菲薄的工錢，因為年歲豐歉不同，這點工錢亦變易不定，這些人想從資產階級得一點東西，絲毫沒有希望，因為榨取他們血液的是資產階級，即資本家高利貸者。雖說實際上其土地不屬於他們，而屬於高利貸者，然而這些農民還是緊緊的握住自己的土地。對於這些人必須使其明白，只有民衆的政府把所有典押變成國家債款，藉此減輕地租的時候，他們才能從高利貸者「剝削」之下解放出來。可是這件事只有工人階級才能做到。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錢亦石譯，一三四—一三五頁）

## 三 無產階級與農民

### (一) 農民問題的提法

#### (1) 斯大林論農民問題的提法

有人以為，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列寧主義的出發點是關於農民和農民的作用及其比重問題。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主義的基本問題，列寧主義底出發點，不是農民問題，而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條件、關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的問題。農民問題，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鬭爭中的同盟者的問題，祇是附屬的問題。

但是，這種情況絲毫也不使農民問題喪失它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所確有的、重大的、迫切的意義。大家都知道，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之開始認真研究農民問題，正是在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後前夜，那時，關於推翻沙皇制度和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已全盤擺在黨面前了，而關於無產階級在當前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者的問題，就帶着迫切的性質。大家都也知道，俄國的農民問題，在無產階級革命時，帶着更迫切的性質，這時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關於爭取和保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就使人遇到關於無產階級在當前的無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者的問題，這不是理所當然的；誰要去

蘇維埃準備去執掌政權，誰就不能不注意關於自己的真正的同盟者的問題。

在這個意義上講，農民問題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總問題底一部分，它這樣也就是列寧主義底最迫切的問題之一。

第二國際政黨之所以對農民問題採取冷淡態度，甚至簡直採取否定態度，不僅是因為西方各國有特殊的發展條件。這首先是因為這些政黨不相信無產階級專政，懼怕革命，並不想領導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而誰要是懼怕革命，誰要是不願意領導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誰就不會注意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同盟者的問題了。在他看來，關於同盟者的問題是不關痛癢的、不迫切的。第二國際的英雄們對於農民問題的譏諷態度，在他們那裡認為是文禮家風底表現，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表現。事實上，這裡一點馬克思主義底氣味都沒有，因為在無產階級革命前夜對農民問題這樣重大的問題採取冷淡態度，這在實際上就是否認無產階級專政，這無疑義的是表示背叛馬克思主義。

問題是這樣：因為農民生存底某些條件而隱藏在農民裡面的革命可能性，是不是已經用完了呢？如果還沒有用完，那麼，是不是還有希望，還有根據為着無產階級革命來利用這種可能性呢？是不是可以將農民，將農民中被剝削的大多數，由資產階級底後備軍——在西方各國資產階級革命時他們會是這樣的，而且現在還是這樣的——變為無產階級底後備軍，變為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呢？

列寧主義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就是說，承認大多數農民有革命能力，並且可以為着無產階級專政底利益來利用這種革命的能力。俄國三次革命底歷史完全證實了列寧主義關於這一點的結論。

由此便得出實際的結論，就是說要援助，一定要援助勞動農民群眾為反對奴役及剝削的鬥爭，為擺脫壓迫及貧困的鬥爭。自然這並不是說，無產階級應該援助任何的農民運動，這裡所說的是援助這種第一種農民運動和這樣一種農民運動，這種農民運動和農民鬥爭能够直接或間接便利無產階級解放鬥

動，能够這樣或那樣助長無產階級革命底力量，能够促進將農民變爲無產階級底後備軍和同盟者的事業。

（斯大林：「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

「斯大林選集」，卷一，五一—五四頁）

## （2） 列寧關於工農革命聯盟與無產階級

### 領導權的思想

列寧在其「什麼是「人民之友」」一書裡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關於工農革命聯盟是推翻沙皇制度地主、資產階級的主要工具的思想。……

列寧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一書中，規定了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底基本任務。列寧認爲：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應當首先就把零散的馬克思主義小組，組織成爲統一的社會主義的工人黨。其次，列寧指出說：正是俄國工人階級將在與農民聯盟中去推翻沙皇專制制度，然後俄國無產階級將在與勞動者被剝削者羣衆聯盟中，與他國無產階級並排循着直接的公開政治鬥爭的大道，走向勝利的共產主義革命。

由此可見，還在四十餘年以前，列寧就已經正確指出了工人階級底鬥爭道路，肯定工人階級是社會底先進革命力量的作用，肯定了農民是工人階級底同盟者的作用。

貫注列寧這本書（指「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之兩個策略」——編者）的基本策畧原理，就是關於無產階級能够而且應當成爲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領袖，成爲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領導

黨的忠誠。

列寧承認這個革命底資產階級性質，因為這個革命，正如他所指出的，「不能直接越出祇是民主革命底範圍」。然而，他認為：這個革命不是上層的，而是使整個人民、整個工人階級、整個農民都動作起來的人民革命。……

爲要使由無產階級領導革命的可能變爲現實，爲要使無產階級在事實上成爲資產階級革命底領袖領導者，——爲要做到這個地步，據列寧底意見，至少必須有兩個條件。

爲要做到這個地步，第一、就必須使無產階級具有利於要澈底戰勝沙皇制度、並能够準備接受無產階級領導的同盟者。這是領導思想本身所要求的，因爲如果沒有被領導者，那末領導者就不能成其爲領導者；如果沒有被領導者，那末領袖就不成其爲領袖。列寧認爲這樣的同盟者就是農民。

爲要做到這個地步，第二、就必須使那與無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並力求由自己充當革命底唯一領導者的階級，被逐出領導底舞台、並陷於孤立。這也是領導思想本身所要求的，因爲領導思想本身，是絕對不容許有兩個革命領導者的。列寧認爲這樣的階級就是自由資產階級。

列寧寫道：

「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是爲民主制而澈底奮鬥的戰士。只有在農民群眾加入無產階級底革命鬥爭的條件之下，無產階級才能成爲在爲民主制而奮鬥中獲得勝利的戰士。」（『兩個策略』）其次：

「農民本身包含有很多的半無產者分子。同時包含有小資產階級分子。這就使得它也是不穩定的，並使無產階級不得不團結成爲嚴格的階級的黨。然而，農民底不穩固性是與資產階級的不穩固性，根本不同的，因爲農民在現時所需求的，與其是無條件地保存私有制，倒不如是奪取這私有制主要形式之一的地主土地。農民雖然不因此而成爲社會主義的，雖然不因此而停止其爲小

資產階級的，可是，它成爲民主革命底完全的和最急進的擁護者。只要是啓發農民的革命事件底過程不因資產階級之叛變和無產階級之失敗而中斷得太早，那末，農民必然會成爲這樣的擁護者。在上述條件之下，農民必然會成爲革命與共和國的堡壘，因爲只有獲得完全勝利的革命，才能給農民以土地改革方面的一切，才能給農民以農民所希望的、農民所想像的、爲農民所真正必需的一切。」（同上）

列寧在分析孟什維克底反對意見——孟什維克硬說布爾什維克這樣的策畧「會迫使資產階級退出革命事業，並因此而削弱革命發展規模」，——並且評定他們這些反對意見是「叛賣革命的策畧」，是「變無產階級爲資產階級底可憐尾巴的策畧」時，說道：

「誰真正謀解農民在勝利的俄國革命中的作用，誰就不能說當資產階級退出時，革命的發展規模便會削弱，因爲在事實上，祇有當資產階級退出，而農民群眾以積極革命者資格來協同無產階級一起奮鬥時——祇有那時，俄國革命底真正發展規模才會開始；祇有那時，這才是真正最廣大的、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所可能的革命發展規模。我們的民主革命爲要成爲澈底進行到底的革命，就應當倚據於這樣的一些力量，這些力量能够麻痺資產階級底不可免的不澈底性，也就是說，正是能够「迫使它退出去」。」（同上）

這就是列寧在他所著「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之兩個策畧」一書中所發展了的關於無產階級是資產階級革命之領袖的基本策畧原理，關於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的領導權（領導作用）的基本策畧原理。

這是馬克思主義黨關於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策畧問題的新方針，這個方針是與前此在馬克思主義者武庫中在過的策畧方針有深刻的差別。迄今以前，情形是如彼的，就是在資產階級革命中，例如在西歐，領導作用總是落到資產階級之手，而無產階級不管自己願意不願意，却只得做它的助手

，而農民則是資產階級底後備軍。馬克思主義者當時認為這樣的機會，多多少少是不可免的，但馬上就聲明說，無產階級在這個情形之下應當儘可能地堅持自己的最近的階級要求並應當有它自己的政策。現在，在新的歷史的環境中，照列寧底方針說來，情形却變為如此，就是無產階級已成為資產階級革命的領導力量，資產階級已被排除於革命領導以外，而農民則變成了無產階級底後備軍。

有人說普列漢諾夫「也會主張」無產階級領導權，——這種說法是出於誤會。是的，普列漢諾夫曾向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獻媚，而且曾不嫌在口頭上承認它，然而在事實上，他是反對這個思想底實質的。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意義，就是在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政策之下，在使自由資產階級孤立起來的政策之下，由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起領導作用；但大家都知道，普列漢諾夫却反對孤立自由資產階級的政策，主張與自由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反對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的政策。在事實上，普列漢諾夫底策畧方針，乃是孟什維克的否認無產階級領導的方針。

列寧是擁護資產階級革命之勝利和民主共和國之爭得的，可是，他決沒有想要停留在民主階級上和以資產階級民主任務之完成來限制革命運動底發展規模。反之，列寧認為隨着民主任務之完成，就應當去開始無產階級及其他之剝削群眾底這樣的鬭爭，這個鬭爭已經是為社會主義革命而進行的。列寧知道這個，並認為社會民主黨務須採取一切辦法來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開始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列寧之所以需要工農專政，不是為着在完成革命對沙皇制度的勝利以後，就使革命終止在這上面，而是為着儘可能地延長革命狀態。澈底消滅反革命殘餘，把革命火焰延燒到歐洲去，並在這個時候，既讓無產階級在政治上啓發起來並組織成爲偉大軍隊，——就開始直接進到社會主義革命。

寫道：

列寧說到資產階級革命底發展規模以及馬克思主義黨應當與這發展規模以怎樣的性質時，

寫道：

「無產階級應當把革命進行到底，這就要把農民群眾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強力求擴張

專制制度底反抗，並麻痺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無產階級應當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無產階級者分子群眾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強力來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並麻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這就是無產階級底任務，而「新火星派」(指孟什維克而言)——編者——在自己一切關於革命發展規模的議論和決議中，却把這些任務看得如此狹隘。」

「領導全體人民，特別是領導農民來爲完全自由、爲徹底民主革命、爲共和國而奮鬥！領導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來爲社會主義而奮鬥！革命無產階級的政策，在事實上就應當是如此；階級口號，——工黨在革命時期中應當用以貫徹和規定每個策略問題決定和每個實際步驟的階級口號，——就是如此。」(同上)

這是關於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相互關係問題的新方針，是關於在資產階級革命終結時，在無產階級周圍改組力量以便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新理論——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

列寧在規定這個新方針時所倚據的：第一、就是馬克思關於不停頓革命的著名原理——這個原理是馬克思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期，在「致共產主義者同盟書」中所提出的；第二、就是馬克思關於必須把農民革命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配合起來的著名思想——這個思想是馬克思於一八五六年致恩格斯的信中所說出的，他在這封信內說道：「在德國，全部事情，都將以是否有可能由某種第二版農民戰爭來贊助無產階級革命爲轉移」。然而馬克思這些英明的思想，後來沒有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得到自己的發展，而第二國際底理論家們又採取了一切辦法來把它們埋葬起來，付諸遺忘。一個任務落在列寧身上，——這就是要把已被人忘記的馬克思原理拖到人世中來，並把他們完全恢復起來。然在恢復馬克思這些原理時，列寧並沒有限於——而且也不能限於——簡單把它們重複一下，而是往前發展了它們，把它們改製成爲嚴密的社會主義革命論，並加進了新成份，爲社會主義革命所必需的成

即無產階級與城鄉半無產者分子聯盟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底條件。

這個方針把西歐社會民主黨底策略立場打得粉碎了。西歐社會民主黨底策略立場之出發點，就是認為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後，農民群眾，貧農群眾也包括在內，應當一定會退出革命，因此，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後，應當有一個長久的停頓時期出現，有一個五年至一百年——也許更長的「和睦」時期出現，在這個時期中，在新的社會主義的革命底時機還沒有到來以前，無產階級將「和平地」走着剝削下而資產階級則「合法地」賺得金錢。

這是新的社會主義革命論，實現這革命的無產階級，並不是孤獨去反對全部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而是領導者的無產階級，它有居民中的半無產者分子，有千百萬的「勞動者和被剝削者群眾」為其同盟。

按照這個理論，在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條件下的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的領導權，應當轉變為在無產階級與其餘的勞動者和被剝削者群眾聯盟條件下的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的領導權；而無產階級與農民民主專政，則應當為無產階級底社會主義專政準備基礎。

（「聯共黨史」，莫斯科版，二四，七八，八〇—八三，八六，八八—八九頁）

### (3) 斯大林論俄國共產黨在農

#### 民問題上的三個基本口號

列寧說：任何一個革命底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國家政權問題（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四二頁）。政權集中在那個階級或那些階級手上；那個階級或那些階級，應當如何推翻？那個階級或那些階級應當取得政權？——這就是任何一個革命底最主要的問題。

黨在革命底某個階段整個時期內都發生效力的基本戰畧口號，如果不是完全的或整個地依據列寧底這個基本提綱，就不能稱為基本口號。基本口號只有在下面這種情形之下，才能算正確的，如果他們是建立在對階級力量作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這個基礎上，如果他們規定出階級鬥爭戰線上革命力量應置底正確計劃，如果他們便利於引導羣衆走上爭取革命勝利的鬥爭戰線，如果他們使黨易於從廣大民衆中來組成爲完成這種任務所必須的廣大的和強大的政治軍隊。……

俄國革命第一階段上的基本口號是與全體農民一塊，反對沙皇和地主，中立資產階級，爲達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勝利而鬥爭。……

我們在革命第二個階段上的基本口號——與貧農一塊，反對城市裡的和鄉村裡的資本主義，中立中農，爲無產階級底政權而鬥爭。……

列寧在他的「兩個策畧」這本小冊子裡面早已指出了黨底兩個戰畧口號間的這個基本區別。他把黨在準備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的口號規定如下：

「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爲要做到這點，就要把農民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暴力來打破專制制度底反抗和廢掉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性。」（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十六頁）

換一句話說，就是與全體農民一塊，反對專制制度，中立資產階級，實行民主革命。至於黨在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時的口號，那末他是這樣規定的：

「無產階級應當完成社會主義的革命，爲要做到這點，就要把人民中的半無產階級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暴力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和廢掉農民及小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同上）換句話說，就是與貧農以及人民中一般的半無產階層一塊反對資產階級，中立城市中及鄉村中的小資產階級，實行社會主義革命。

這是一九〇五年寫的。

……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列寧回顧革命所經過了的道路的時候曾經寫道：

「是的，當我們還與整個農民一塊的時候，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這一點我們會最明顯不過地認識到，從一九〇五年起，我們已說過幾百次和幾千次了，我們從來沒有打算去跳過歷史過程底這個必然要經過的階段，也沒有打算用法令把他取消。……可是在一九一七年，從四月起，在十月革命以前好久，在我們奪取政權以前好久的時候，我們就已經公開說過了，並向民眾解釋了：現在，革命決不能停止在這個地方，因為國家已前進了，資本主義已前進了，破產現象已達到了空前的範圍，這種破產現象要求（無論誰願意不願意這一點）要到社會主義去的前進步驟。因為，如果不是這樣，就不能前進，就不能挽救被戰爭摧殘了的國家，就不能減輕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底痛苦。結果正如我們所說過的一樣。革命的進程證明了我們的論斷是正確的。起初與「全體」農民一塊來反對君主制度，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制度（所以革命還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然後與貧農一塊，與半無產階級一塊，與一切被剝削者一塊來反對資本主義，就中也反對鄉村富人、富農、投機商人，所以革命就變成爲社會主義的。」（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九〇至三九二頁）

由此可見，列寧曾經屢次着重指出，第一個戰畧口號——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準備時期內的戰畧口號與第二個戰畧口號——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的戰畧口號之間有極端深刻的區別。在那裡的口號：與全體農民一塊來反對專制制度，在這裡的口號：與貧農一塊來反對資產階級。……

正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後，使中農中立的政策，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上被取消了（而不是被實施了）。正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後，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寧在我們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致開幕辭時說過：

「舊時的社會主義底優秀代表——當他們還相信革命和在理論上及思想上替革命出力的時候

——會說迫使農民中立，就是說，使中農雖不能變成積極幫助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社會階層，那麼，至少也使他變成一個不妨礙革命、取中立態度、不站在我們的敵人方面的一個社會階層。這個抽象的、理論上的對任務的提法，對於我們是完全明白的。可是這種提法是不夠的。我們已經走進了社會主義建設這樣一個階段，在這樣一個階段上，需要具體的、詳細地規定出一種為鄉村工作經驗所考驗過了的、基本規則和指示，我們應當遵照這些規則和指示，來對中農採取堅固聯盟底立場。」（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一四頁）

當還在進行推翻資產階級的時候，當蘇維埃政權還沒有鞏固的時候，中農就灰心呻吟着，還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動搖着，因此也就不得不使它中立。當中農已開始相信資產階級是「真的」被推翻了，相信蘇維埃政權是在鞏固起來、正在戰勝富農、紅軍開始在內戰的戰線上、取得勝利的時候，它便開始轉到了我們這方面來。正是在這樣的轉變之後，黨的第三個戰畧口號才有可能提出來，這口號就是列寧在黨底第八次大會上所提出的：「依靠貧農並與中農建立鞏固的聯盟——向前去實行社會主義建設。」

（斯大林：「關於黨在農民問題上的三個基本口號」，「斯大林選集」，卷三）

## （二） 聯合農民，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一） 列寧論資產階級不能實行民主革命到底；

農民能夠實行到底；無產階級必須聯合農民

## 民，澈底完成民主革命

……全部資產階級只要滿足了自私自利的狹隘的利益，只要「離開」澈底的民主主義（它現在已經開始離開澈底的民主主義了！），它必然地即刻轉到反革命方面，轉到專制政府方面，以反對革命，反對人民。餘下的便只有「人民」，即無產階級和農民；無產階級是幹到底的，因為只有它才能永遠走出民主革命底範圍。因此，無產階級站在革命陣頭上為共和制度而奮鬥，對於一切愚笨而無價值的規勸——不要使資產階級離開革命等話，堅決置之不理。

農民本身包含有很多的半無產者分子，同時包含有小資產階級分子。這就是使得它也是不穩定的，並使無產階級不得不團結成爲嚴格的階級黨。然而，農民底不穩定性是與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性，根本不同的。因為農民在現時所需求的，與其是無條件地保存私有制，倒不如是奪取這私有制主要形式之一的地主土地。農民雖然不因此而成爲社會主義的，雖然不因此而停止其爲小資產階級的，可是，它能爲民主革命完全的和最急進的擁護者。只要是啓發農民的革命事件底進程不因資產階級之反變而無產階級之失敗而中斷得太早，那末，農民必然會成爲這樣的擁護者。在上述條件之下，農民必然會成爲革命與共和國底堡壘。因爲只有獲得完全勝利的革命，才能給農民以土地改革方面的一切，才能給農民以農民所希望的、爲農民所真正必需的一切，當然不是如「社會革命黨員」所想的——要消滅資本主義，而是要使自身脫離半農奴制的束縛，脫離奴隸的黑暗境遇，以便於商品經濟可能的範圍之內改良自己的生活條件。

不但如此，不僅是急進的土地改革促進農民傾向於革命，而且農民的一般日常生活利益亦推動它自身起來革命。甚至在與資產階級的鬭爭中，農民也需要民主制，因爲只有民主制度能確切發現農民的利益，能表現它在民眾中佔大多數的優越地位。農民覺悟程度愈高（自日俄戰爭起，它的覺悟程度

正在特別迅速的提高，這種速度，簡直是許多實用學校尺碼來度量覺悟程度的人們所意想不到的。則它同情於完滿的民主革命也愈是堅決而徹底，因為它不像資產階級一樣，害怕民衆統治，而是希望民衆統治，這種統治於它正是有益。只要農民，開始放棄直率的君主制度，那時民主共和制度便即刻成爲農民底思想，因爲做民間買賣的資產階級底自覺的君主制度（有上議院等），使農民還是一樣的沒有權利，一樣的黑暗，一樣的受壓迫，不過這種制度稍許蓋有歐洲憲法的粉飾罷了。

所以，資產階級自然而且必然跑到自由主義保皇黨旗幟之下，而農民階級——必然要跑到革命共和政黨領導之下。所以資產階級不能實行民主革命到底，而農民能實行這個革命到底，且我們應盡已之所能以幫助農民底這種努力。……

誰真正瞭解農民在勝利的俄國革命中的作用，誰就不能說當資產階級退出時，革命底發展規模便會削弱；因爲在事實上，只有當資產階級退出，而農民階級以積極革命者資格來協同無產階級一起奮鬥時——只有那時，俄國革命底真正的發展規模，才會開始；只有那時，這才是最廣大、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所可能的發展規模。我們的民主革命，爲要成爲徹底進行到底的革命，就應當倚賴於這樣的一些力量，這些力量能够破壞資產階級底不可避免的不徹底性，也就是說，正是能够「迫使它退出去」。

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這就要把農民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強力來撲滅專制制度底反抗，並廢除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無產階級應當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無產者分子群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強力來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並廢除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這就是無產階級的任務，而「新火星派」（指孟什維克而言）——顯然，在自己一切關於革命發展規模的議論和決議中，始終把這些任務看得如此狹隘。

領導全體人民，特別是領導農民來完全自由、爲徹底民主革命爲共和國而奮鬥！領導一切勞動者而被剝削者來爲社會主義而奮鬥！革命無階級政策，在事實上就應當是如此：階級口號——工人黨在革命時期中應當用以貫徹和規定每個政策問題決定和每個實際步驟的階級口號，——就是如此。

（列寧：「兩個策畧」，「列寧選集」，

卷五，二二八—二三二，一四四頁）

## （2） 列寧論以農民革命爲內容的資產階級民

### 主革命：農民革命是民主革命形式之

#### 一、無產階級必須領導這個革命

在整個社會經濟帶着資本主義性質時，一切反對中世紀制度的農民革命，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但不是一切資產階級的革命都是農民革命。假如在某一國度裡，農業完全是照着資本主義方法來經營的，農業資本家在雇用勞動者幫助之下已經完成了土地革命，好比說已經消滅了土地私有制，那末，這個土地革命也是資產階級的革命，但完全不是農民革命。假如在某一國度裡，土地制度與資本主義經濟已經交叉混合，不推倒資本主義，已經不能推倒這種制度，假如這兒發生一次革命把專制政權推倒，而使工業資產階級得着政權，那末，這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而絕對不是農民革命。換句話說，沒有農民的資產階級國度是可能的，在這種國度裡而沒有農民的資產階級革命也是可能的。在農民數目很多的國度裡，可以產生資產階級革命；但是，假若這種革命，沒有使涉及農民的土地關係革命化，沒有使農民變成創造革命的積極的社會力量之一，則這種資產階級革命不是農民革命。所以「資

「階級革命」這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一般的概念，包含着一定的原理，在資本主義正在發展的國度裡面，一切農民革命必須應用這些原理；但是這個廣泛的概念完全沒有說到，某一國度的資產階級的革命爲要得着完全的勝利，是否一定要（按其客觀必然性）變成農民革命。

普列漢諾夫及其隨從他的孟塞維克，在俄國革命第一個時代（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中一切策略路線錯誤的主要根源，就是他們完全沒有懂得一般的資產階級革命和農民的資產階級革命間相互的關係。……

但是一部份馬克思主義者，恰巧就是右派，向來就是持着關於資產階級革命的普遍、抽象、依樣葫蘆的概念，而不能了解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是農民革命的這種特質。所以，社會民主黨右派之不能了解俄國資產階級在俄國革命中反革命性的來源，不能明白決定，在這個革命中，究竟那些階級可以把這個革命進行到底，獲得完全的勝利；不能脫離這樣的觀點：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無產階級必須幫助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主要人物一定是資產階級，假若資產階級退出革命，革命的規模一定要縮小等。他們這些錯誤，都是自然而必然的。

反之，在革命初開始，一九〇五年春夏，那時還沒有人像現在一般毫無見識，毫無智慧地把布爾塞維主義與杯葛主義、戰鬥主義混爲一談，而布爾塞維克在那時就已經很明顯地指出我們在策略上分後底根源，指出農民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形式之一，並認定它的最後勝利爲「工農革命民主的專政」。

在一九〇七年，考茨基考察俄國革命後，立刻就明白了普列漢諾夫底錯誤，當時普氏送了幾個問題要考氏去回答。普氏在這些問題中祇開到俄國革命底資產階級性，沒有提出農民的資產階級革命這個概念來，除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資產階級的在野黨」而外，就沒有其他的東西了。考茨基指出普氏底錯誤而回答說：「俄國資產階級不是革命的動力，在這點上說來，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已經

過去了，在這種革命時代中，只有無產階級與農民中間有堅固共同的利益。」「俄國革命的動力及前途」，「這種共同的利益必須成爲俄國社會民主黨全部革命的基礎。」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策畧間分歧底基礎，在這裡說得非常明顯了。……

這樣我們看見，像俄國資產階級革命這樣的革命，只有在其已成爲農民革命時，才能得着勝利。

（列寧：「俄國社會民主黨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革命中的

土地綱領」，「列寧選集」，卷五，二七九—二八〇頁）

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農民運動恰恰不是社會主義的運動，而是民主主義的運動。農民運動在俄羅斯也是（與其他各國過去一樣）民主革命必然的伴侶，而按其社會經濟內容說，民主革命乃是資產階級的革命。農民運動絕不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底基礎，絕不反對商品經濟，絕不反對資本。正是相反，農民運動是反對鄉村中的舊的、農奴制的、資本主義前期的關係和反對地主的土地佔有制——農奴制度一切殘餘之主要注石。因此農民運動完全的勝利，不剷除資本主義，恰恰相反，它造成資本主義發展更廣泛的基礎，使純粹資本主義的發展迅速起來和劇烈起來。農民暴動完全勝利，只能造成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城垣；在這共和國內，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鬭爭第一次最純粹的擴大起來。……

……俄羅斯現時的農民運動所走的趨向是什麼？即求得土地和自由。這個運動完全的勝利，將有什麼意義？得到了自由，它就排除地主和官吏在國家管理中的統治。得到了土地，它就把地主的土地轉給農民。圓滿的自由和最圓滿的剝奪地主（強奪地主所有的土地）是否能消除商品經濟？不能消除的。最圓滿的自由和最圓滿的剝奪地主，是否能消除在村社、土地上或在「社會化了的」土地上的私有農民經濟？不能消除的。最圓滿的自由和最圓滿的剝奪地主，能否消除多馬多牛的富農和雇農、短工之間，即在農村資產階級和農村無產階級之間深刻的鴻溝？不能消除的。正是相反，上層階級（地

主)受摧殘和消滅越圓滿，則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階級的差別越深刻。農民暴動圓滿的勝利有什麼客觀的意義呢？這個勝利是徹底消滅一切農奴制殘餘，而不是消滅資產階級的經濟制度，不是消滅資本主義，不是消滅社會裡富人和貧人分立的現象，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分立的現象。現時的農民運動何以就是民主的資產階級的運動？因為它要消滅官吏和地主政權，建立民主社會制度，同時，並不改變這們民主社會度資產階級的基礎，不消滅資本的統治。

(列寧：「小資產階級的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列寧選集」卷五，一五五—一五七頁)

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徹底平分土地」或「土地與自由」——這是閉塞而朦朧，可是正在拚命尋找光明和幸福農民群眾最普遍的口號——這個口號是資產階級性的口號。但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應當知道要使無產階級與農民達到真正的自由，除經過資產階級的自由和資產階級的進步底道路外，便沒有第二條道路。我們應當知道：在日前便要趨近社會主義，除完全的政治自由，除民主共和制度，除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外，沒有其他的方法，且不能有其他的方法。無產階級是先進的階級，是毫無條件、毫不猶豫、毫不回顧的唯一革命階級。我們是這個階級的代表，應當盡可能的廣闊、勇敢且積極地把民主革命的任務，在全體民衆前面提出來。藐視這些任務，便無異在理論上侮辱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加以庸俗的曲解，而在實際上與政治上，是無異把革命事業送給資產階級，寧送給必然離開徹底革命的資產階級。

(列寧：「兩個策畧」，「列寧選集」，卷五，一四二頁)

覺悟的工人，社會主義者對於現時的農民運動，應抱何種態度？他們應當擁護這種運動，最努力地幫助農民，最徹底幫助農民把官吏政權和地主政權完全推翻。但是他們同時應當向農民解釋道，只推翻官吏和地主政權還是不夠的。推翻這個政權以後，同時又應準備去消滅資本的政權，資產階級的

政權。要消滅後者的政權，應當立即充分地鼓吹社會主義的學說即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並且聯合、團結和組織農村的無產者，以便與農村資產階級以及俄國全體資產階級作鬥爭。自覺的工人要推進社會主義的鬥爭，是否可以忘掉民主主義的鬥爭，或者在參加民主主義鬥爭時，是否可以忘掉社會主義的鬥爭呢？不，自覺的工人之所以自稱為社會民主派，正是因為他已懂得這兩種鬥爭中間相互的關係。他知道，除了經過民主主義，經過政治自由，便沒有旁的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因此他趨向於圓滿的徹底的實現民主主義，為的是要達到極極的目的——社會主義。民主主義鬥爭的條件和社會主義鬥爭的條件何以不相同？因為在前一種和後一種鬥爭中，工人的同盟者必定是不一樣的。在進行民主主義鬥爭時，工人是與一部份資產階級，特別是與小資產階級一起，而在進行社會主義鬥爭時，工人則要反對全體資產階級了。工人在進行反對官吏與地主的鬥爭時，他可以並且應當與全體農民甚至官農中農一起。而在他與資產階級亦即與富農做鬥爭時，他却只能與農村無產階級一起才是可善的。

（列寧：「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列寧選集」，卷五，一五七——一五八頁）

……在目前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願意幫助小私有者，其目的恰恰不是反對資本主義，而是反對農奴制度，——在目前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幫助小農以大大推動階級鬥爭底發展。實際上，這樣一來，一方面我們作最後的企圖來燃燒起農民對農奴地主的階級仇恨（等級仇恨）底殘餘，另一方面，我們帶清道路來發展鄉村中的資產階級的階級衝突，因為這一衝突，現被農奴制殘餘對全體農民一般的、似乎相同的壓迫性所蒙蔽着。

世界上一切東西都有兩方面。西方的農民私有者，在民主運動中已經盡了自己的作用，現在正在堅持自己對無產階級的特權地位。俄國的農民私有者，現在還處在他所不能不同情的、堅決的和全民

的民主運動底前夜。他的普通心還大於後退心，他反對等級制農奴制的特權（這種特權在俄國還很厲害）比堅持自己的特權地位還更厲害得多。在這樣的歷史時期中，我們簡直一定要幫助農民，設法使他那種還很縹緲曖昧的不滿情緒用來反對他的真正的敵人。……

（列寧：「俄國社會民主黨底土地綱領」，

「列寧選集」，卷三，三六八—三六九頁）

「農民問題」的提出，大會（指布爾塞維克在倫敦所召開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編者）與臨時大會（指孟塞維克在日內瓦召開的臨時大會——編者）的態度，是完全不同的。代表大會製定了關於「對農民運動的態度」的決議。臨時大會的決議——是關於「在農民中的工作」。前者，是把為全民利益而與沙皇制度鬥爭的廣泛的民主革命運動之領導任務，看成爲第一等重要；後者，則把全部問題歸結到在特殊階層中的「工作」，前者提出了中心的、實行的鼓動口號——立即組織革命農民委員會來實行一切民主改革。後者則是「組織委員會的要求」應該提交立憲會議。爲什麼我們一定要等候這個立憲會議？它是否實際上能夠成爲立憲的呢？如果不預先地、同時地組織革命農民委員會，這種大會是否能夠穩固呢？所有這些問題，都爲臨時大會所忽略了。臨時大會所有的決議都反映出這樣一個一般的見解——在資產階級革命中，我們應該儘量實行自己的專門的工作，不要以領導全部民主運動和獨立進行這個運動爲目的。……

（列寧：「兩個策略」，單行本，一一一頁）

……現在必須更準確地規定：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向來所指示的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解放運動中的領導作用，就是指導農民的領導作用。指導農民去幹什麼呢？就是幹最徹底的、最堅決的資產階級的革命。錯誤（編者按：係指俄國一部分社會民主派如波里索夫等誇大了俄國農業資本主義發展程度而言）之改正就在：我們必須提出與整個舊的農村制度作鬥爭的任務，來代替與農村制度中舊的殘餘作

國家的局部任務。我們已決定消滅地主的經濟，而不是清洗地主的經濟。……

(列寧：「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革命中的土地綱領」，「列寧選集」，卷五，二四五至二四六頁)

### (3) 列寧論農民要求土地國有

根據上述觀點，再去觀察十九世紀後半期俄國的土地進化吧。

所謂俄國「偉大的」農村改良，農民土地之被割，農民之遷居於「沙土」，利用武力槍殺及肉刑來實現新的土地關係，這些到底是什麼呢？這是為了剛才誕生的農業資本主義的利益，第一次利用強力來大批壓迫農民。這是幫助資本主義而實行的地主式的「清洗田產」。

斯托雷平根據基本法八十七條所公佈的土地法又是什麼呢？這是鼓勵富農來搶奪村社，這是為了「一小部分富裕業主的利益，以群眾迅速破產的代價，來破壞舊的土地關係。這是為了資本主義利益」，用強力壓迫農民的第二步。這是第二次地主式的，為資本主義「清洗田產」。

俄國革命中勞動派的土地國有主張又是什麼呢？

這是農民式的為資本主義「清洗田產」。

所有土地市有派一切錯誤的根源，就是他們不懂得俄國資產階級的土地革命的經濟基礎及其兩種可能的——地主資產階級的及農民資產階級的——形式。不「清洗」一切中世紀的土地關係與制度，亞洲式、封建式的關係與制度，農業中的資產階級革命，是沒法可以完成的；因為資本根據經濟的必然性，必須建設新的能夠適應自由貿易的農業新條件的土地關係。為要清洗一般土地關係中及舊的土地佔有制方面的中世紀遺孽，首先必須涉及地主及農民份地，因為這兩種土地佔有制度在其原有形式下，只能適合工役式、束縛式的剝削，而不適合於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斯托雷平的「清洗」，只

然是使俄國走上進步的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可是這種「清洗」只能完全適合地主底利益；讓富裕農民交給「農民」銀行（請讀作「地主銀行」）以三倍的價格；我們呢，就給他們以自由去搶奪村社，去用強力剝削群眾，去圍圍自己的土地，去驅逐貧農，去破壞農村生活底基礎，不顧一切，不顧大批「祖居」的農民生活與經濟，而去建設新的脫離村社的田莊，去建設新的資本主義的農業。這條路線，自有其無條件的經濟意義，因為這條路線很正確地表示出在地主（漸漸變成翁克的地主）統治之下發展底真實進程。

什麼是另一條所謂農民的路線呢？或者，這條路線，在經濟上是不可能的；那末，由農民來沒收地主土地，實行農民土地革命等等的話，不過是誇大之言或是空虛的幻想罷了。或者，這條路線，在資產階級社會裡某一種分子戰勝資產階級社會其他分子的條件下，在經濟上是可能的；那末，我們自己必須具有明確的了解，必須很清楚的告訴民眾，什麼是這種發展的具體條件，什麼是農民改造舊土地關係、建設新的資本主義關係的條件。

這裡一定要發生這樣一種思想：這條農民路線，就是分割地主土地要變成農民的地產。好罷，但是爲要使這種分割，能够符合新的資本主義的農業條件，這種分割必須用新的方法，而不是用舊的方法來實行的。所以，分割不能以幾百年前照地主豪紳或亞洲式專制官吏之意志而分配的農民份地爲其基礎，而必須以自由的、商品的農業要求爲基礎。爲要滿足資本主義的要求，分割必須成爲自由資本主義農民間的分割，而不是「守舊的」農民間的分割；因爲在後一種農民中，大半數都是用傳統的習慣，適應宗法社會的方法，而不是用資本主義的方法經營生產的。根據舊的標準，即適應於舊的農民份地佔有制的分割，並不是清洗舊的土地所有制，而是使其永遠保存起來；並不是爲資本主義解放發展的道路，而是以大批無用的、不相適應的「怠惰者」，以大批不能變成資本主義農業企業者的一意「惰者」，來束縛資本主義。爲要使分割成爲進步性的分割，就要在農民中實行「劃分額」，使資本主義

農業企業者與老朽糞分開來。這種新的分類，就是土地國有，就是完全消滅土地私有制，完全自由經營土地，自由地從舊的農民形成資本主義農民。

請把現時的農民經濟與份地的（即舊式農民的）佔有制性質考慮一下吧。「由村社而聯入微小的行政的、納稅的、土地佔有的組合之內的農民，根據他們份地與納稅之多寡，分成了許許多多的種類」。只要看沙拉諾夫一省土地統計冊，就可以知道，該省農民，是分成了以下幾種：賜地上的農民、私有主、完全的私有主、國產上的農民、國產上佔有四分之一份地的農民、由地主地產上的農民變成的國產上的農民、皇產農民、國產佃戶、無地農民、由地主地產上的農民所變成的私有主、買田莊的農民、由過去皇產農民所變成的私有主、移殖來的私有主、移居來的農民、過去是地主的農民後來變成賜地上的農民、由過去國產農民變成的私有主、解放後的農奴、不做工役的農民、自由耕種者、執行暫時義務的農民、過去工廠的農民，以外還有編入的農民、遷來的農民等等。這許多種類，是以土地關係歷史及份地與納稅之多寡而互相區別的。而在各類中，又有很多很多同樣的分門別類；有時一個鄉村的情形，分成兩個絕對不同的種類：「過去某某老爺的農民」與「某某太太的農民」。這一種複雜的情形，在中世紀是自然而且必需的現象」。假若現在分割地主土地時，是適應着這個封建式的土地佔有制的——無論按同一標準以補充份地（即平分），或是使新舊土地得着同一的比例——則這種分割，不但不能保障被分的土地來符合資本主義農業的要求，並且使這種不符合，更形固定起來。這種分割一定要妨礙社會的進化，使新的受舊的束縛，而不能把新的從舊的中間解放出來。所以只有土地國有，才是真正的解放，土地國有可以產生資本主義農民，可以使資本主義農民經濟，脫離一切舊的關係，脫離一切中世紀的土地佔有關係，而很快的形成起來。

在農奴解放後的俄國，中世紀農民份地上資本主義之進化是這樣進行的，即進步的經濟分子逐漸脫離份地之統治的影響。一方面，無產者或拋棄其份地，或出租其份地，或荒蕪其份地，結果能得解

放出來。他方面，農業主也已解放出來，他們或購買土地或租入土地，而後在中世紀式的零塊土地上，建設起新的經濟。俄國現時比較富裕的農民（即在革命勝利時可以真正變成自由的資本主義的農民）所藉以經營的土地，一部分是他自己的份地，一部分是從鄰近村社社員租來的土地；或許一部分是向國家長期租來的土地，一部分是從地主按年租來的土地，二部分是從銀行購買來的土地等。資本主義要求取消這部分土地間的差別，俾能使土地上一切經濟，完全適應市場要求及其新條件，適應資本主義農業的要求。土地國有就是用革命的方法，來執行這個要求，使人民一下就完全把中世紀土地所有制各種腐舊的古董形式，一概掃除。不要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不要農民的份地所有制，而只要新的、自由的土地所有制；這是急進的農民底口號。這個口號最能真確地澈底地堅決地表示資本主義（急進的農民很幼稚地怕說資本主義這幾個字）利益，表示商品生產條件下土地生產力最高發展的利益。……

俄國革命中爲土地的鬭爭，不外是爲了資本主義發展之革新道路的鬭爭。這種革新最澈底的口號，就是土地國有。

推翻舊制度的革命道路，則須要造成這樣的經濟基礎——推翻一切舊的土地佔有形式，同樣要推翻俄國一切舊的政治機關。俄國革命第一時期已經澈底證明：俄國革命只有當它是一個農民土地革命時才能獲得勝利，而農民土地革命如果不實行土地國有，它就不能完全完成他全部歷史的使命。

（列寧：『俄國社會民主黨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革命中的土地綱領』，『列寧選集』，卷五，二二九—二三三，二四六頁）

我們的任務只有一個：團結無產階級去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同時要幫助一切反對舊制度的儘量堅決的鬭爭，堅持無產階級在發展着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所能獲得的最好的條件。從這裡所必然得出的結論，就是社會民主黨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的綱領，只能是土地國有。我們應當將土地國有綱領（正如本

黨黨其他部分一樣）與一定的政治改革形式與程度聯繫起來，因為政治革命與土地革命兩者的規模不能不是一致的。我們應當將土地國有綱領（正如本黨黨綱其他部分一樣）和一切小資產階級幻想，和一切知識分子官吏所謂「標準」這一類的廢話，和那種想鞏固農村公社及平均使用原則等反動詞調等，截然分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是要求為這個或那個資產階級革命造出一種特殊的口號，特殊的「計劃」與「系統」，而是在徹底表現這個革命的客觀條件，經濟上不可克服的條件，而掃除一切幻想與空想。土地國有不僅是唯一可以完全肅清農業中世紀制度的方法，而且是造成資本主義農業關係的最適當的方法。（同上，二九八頁）

#### （4） 列寧論土地革命必須與政治革命聯系

……反對反動勢力與鞏固果實的柱石祇有一種：就是無產階級與農民群眾底覺悟性與組織性。在集中化的資本主義的國家政權之內（資本主義國家之集中化，這並不是由於官僚底意志所使然，乃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無產階級與農民群眾底這種組織性，應集中成為全國一致的力量。沒有集中的農民運動，沒有全國集中化的、在集中化的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政治鬥爭，則任何可以值得「空談」的真正的「革命果實」是不會有的，「反對反動勢力的柱石」也是不會有的。

若不完全推倒地主的政權，完全消滅地主的土地佔有制，真正民主的地方自治機關是不可能的；蓋羅克在口頭上承認這點，但他們不願去想一想，究竟這在實際上是什麼一回事。在實際上，假若革命的階級不去奪取全國的政權，則這地方自治機關民主化是不能實現的；而二年來的革命似乎使最簡單的「農中人」也要覺悟了：在俄國，這種革命階級，祇是無產階級與農民。先生們！你們所說的「農民的土地革命」如果要真正變成農民土地革命，真正成為農民革命，就必須使自己變成全國的中央的政權，而後才能獲得勝利。

只有民主的農民底這個中央政權底部分，才可以真正變成民主的地方自治機關，只有同地方的區域的、農民底分散性鬭爭。只有宣傳、準備并組織全國集中的運動，才能幫助「農民土地革命」底事業，而不使農民受其鄉土地方觀念所愚弄。普列漢諾夫與約翰兩同志，你們宣傳這種妄誕的極反動的思想，以為地方自治機關可以變成「反對反動勢力的柱石」與「鞏固革命果實的保障」，實際上你們就是獎勵農民底鄉土地方觀念。二年來革命的過程已經非常明顯地告訴我們：農民運動（兵士運動也是農民運動的一部份）底分散性，乃是革命失敗底最大原因。

提出「農民土地革命」底綱領時，只說到地方自治機關底民主化，而不說到中央政權底民主化，認為只有地方自治機關是「柱石」、是「保障」，老實說起來，這同立憲民主黨與反動派妥協簡直沒有什麼分別呵！

……不要忘記，在土地革命的規模與政治革命的規模間是不會不是相互適應的，而經濟革命又需要與政治上層建築互相適合。……

毫無疑義的，地主經濟不僅與官僚而且與資產階級千絲萬縷地連繫着。土地沒收就破壞了大資產階級的大批利益。考茨基說得好，農民革命要使國家破產，這就是說農民革命不僅破壞俄國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破壞國際資產階級的利益。非常明顯的，在這樣的條件之下，農民革命的勝利，小有產者戰勝地主及大資本家的勝利，需要特別好的環境，需要在唐人或庸俗歷史家看來全然非常的「樂觀的」假定，需要農民底很大的自動性、很多革命精力、自覺性、組織性以及豐富的民衆創造力。這是不可以駁倒的，而普列漢諾夫對最後的幾個字（豐富的創造力）的庸俗譏笑，乃是一種企圖脫離嚴重問題的便宜詭計。因為商品生產不是聯結與集中農民，而是破壞與分離農民，所以在資產階級國家內，農民革命只有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才可以實現；而這一種情形又使全世界强有力的資產階級更加

起來反對這種革命。

由此能否下一斷語，說馬克思主義者應當拋棄農民土地革命這種思想呢？不能的，祇有那些把馬克思主義變成自由主義的人們可以滿意這個結論。由上所述，祇能得着以下的三點：(一)馬克思主義不能把俄國社會主義的命運維繫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結局；(二)馬克思主義必須顧及俄國農業資本主義發展的兩種可能的道路，而很明顯地向民眾解說每條道路的條件與意義；(三)馬克思主義必須堅決反對那種認為急進的俄國土地革命可以用不着急進的政治革命的觀點。

一、社會革命黨與其他比較激進的民粹派，都不懂得農民革命的資產階級性，把自己整個假社會主義與這種農民革命連繫起來。照着民粹派的意見，農民革命的好結局就是俄國民粹派社會主義底勝利。其實，這種結局乃是民粹派「農民」社會主義最快的最厲害的破產。農民革命底勝利愈完全愈堅決，則農民變成資產階級的自由資本主義農民便愈快，而他們「辭謝」民粹派的「社會主義」亦愈快。反之，不好的結局暫時還可以苟延民粹派社會主義的苦命，暫時還可以保持這樣一種幻想——似乎民粹派批評地主資產階級式的資本主義，就是批評一般的資本主義。

無產階級的政黨，社會民主黨，無論如何總不把社會主義的命運去維繫於資產階級革命的這種結局或那種結局。兩種結局都是資本主義的發展，無產階級都是要受壓迫的，在保有土地私有的地主的君主國內以及在雖然實行了土地國有的資本主義農民共和國內，無產階級都是要受壓迫的。因此，祇有毫無條件獨立的純粹的無產階級政黨可以「在民主土地改革任何情形下」去堅持社會主義的事業。這一點在我關於土地綱領的結論中已經說過了（這一段已經列入斯託哥蘭姆大會的策畧決議中了）。

二、土地革命的兩個結局都是資產階級性的，但是，社會民主黨無論如何不能因此就對這兩種結局，採取同樣的態度。根據工人階級的利益，毫無條件的要求我們盡力去幫助農民的革命，而且要擁護

體無產階級在這革命中的領導作用。我們爲農民革命的好結局而鬭爭，我們應當在群眾中解說，使他們了解，什麼叫做地主式的土地進化道路，這種道路給與勞動衆群多少痛苦（這種痛苦之產生，不是由於資本主義，而是由於資本主義發展之不足）。另一方面，我們又應該解說農民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性和對於農民革命的「社會主義的」希望是無根據的。

三、我既然認爲幫助農民革命是我們的任務，我們必須明白地自覺到這種任務的困難處，自覺的使政治改革與土地改革互相適應起來。否則，把土地的「樂觀主義」（沒收土地和土地市有或分割）與政治的「悲觀主義」（諸伏雷德斯基：中央政權「次等」民主化）合併起來，這在科學上是沒有根據，而在實際上是完全反動的。

農民假若不推倒舊政權、常備軍以及官僚，它就不能實現土地革命；因爲所有這些都是地主土地佔有制的最靠得住的柱石，都與這種制度有密切的關係。所以認爲不必完全破壞中央機關，僅是實現地方機關民主化就可實現土地革命的觀念，在科學上是站不住腳的，而在實際上是反動的，因爲這種觀點可以被小資產階級的愚笨性及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所利用，而它們（愚笨性及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把事情看得這樣簡陋：土地是要的，政治呢，只有上帝才知道！所有土地都要奪取，至於不要奪去整個政權，能不能奪取整個政權，怎樣去奪取，這些問題，農民都沒有看到。

社會革命黨人不去反對農民對於激進土地革命與激進政治革命互相連繫的不了解，反而和農民同唱一個調子。他們以爲這樣「比較合乎實際」，但是這種辦法使農民的士地綱領絕對不着勝利。激進的政治革命是很難的，這當然不必說了，但土地革命也是很難的，後者若不與前者連繫起來那就成爲不可能的了；而社會主義者的責任就在：不是蒙蔽農民，不是給農民以面罩（即不正確的半立憲民主主義的詞句，例如我們的土地綱領中「民主國家」等語來蒙蔽農民），而是要解說到底，教導農民，假若在政治上不堅持到底，是不能嚴格談到沒收地主土地的。

〔列寧〕：『俄國社會民主黨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革命中的土地綱領』，『列寧選集』，卷五，二五五、二五七、二七〇—二七五頁。

### (5) 列寧論無產階級政黨

#### 在民主革命中必須保持嚴格的獨立性

這樣以來，要把純粹無產階級的鬥爭與一般民主主義的鬥爭聯合起來，但不要把這兩種鬥爭混合起來。要幫助一般的民主主義的與全體農民的鬥爭，絕不是與這種非階級的鬥爭溶合起來，絕不是用「社會化」一類的假話把它理想化起來，絕不是一刻忘記組織城市和農村無產階級而成爲完全獨立的階級的社會民主黨。這個黨徹底幫助最堅決的民主主義，但它決不受那種想在商品經濟下造成「平均性」的反動幻想與嘗試所迷惑，而離開革命的道路。農民與地主間的鬥爭現在是革命的，沒收地主的土地在此刻政治和經濟的進化中一切關係上都是革命的，所以我們要幫助這種革命的民主主義的辦法。但是如果認爲這個辦法是「社會化」，以爲在商品經濟下有「平均」土地使用的可能而自欺欺人，那便是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我們要把這種空想送給社會黨人的反動派去。

〔列寧〕：『小資產階級的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列寧選集』，卷五，一六一—一六二頁。

問題不在於這部分社會民主派或那部分社會民主派願不願被資產階級民主派所同化，他們自覺還是不自覺被人去同化——關於這點根本談不到。我們不懷疑到社會民主派中誰有這類的願望，況且這問題與願望沒有關係。問題也不在於這部分社會民主派或那部分社會民主派能否在全部革命過程中在形式上與資產階級民主派截然分開，保存自己形式上的獨立性，形式上的特殊性。他們儘可不僅宣佈

獨立性」，而且儘可在形式上保存這種獨立性，但事實結果中，也許他們與資產階級底不澈底性奮鬥時，還使自己束縛手足。雖然能够保有形式上的「獨立」，雖然能够保持社會民主派組織上的完全特殊性，但革命最後的政治總結，也許表現它在事實上不能獨立，表現它不能對於事變行程顯示出無產階級底獨立性；也許政治鬥爭最後的結果，表現它完全沒有力量，而自身的被「同化」於資產階級民主派中去，反而成了一個歷史的事實。

◎ 這才是真正危險底所在。……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這問題要看各種社會力量動作底客觀配合如何才能決定。

……馬克思主義者在現在革命時期好久以前對於俄國實際情況的全部理論上的分析，以及對於革命事變發展的一切實際上的觀察，都證明給我們看，俄國革命有兩種可能的行程和結局，按資產階級民主方向來改革俄國現有經濟政治制度，這是必然而且不可避免的。地球上沒有這樣一種力量能够阻礙這種改革。但按現在各社會力量動作底配合，可有兩種結果或兩種改革方式，二者必居其一：（一）或是「革命能澈底戰勝沙皇制度」；（二）或是達到澈底勝利的力量不够，結果，沙皇制度與資產階級中最「不澈底的」、最「自私自利」的分子分處妥協。一切形形色色的詳細配合情形，雖然誰也不能預先斷定，而全體結算起來，總不外乎上述兩種結局：或是前一結局，或是後一結局。……

只有民主革命完全勝利時，無產階級在與不澈底的資產階級奮鬥中不致自己束縛手足，也只有這個時候，無產階級方不致同化於資產階級民主派中去，而對於全部革命過程，都能與以無產階級的標記，正確點說，與以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標記。

凡是社會民主派，都應當時刻不要忘記，無產階級爲着社會主義，是必然要與民主共和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鬥爭的。這是毫無疑義的。

由此產生出無條件的義務，就是應當是獨立的、自由的、嚴格的階級政黨。由此也產生出我們與資產階級的「共同鬥爭」，是帶着臨時的性質，「對待同盟者應像對待敵人一樣」，應該嚴格地加以

這話。凡此等等，都是毫無意義的。但當國工與忘記，不顧或輕視目前臨時的過渡的緊急任務，那便是笑話，便是反動。……

（列寧：『兩個策畧』，『列寧選集』，卷五，九九—一〇五，一一〇頁）

## （6） 列寧論工農革命民主專政是徹底完成

### 民主革命及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惟一保證

何謂「革命徹底戰勝沙皇制度」呢？我們在上面說過，當「新火星派」運用這個概念時，連這個概念最近的政治意義都不懂。他們對於這個概念底階級意義之認識，那更是淺薄了。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應該確切估計一下，究竟與「沙皇制度」這是一個完全實際的且是大家所知道的力量對立，且能「徹底戰勝」它的，是什麼實際社會力量。資產階級、地主、工廠主以及跟着解放派走的「社團」是不能成爲這種社會力量的。我們知道，這些社會分子，甚至不願意徹底勝利。我們知道，他們按其階級地位是不能與沙皇制度堅決鬪爭的，因爲私有財產、資本、土地把他們的關係得太重了，幹不了堅決的鬪爭。因爲他們爲反對無產階級與農民，太需要沙皇制度及其警察官僚和軍事力量了，不能爲推翻專制而奮鬥。能够徹底戰勝沙皇制度的力量，只有人民，如果拿資本的最大力量來看，就是無產階級和農民，而城市與鄉村的小資產階級（也是「人民」），可就這兩個階級力量來分掃進去。「革命之徹底戰勝沙皇制度」，就是實現無產階級與農民底革命民主專政。……這們勝利將正是專政，就是說，它將必不可免地應當憑藉於軍事力量，憑藉於警察武裝，憑藉於起義，而不是憑藉於這或那種「合法的」、「和平的手段」建立起來的機關。這只能是專政，因爲實現爲無產階級和農民所立刻和一定需要的改造，會引起地主、大資本家以及沙皇制度之於命的反抗。沒有專政，就沒有

可能打破這僥倖反抗，擊潰反革命的企圖。然而，這當然不是社會主義的，而是民主主義的專政。它不能（如黎不經過革命發展中的許多中間階段的話）觸動資本主義基礎。它最多只能實行根本重分地產以利于農民；實現徹底的和完全的民主制度，直到共和國為止；把亞洲式的、奴役性的一切特徵不僅僅從農村生活而且從工廠生活中連根剷去；奠定認真改善工人生活狀況和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基礎；最後——就次序來講，而不是就重要性來講——把革命火焰延燒到歐洲。這樣的勝利，還絲毫不會把我國資產階級革命，變為社會主義的革命；民主的革命不會直接越過資產階級社會經濟關係的範圍；然而，這樣的勝利真意義，對於無論是俄國，無論是全世界底將來的發展，都畢竟是極大的。任何東西，都不能把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精力提高到這樣的程度；任何東西，都不能如此厲害地把達到無產階級完全勝利的道路縮短，如同已在俄國開始的革命底這個徹底勝利一樣。……

「前進報」已正確說明：究竟有何種實際的一可能把政權掌握在自己手裡——這個可能，即在於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在於工農聯合的群眾的力量——唯一能夠戰勝一切反革命的力量，在於民主改革方面工農利益之必然的一致。……

反對「工農革命民主專政」一口號的意見有好幾種，其中有一種，認為專政應以「共同意志」為條件（見「火皇」第九十五期），而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沒有共同意志之可能。這種意見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它對於共同意志一觀念，是根據抽象的「玄學的」態度來解釋的。不知意志在某一方面是可以共同的，而在另一方面是不可以共同的。在社會主義問題上和為實現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沒有共同意志，但這不是說，在民主主義問題上和為實現共和政體的鬥爭中也沒有共同意志。如果志記了這一點，就等於志記了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在邏輯上和歷史上的分別。如果志記了這一點，就等於志記了民主主義革命底全民性質；若是一全民的，那就是說這裡有一個「共同意志」，因為民主主義的革命是一個實現全民需要與要求的革命，超乎民主主義範圍以外，自然說不上無產階級與農村

資產階級革命——這兩句話的對立，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民主共和制度下，這種階級鬥爭將成爲社會主義的深淵，而且最普遍的人民鬥爭。

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像世間一切其他事物一樣，是有其過去與將來兩方面的。其過去的方面爲專制制度，農奴制度，君主政體，特權等。在與這個過去、與反革命作鬥爭時，無產階級與農民有一共同意志——之可能，因爲他們有共同的利益。

其將來的方面——是反對私有財產制，雇傭工人反對主人的鬥爭（在自由條件之下，資本主義發展將更爲廣泛而迅速，很快的就要消滅這個意志底同一性，而且反革命與反動被壓倒得越遠，則這同一性，便越消滅得迅速——較者）。因爲這裡的道路，不是由專制制度達到共和制度的道路，而是由小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度達到社會主義的道路。

與專制鬥爭，是社會主義者一個臨時的過渡任務，但若不顧或輕視這個任務，便無異叛賣社會主義，爲反革命當工具。工農革命民主專政自然只是社會主義者一個臨時的過渡任務，但若在民主革命時期把這個責任置諸不顧，那簡直是反動。

（列寧：「兩個黨派」）

## （7） 斯大林論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農民

這一時期是從俄國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起到第二次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止。這一時期的特點，就是農民擺脫自由資產階級底影響，離開立憲民主黨，而轉到無產階級方面，轉到布爾塞維克黨方面來。這一時期的歷史，乃是立憲民主黨人（自由資產階級）與布爾塞維克黨人（無產階級）彼此爲爭取農民而鬥爭的歷史。國會時期底決定了這鬥爭的命運，因爲四次國會底時期給了農民一個

實踐的教訓，而這個教訓明白告訴農民說，他們從立憲民主黨人手中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沙皇是完全幫助地主，而立憲民主黨人則是擁護沙皇的；農民只可以指望唯一力量底幫助，這唯一力量就是城市工人——無產階級。帝國主義戰爭是證實了國會時期底教訓，使農民完全離開資產階級，使自由資產階級完全陷於孤立狀態。因為幾年的戰爭，證明了希望從沙皇及其資產階級的同盟者那裡得到和平，這完全是虛幻的，完全是欺騙的。沒有國會時期的明白教訓，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就會沒有可能。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工黨聯盟，便是這樣形成起來的。在為推翻沙皇制度的共同鬥爭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便是這樣形成起來的，這種領導權結果弄到了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

大家知道，四方各國（英、法、德、奧）底資產階級革命，曾經是按照另一條道路進行的。那裡，革命中的領導權，不是屬於當時還由於自己的幼稚而沒有成爲、並且不能成爲獨立的政治力量的這個無產階級，而是屬於自由資產階級。那裡，農民脫離農奴制度而得到的解放，並不是從當時人數尚少而且又沒有組織的無產階級手裡得來的，而是從資產階級手裡得來的。當時在那裡，農民是與自由資產階級一起去反對舊制度的。當時在那裡，農民是資產階級底後備軍。因此，在那裡，革命底結果，使得資產階級底政治力量大大加強了。

在俄國，恰恰相反，資產階級革命給了直接相反的結果。俄國革命底結果沒有資產階級底政治力量加強，反而使它削弱了，沒有使它的政治後備軍增加，反而使它喪失了基本的後備軍，就是說喪失了農民。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不是把自由資產階級推舉到了首位，而是把革命無產階級推舉到了首位，它把數千百萬農民團結到了革命的無產階級底周圍。

這一點，也就是以下這件事實底原因之一，這事實就是：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在比較短促的時間內就轉變成爲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領導權，曾經是無產階級專政底萌芽和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

的過渡階段。

俄國革命爲什麼有這種在西方各國資產階級革命歷史上海有看見過的特殊現象呢？這種特殊現象是從那裡得來的呢？

這是因爲在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當時是在比以前西方各國更發展的階級鬥爭條件下面發展着的，因爲俄國無產階級到這時候已經成了獨立的政治力量，而自由資產階級則因懼怕無產階級底革命性，喪失了任何革命性的氣味（尤其在一九〇五年的教訓以後），並與沙皇及地主聯盟起來反對革命，反對工農。

必須注意以下的一些決定了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底特殊性的情況：

(1) 革命前夜俄國工業底空前的集中，比方，大家知道，俄國全體工人僅百分之五十四是在有五百工人以上的企業裏做工的，而在美國這樣的工業發展的國家裡，在這樣的大工廠裡做工的工人不過佔全體工人百分之三十三。顯然用不着證明，光是這一個情況，在具備有像布爾塞維克黨那樣的革命政黨的情形之下，就使俄國無產階級變成了全國政治生活裡的最偉大的力量。

(2) 企業裡的惡劣無比的剝削形式，加上了沙皇衛戍兵底難堪的警察壓制——這種情況便使工人底每一個嚴重的罷工都變成了偉大的政治行動，並把工人階級鍛鍊成爲革命到底的力量。

(3) 俄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萎靡不振，到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竟變成了沙皇政府底備後和公開的反革命派。這不僅是因爲俄國無產階級底革命性，把俄國資產階級拋到了沙皇制度底懷抱，而且是因爲俄國資產階級直接依賴於政府的定貨。

(4) 當時在鄉村中存在着最惡劣的和最難堪的農奴制度殘餘，更加上地主底專權——這種情況就把農民捲入了革命的漩渦。

(5) 沙皇制度壓制了一類有生機的東西，它的專橫更加深了，資本家底和地主底壓迫——這種情

況就把工人和農民底鬥爭命爲整個的革命的巨流。

(6) 帝國主義戰爭把俄國政治生活中這一切矛盾匯合成了深刻的革命危機，並給革命以莫大的進攻力量。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農民趨向那裡去呢？農民向誰求得援助來反對地主底專權？反對沙皇的專橫？反對那個害死人的、破壞了農民經濟的戰爭呢？向自由資產階級嗎？但是它是敵人——四次國會底多年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向社會革命黨人嗎？社會革命黨人當然比立憲民主黨人「好些」，他們的政綱也是一「適合的」，差不多是農民政綱。但是如果社會革命黨人祇想依靠農民，如果他們在敵人的勢力底主要來源地——城市的中沒有力量，那他們能幹出什麼事情呢？什麼地方有一種新的力量，無論在鄉村或城市中，都能不顧一切勇敢站在前線上與沙皇及地主作戰，並幫助農民擺脫束縛制，擺脫沒有土地的地位，擺脫壓迫制，擺脫戰爭呢？在俄國，一般說來，當時是不是有這樣的力量呢？是有的，這就是俄國無產階級。它還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就已經表示了自己的力量、自己的鬥爭到底的能力、自己的勇氣、自己的革命性。

無論如何，別的同樣的力量，是沒有的，並且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取得別的同樣的力量。正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農民離開立憲民主黨人而親近社會革命黨人的時候，同時就懂得了必須服從俄國無產階級這個勇敢的革命領袖底領導。

這就是決定了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特殊的一些情況。

(斯大林：「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斯大林選集」卷一，五四——五八頁)

### (三) 聯合資產階級實行社會主義革命

## (1) 列寧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

### 所提出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

不必花費多大的工夫，就可以證明一點，就是列寧會認為，從革命向前發展的觀點上着來，在二月革命以後俄國土地關係上的新現象，並不是無產階級與整個農民之間有了共同利益，而是貧農與富裕農之間發生了分裂，當時貧農傾向於無產階級，而富裕農則跟隨着臨時政府走。請看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與加米業夫及加米業夫派爭論時，關於這一點是怎樣說的：

「現在，來蘇望與貧民有共同利益，這對於無產階級的黨是不可容許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二四五頁）

又說：

「我們在現時就已經在一些農民代表大會底決議上看見一種要等到召集立憲會議的時候才來解決土地問題的幻想——這是傾向於立憲民主黨的豐裕農底勝利。」（參看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彼得格拉全市代表會議上的演說」，「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七六頁）

又說：

「也許農民會拿取一切土地和全部政權。我不但不忘記這個可能性，不把自己的眼界只限於今天一天，而且我在直捷了當地規定土地綱領時，還顧計到這樣的新現象，就是：貧農及貧農與糧民業主間的更深的分裂。」（請參看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間寫的論文——「關於策略的信」，「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〇三頁）在列寧看來，這就是二月革命以後在鄉村裡的新環境中所發生的新的重要現象。這就是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後的時期內，規定黨底政策時的出發

點。

在這個基礎上也就產生了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口號，以代替舊口號——無產階級和農民底專政。

現在來在列寧的著作裡，循序考察「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口號從一九一七年四月到十月間的實際變更。

一九一七年四月：

「俄國現今時局底特點，就在於由革命的第一階段過渡到革命的第二階段。第一階段因為無產階級沒有充分的覺悟性和組織性，而把政權交給了資產階級，第二階段應當把政權交給無產階級和貧農。」（參看列寧底「四月提綱」，「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八十八頁）

一九一七年七月：

「只有革命的工人，如果有貧農去幫助他們的話，只有他們才能够打破資本家底反抗，引導人民去無代價地奪取土地，去得到完全的自由，去消除飢荒，去打倒戰爭，去達到正義的和諧的和平。」（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七十七頁）

一九一七年八月：

「只有領導貧農（我們的黨綱上所謂半無產者）的無產階級才能够用民主和平來結束戰爭，治好戰爭所造成的創傷，開始實行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這些步驟已成為絕對必要和刻不容緩的了——這就是我們的階級政策實現時的規定。」（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二二頁）

一九一七年九月：

「只有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才能够打破資本家底反抗，表現出政權底真正偉大的勇氣和

決心，保證自己在軍隊和農墾裡都能得到群眾們底喜愛的、奮勇的、真正英雄贊助。」（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四七頁）

一九一七年九月到十月，列寧在「布爾塞維克能否保持國家政權」這本小冊子內與「新生活報」爭論的時候寫道：

「或者是，全部政權歸資產階級——你們早已不擁護這個主張，而且連資產階級自己也提都不敢提到這一點了。因為牠知道，在四月二十號到二十一號，人民只把肩膊一聳就拋開了這樣的政權，而現在呢，將更堅決幾倍地和更殘酷幾倍地拋開這樣的政權。或者是政權歸小資產階級，就是說，歸這個階級與資產階級的聯合（聯盟、協定），因為小資產階級不願意而且也不能夠單獨地和獨立地來奪取政權，這是一切革命底經驗所證明了的，是經濟科學所證明了的，這科學說明，在資本主義國家裡，或者是站在資本方面，或者是站在勞動方面，可是站在中間是站不住的。這種聯合在俄國半年以來已經嘗試了數千種方法而終歸失敗了。末了，或者是全部政權歸無產者與貧民來反對資產階級，以便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這是還沒有嘗試過的，而且是你們「新生活報」方面的先生們勸人民不要去幹的，你們用自己在資產階級面前的恐嚇心理去恐嚇人民。第四種情況連空想也空想不出來的。」（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七五頁）

事實就是這樣。

（斯大林：「關於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無產階級和貧農事政底口號」，「斯大林選集」，卷三，二七一—四〇頁）

## （2）列寧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所提出的

## 土地綱領並論立即沒收地主土地的意義

(按此綱領係列寧於俄國社會民主黨布爾塞維克

四月(一九一七年)會議所提出並經其通過——編者)

地主的土地佔有制在俄國的存在，乃是封建地主權利之物質堡壘，並且是君主政體可能的復辟底一種保證物。這種土地佔有制，不可避免的要使俄羅斯人口中絕大多數的群眾，使農民，墮入於貧困、奴役與被壓抑的狀態，使整個的國度，在每一種生活底領域中都落後了。

俄國農民的土地佔有制，無論是份地(村社的與家宅的)或私地(租來的或購買來的)，從頭至末，縱橫都為古舊的、半農奴制的紐帶關係，農民之劃分，為自農奴制度承襲下來的範疇或類別、土地間陸制等等所束縛着。打破這些腐朽的與有害的劃分之必要，使土地一解圍一的必要，以及重建土地所有制度與農業，以便使它們重新與俄國及世界經濟之新的條件相配合的必要，就形成了農民力謀全國一切土地國有化底願望之物質基礎。

不論一切民粹派的政黨、派別和集團，對於農民群眾反對封建地主土地佔有制及反對一般俄國土地佔有制與土地使用制上一切農奴桎梏之鬭爭，賦與以何種小資產階級的烏託邦，——但這種鬭爭本身，却完全表現出了一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絕對進步的及經濟上極端必要的欲打破所有這些桎梏的企圖。

土地國有化，乃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措施，它表示階級鬭爭有最大的可能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可以实现像得到的自由，並表示土地使用之解除一切非資產階級的附屬物。此外，土地國有化乃表示土地私有財產制之廢除，它在實際上表示，對於一般生產手段底私有財產制，將予以如此嚴厲的打擊，使無產階級底黨，必須以一切可能的方法，來協助這樣一種改革。.....

農工土地佔有制度破壞和消除愈堅決有徹底，俄國一般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土地改革愈堅決和徹底，則資產階級反對富裕農民（農民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之發展，亦將愈益蓬勃、壯大和迅速。

如果正在開始的歐洲無產階級革命，對於我國並不會予以直接的和強有力的影響，那俄國革命的命运與結果，將以下述情形以決定：即城市無產階級，是否能夠做到領導農村無產階級跟着自己走，並使農村無產者群衆依附於自己，或者是這些群衆迫於農民資產階級之後，而農民資產階級則正是傾向於跟古奇柯夫之流以及米留阿夫之流結成聯盟，傾向於跟資本家及地主及一般反革命結成聯盟的。

鑑於此種階級的情勢和此種力量的相互關係，代表會議決定：

(一) 無產階級底政黨，要用它的全部力量，爲立即和完全沒收俄國一切地主的土地（以及皇族的土地、教堂的土地、沙皇的土地等等）而鬥爭。

(二) 黨堅決地主張，立即將一切土地，都轉交給組織在農民代表蘇維埃、或組織在其它真正完全民主地選舉出來、而且是完全不依存於地主和官吏的地方自治機關中的農民手裡。

(三) 無產階級底政黨，要求全國一切土地的國有化；這種國有化，是表示把全部土地的所有權，轉讓給國家；而將土地的支配權，交給地方上的民主機關。

(四) 在另一方面，黨必須堅決地進行鬥爭，以反對臨時政府，「這個政府通過空加萊夫這個代言人及其集團的言論，正在強使農民「與地主訂立自願的協定」，這就是說，強使他們接受在事實上適合於地主利益的改革，並且他正以處罰「僧取政權」這個罪名來威脅農民，換一句話說，正以人口中的少數人（地主與資本家）以暴力反對大多數人的辦法威脅農民。在另一方面，黨又必須堅決地進行鬥爭，以反對大多數的民粹派與孟漢維克社會民主黨人之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他們正在勸導農民

，在召集立憲會議之前，切不可奪取土地。

(五) 黨勸告農民須用有組織的方式來奪取土地，絕不許對財產有任何微小的損害，並勸告農民設法增加生產。

(六) 只有在整個國家完全民主化了之後，這就是說，一方面，廢除了警察、常備軍以及在實際上具有特權的官僚制度；而另一方面，有最廣泛的、完全免除了自上而來的監督與保護的地方自治政府存在，只有在這時，一切一般土地的改革，才能够有所成就和牢固。

(七) 農家無產階級單獨的與獨立的組織，必須立即和廣泛地着手進行起來，這種組織，無論是以農業工人代表蘇維埃的形式（以及從半無產者的農民所組織起來的特殊的代表蘇維埃的形式）出現，或者是以一般的農民代表蘇維埃內部、一切地方的和市立的政府機關等等內部之無產階級集體或黨團的形式出現，皆無不可。

(八) 黨必須援助那些農民委員會底創始與發端，這些委員會，在俄國的許多地方上正在把地主的家畜和工具，交給組織在這些委員會內的農民手中，以便在一切土地關係上，實施公共調整的使

用。

(九) 無產階級的政黨，必須勸告農村的無產階級者和半無產者，用每個地主的大地產組織起大小適度的機器農場，這些農場，須在農業專家指導之下，並應用最好的機器，由農業工人代表蘇維埃為公共的利益而從事經營。

（列寧：「關於土地問題的決議案」，一九一七年五月七日—十二日（四月

二十四日—二十九日），「列寧選集」卷十一下冊，一〇一—一三頁）

在目前這戰時際，地主的土地在有組織的條件之下，必須無代價地立即轉交於農民之手。車爾諾夫部長在最高土地委員會內，在反對我的同志斯賓爾加時，曾說到「有組織的奪取」，這是兩個互相

矛盾的字：如果是奪取的話，那就是說無組織的，如果它是有組織的，那就是說，不是奪取了。我認爲這種批評是不正確的。我認爲，如果農民在任何村或鎮中，在任何縣份或省份中，經大多數通過一種決定——而在某些省份中，如果不是在一切省份中的話，農民代表大會在地方上已經建立了代表大多數人利益和意志的政權，代表全居民意志，即代表大多數土地耕耘者意志的政權——如果農民在地方上建立了這樣的政府權力，那麼，它的決定也就是他們將來所要承認的政權底決定了。它就是農民大眾在地方上所不能不予以充分尊敬的政權。

在我們和我們的敵對者之間的基本的矛盾，是在於對於什麼是秩序以及什麼是法律這個問題的理解上。迄今爲止，一向都認爲凡便利於地主與官吏的，便是良好的秩序與法律，而我們的主張則是，凡便利於大多數農民的，便是良好的秩序與法律！直至全俄蘇維埃會議或立憲會議成立時爲止，地方上的任何政權，不論其爲縣委員會也好，或省委員會也好，都是最高的秩序與法律！我們認爲，一個地主，根據舊的若干世紀以來的特權，要求和三百個農民家庭——其中每戶平均起來，僅有七俄畝半的土地——訂立「自願的」協商，那才是一種對於權力的僥倖呢！我們說：「讓一切決定都由大多數來通過吧；我們要農民不要耽擱一月、一星期、或一天，而在此刻就拿到地主的土地！」

（列寧：「關於土地問題的演說」，一九一七年六月四日，

「列寧選集」，卷十一下冊，三〇—三一頁）

革命在目前，較之在一九〇五至〇七年，更加無限地廣泛、深刻和尖銳的提出了俄國的土地問題。

戰爭曾經使交戰國遭受這樣無可形容的災難和損害，而同時它把獨佔的資本主義轉變爲國家獨佔的資本主義，竟這樣極度地加速了資本主義底發展，以致於不論是無產階級或者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在現在都頗限制在資本主義世界底界限和範圍以內。

現在已經越了這些界限和範圍以外，把這樣的問題，如調整全國範圍以內的生產與分配，普遍而勞動服務，強制的托拉斯化（聯合在同盟內）等等，提在日程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土地綱領中所主張的土地國有化，也將必然地獲得了一種不同的提法。就是說：土地國有化，不僅是資產級級革命底「最後一言」，而且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步驟了。如果不採取這樣的步驟，要救濟大戰之災難是不可能的。

（列寧：「社會民主黨在一九〇五—〇七年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的土地綱領」著後），「列寧選集」卷十一下冊）

### （ 3 ） 列寧論達到將土地真正交與勞動者的

#### 兩種步驟——組織貧雇農與實行共同耕作

當土地已成爲全國人民的財產之時，當私人的所有權已被廢除之時，就勞苦群眾的利益說來，最需要的和最好的處置土地的方法，究竟是什麼呢？這種時刻在俄羅斯已迫在眉睫了。在事實上，地主底權力即使還沒有消滅，但已被損傷了。當土地掌握在一切農民之手，並且當地主已不存在時，應當做什麼呢？土地應如何分配呢？在我看來，我們必須在這個問題上建立某種一般的觀點，因爲，自然，土地的位置，在地方上將總歸是農民手裡的事情。在民主的國家裡，是不能不如此的，這一點已是這樣的明顯，討論它簡直是多餘的事情了。但是，當開到必須要怎樣辦然後才能使土地爲勞動者享用時，我們就回答說，我們的願望是在於要堅持工資勞動者（雇傭工人）與貧窮底利益，這一點，我們俄國布爾塞維克社會民主黨認爲乃是自己的責任之所在。我們試問：當人們說，土地將轉交於人民之手，那末，這種說法和土地將轉交於勞動者之手那種說法，並不是同樣的呢？我們的回答是：不

這並不是同樣的。當人們說，土地將轉交於人民之手，它的意思就是說，地主的私有財產將要被廢除了；這就是說，全部土地將屬於全體人民所有；這就是說，每一個取得土地的人都是從全體人民那裡租來的。如果這樣一種制度建立起來的話，那末這就是說，在土地佔有上的一切差別也都將消失了，一切土地將都處於同等地位之上，如像農民所經常說的那樣：「對於土地之一切舊的劃分和權限，都將蕩然無存；土地將「解圍」了；所存在的將是自由土地與自由勞動。」

然則這是否就是說，土地是轉交於一切勞動者之手呢？不，並不是這樣的意思。在自由的土地上，自由的勞動者，這意思就是說，一切舊的土地佔有形態都已經被廢除了；這就是說，除掉作為整體的國家有土地所有權之外，再沒有別的土地佔有制了；這就是說，每一個人都是從國家那裡租得土地；這就是說，這是一般的國家政權，即一切工人與農民底政權；這就是說，只有農民，作為一個個體，來從這個政權租得土地；這就是說，在國家與農民之間，已沒有什麼居間人存在了；這就是說，每一個人都是以平等的地位來租得土地的；這就是所謂在自由的土地上的自由的勞動。這意思是不是說，土地是轉交於一切勞動者之手呢？不，並不是這樣的。

你 cannot 把土地吃下去的。要經營土地，就必須要有農具、牲口、農耕附屬物、金錢；沒有農具，又沒有錢，是不能從事耕作的。當你們建立起一種在自由的土地上的自由的勞動這種制度時，那時再不會有任何地主佔有制，再沒有任何土地種類的區分了。所有的只是土地將成為全體人民的財產，自由的佃農將從國家那裡租得土地。當你們建立起這種制度時，這並不是說，土地已轉交於一切勞動者之手，這只是說，每一個農民將能自由地處置土地罷了。任何人想使用土地的話，那他就可以自由地從國家那裡取得土地了。和沙皇的、地主的俄國比較起來，這一點將是一個偉大的進步。因為地主的、沙皇的俄國，乃是一個將七〇、〇〇〇、〇〇〇俄畝土地，交給三〇、〇〇〇個馬爾柯夫之流、羅曼諾夫之流，以及與之相似的地主的俄國；因為這將是這樣一個俄羅斯，在其內則將出現在自由土地

上的自由勞動。這一點，現在許多地方已經實行了。和沙皇的地主的機關比較起來，俄羅現現在已經前進了一步了。但是這還不是等於將土地交給勞動者，這只是說將土地交給耕者而已，因為將土地屬於整個國家所有，凡願意種地的人都可拿土地去耕種，這一點還是不夠的。單有耕種的願望是不夠的；能力是必需具有的，而且甚至能力也還是不夠的。每一個學農和每一個農民都具有能力；但是，他卻沒有具備必需的牲口、農具和資本，因此，不論你決定怎樣辦，也不論你說些什麼，總之我們將不能由此來建立在自由的土地上的自由的勞動。即令我們在每一個鄉鎮行政中都張貼佈告，宣佈土地是自由的，但是事情並未因此改善而有利於勞動者；正如在西班牙共和國中的監獄門口寫着「自由、平等、博愛」，而監獄並未因此停止其為監獄一樣……

這就是說，我們現在就必須想到下一個步驟：如何獲得比自由勞動更多的某些東西。——自由勞動乃是前進了一步，但是它還不是一個保護勞動者利益的步驟，它是向齊從地主底掠奪下、從地主底剝削下解放出來的一個步驟，是向齊從馬爾柯夫之流，從警察專制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的一個步驟；但是它却不是向着保護勞動者利益的一個步驟，因為沒有牲口，沒有農具，沒有資本，則窮困的和無財產的農民，是不能夠對土地加以利用的。

我以及我在黨內的同志們——我榮幸地在此能代表黨發言——我們只知道這兩種保護農業雇傭勞動者與貧農底利益的道路，這兩種道路，我們舉薦給農民蘇維埃予以注意。

第一個道路，就是要把組織農業雇傭工人和貧農。我們於是並且請於，要注冊每一個農民委員會，在每一個鄉鎮、縣與省中，都要成立一個農業雇傭工人與貧農之單獨的或共同的集團，這些農民，應詢問一下自己：如果土地明天就成為全體人民所有，而且土地不可調換地將成為全體人民的財產，因為這乃是人民所給與的，那麼，我們將要作些什麼呢？我們應該沒有牲口或農具的人們，應該往何處索得這些東西呢？我們將如何去耕種土地呢？我們應該如何保護我們的利益呢？我們應該如何注意

使土地——當它成爲全體人民底財產之時——不至於僅僅落到僱主的手裡去呢？如果土地竟然落到那些擁有足夠的牲口和農具的人們手中的話，那末我們是否會得到好多利益呢？我們究竟是爲的什麼才幹這一偉大的改革呢！難道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東西嗎？

土地將屬於「人民」所有，但是這一點還不足以保證農業僱傭工人的利益。主要的方法，並不在於自上而下地，或者是通過一個農民委員會，在這裡來建立一個單獨擁有土地數量之「標準」。只要資本還統治一天，那麼這種辦法和措施終是無益的；這些辦法和措施，絕不能把我們從資本主義底統治下面拯救出來，爲了從資本主義桎梏之下解放出來起見，爲了使全體人民的土地轉到勞動者手裡起見，只有一個基本的方法是可行的，這就是把農業僱傭工人組織起來，這些工人將以他們自己的經驗，他們自己的觀察，他們對於寄生者告訴他們的話的不信任——即令這些寄生者裝出一付盛情大德的面貌，並以「革命的民主派」自命，也還是無益——爲指導。……

只有地方上的獨立的組織，只有親身的經驗，才能使貧農學會這一點。而這種經驗並不是容易的，我們不能，而且也不會允諾此理想的樂土，不，地主將會被推翻，因爲這乃是人民的意志，但是資本主義將依然存在，資本主義之被顛覆，將遠較此爲困難，其顛覆將經由不同的道路以達成之。這道路，就是農業僱傭工人與貧農之單獨的和獨立的組織。

這就是我們的黨所提議的第一點，惟有這條道路，才有希望作到將土地逐漸地、不容易地、然而確實地真正交給勞動者。

我們的黨所提議的第二個步驟，就是把每一個大的農場，例如每一個大的地主的田產中，在俄羅斯，共數達三〇、〇〇〇個之多——都須儘可能迅速地組成爲模範的農場，以便農業工人與農業學家，應用地主底牲口、農具等等，共同的經營、耕種。如果沒有在農業工人蘇維埃底領導之下的這種共同耕作的辦法，我們便無法達到將全部土地交與勞動者。……我們之所以能够得出這個結論，乃只是

因爲我們是社會主義者，因爲我們曾經研究了西歐人民的生活。我們知道，在西歐曾經發生了許多次革命，這些革命曾經創造了民主共和國；我們知道，在美國，於一八六五年奴隸主會被擊敗了，由是幾萬萬的土地會無代價地，或幾乎無代價地分配與農民；可是雖然如此，資本主義依然在那裡和別處一樣地統治着，而且其壓迫勞動群眾的程度，也正如此——如果是不甚於的話——其他國度之情形。正是這種社會主義的學說和對於其他人民的觀察，曾經使得我們堅決相信：除非土地是由農業勞動者應用最好的機器，並在經過科學訓練的農業專家的領導下面，從事於共同的耕作，否則便無法從資本主義桎梏之下解放出來。可是，假如我們僅只是根據西歐各國的經驗的話，那麼我們在俄國的事業勢將令人可慮，因爲俄羅斯人民，只有在可怕的窮困底窳合發生時，他們才能够在走向新的道路上採取嚴重的步驟。我們說：這樣的時候已經到來了，可怕的窮困正在向全體俄羅斯的人民叩門召喚。這種可怕的窮困，就在於以下的事實，即是要繼續依照舊的方式從事耕作，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如果我們繼續像過去一樣地在我們的小塊農地上從事耕作，即令是自由的公民在自由的土地上從事耕作，我們依然會遭到不可避免的毀滅，因爲經濟的凋蔽，已在一天比一天、一小時比一小時更加劇烈地顯然出現了。人人都在談論這一點，這是一個事實——這個事實並不是由個別入底惡意所引起的，而是由全世界的侵畧大戰，由資本主義所引起的。

自然，共同的耕作乃是一件困難的事情，自然，如果某人幻想這樣的共同耕作，能够自上而下地以命令強迫實行，那就是癡癡，其所以如此，就是因數千年來從事個體經營的習慣，是不能立刻消除的；因爲要達成這個目的，還需要錢；因爲這還需要對於生活之新的姿態予以適應。如果這種關於共同耕作，公有器具，公有牲口，應用最好的農具，並有農業專家協助的勸告和意見——如果這種意見只是政黨虛構的話，那就壞事了，因爲人民生活的變革，是絕不由一個政黨的勸告來完成它的，因爲千百萬的人民，絕不會僅僅由於政黨的勸告而從事革命的。而上述的這種變革，較之推翻舊有的

厄吉克。灌輸等說。這是一種更大的革命。我重說一句，千百萬的人民是不會在他大命令之下進行革命的，而是在窮困與痛苦之際，是千百萬人民自覺已不能忍受之時，是在千百萬人民的普遍的壓力與決心已將蘇俄革命的分，這真正能創造一種新生活時，他們才會進而進行革命的。……

……這是一個困難的任務，但是在大的模範邊境上尋求共同的條件，是非常必要的。不如此，便不能斷出那俄國現在所遭受的經濟破壞，就不能斷出那俄國現在所處之真正絕望的境地。如果工人認為，人民生活中如此偉大的改革，能够一蹴而成，那便將觸成最大的錯誤。不，這種改革需要巨大的勞動，它要求每一個農民和工人，在各自的地方上，在他所最擅長的工作中，在他曾經從事了許多年的生產部門中，付出他的努力、決心和精力。這樣的準備是不能以命令來完成的，但是它又必須完成的：因為這次掠奪的戰爭已將整個人類帶到毀滅底邊沿了，因為千百萬的人民已在這次可怕的戰爭中死亡了，而且，如果我們不盡一切力量，如果工農代表不能徹底一切組織不採取共同的堅決的行動，以爭取沒有水災、沒有地主地業同耕種土地一事之實現的話，在這次可怕戰爭中還要死亡更多的人們。唯有這條道路，才能達到將土地真正歸還勞動者。

（列寧：「關於土地問題的演說」，

「列寧選集」卷十二下冊，三九—四九頁）

#### (4)

列寧於十月革命爆發次日所起草而經蘇維埃政府頒佈的土地法令廢除地主土地所有權

（蘇俄革命會出版部編印工兵蘇維埃第二次

我們認為，革命已經充分地顯示並且證明了，土地問題必須予以明白地提出一事是何等的真妥。武裝起義——第二次十月革命之爆發，顯然地證明，土地必須交於農民之手。那已經被推翻了政府，以及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的妥協派政黨曾造成了一種罪惡；他們在各種藉口之下，將土地問題的解決，一再遷延，因而把全國陷進毀滅的狀態中，使全國發生了農民起義。他們關於農村中之暴亂與無政府狀態的叫聲，是虛偽的，怯懦的，並且是欺騙人的伎倆。……

工農革命的政府，首先應當解決土地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可以安慰和滿足廣大的貧苦農民羣衆。我把你們的蘇維埃政府所必須頒布的一個命令中的各項，向你們讀一下吧。

## 土地令

(一) 毫無報償地立即廢除地主的土地所有權。

(二) 地主的田產，以及一切皇族的土地，僧侶和牧師的土地，連它們的一切牲畜、農具、農場建築物和各種附屬物等，一概歸歸鄉鎮土地委員會與縣農民代表蘇維埃處理，直至立法會議召開時為止。

(三) 沒收的財產，從現今起，屬於全體人民所有，如對之加以任何損壞，當治以重罪，受革命法庭之懲罰。縣農民代表蘇維埃，應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便在沒收地主田產時，維持最嚴格的秩序，規定什麼地應該沒收，並且沒收多少，編造正確的所有沒收的財產表，並設法以最廣闊的革命手段，保護移交人民的土地的一切經營，以及一切建築、農具、牲畜、儲藏的物品等等。

(四)「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消息報」編輯部根據二百四十二個各地農民的委託書而編成之下述的農民委託書——登錄於該報第八十八期上(彼得格勒，一九一七年九月一日)「八月十九日」——應該作為實行偉大的土地改革底指導，直至這些問題為立憲會議最後決定時為止。

(五)普通農民與普通哥薩克土地，不在沒收之列。

(「列寧選集」，卷十一下冊，九一——九三頁)

## (5) 列寧論社會主義革命在農村的

### 展開——成立貧農會，開展反對富農鬥爭

凡研究過農村生活，凡與農民群眾曾經接觸過的人們，都會說：城市中的十月革命，只是在一九一八年的夏天和秋天，才在農村中成爲一個真正的十月革命。而在這裡，同志們，當彼得格勒的無產階級與彼得格勒衛戍軍的兵士們取得了政權時，他們就充分的認識到：建設的工作在鄉村中將要遇到更大的困難；在這裡，人們必須更循序漸進；在這裡企圖藉命令和立法來建立公共的耕地制，乃是極端的愚蠢舉動；少許微不足道的自覺的農民，或許會同意這一點，但是絕大多數農民是不會具有這樣的觀點的，我們因此便把自己限於下述這一點上，這一點在革命發展底利益上，是絕對必要的，這就是，無論如何，絕不要超過羣衆的發展，而要等待，直到從這些羣衆底自身經驗中，從他們自身的鬥爭中產生一種前進的運動為止。在十月月的時候，我們只限於將農民之古老的數世紀來的敵人，即封建的地主，大地產所有者，立即予以掃蕩。那是全體農民底鬥爭。在這裡，農民內部尚未劃分爲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貧農與資產階級。我們社會主義者知道，沒有那種鬥爭，社會主義是不可能。但是我們也知道，我們的知識還是不夠的，必須要使那種知識深入羣衆，但不是講宣傳，而是戰

幾千百萬蘇聯勞動者，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因此，當全體農民還只是在平均使用土地這種基礎上假想革命時，我們便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八日（十月二十六日）我們的命令中公開發稱，我們將採取農民關於土地問題的委託書（以此委託書係根據出席一九一七年第一次全俄農民代表大會的二百四十一個委託書而製成的——編者）作爲基礎。……我們會直率地宣稱，這種意見書是並不符合我們的觀點的，這並不是共產主義；但是我們却不願強行那僅僅符合於我們的綱領但不符合於他們的觀點的東西。我們會宣稱，我們將和他們像恩維中的同志似地一同前進，我們相信，革命底進程會把他們引導到我們自己已經到達的那種境地。而結果，我們是有了農民運動了。土地改革是以土地之社會化開始的，這種社會化，我們會舉目舉手贊成，並公開宣稱，這並不符合我們的觀點，我們知道絕大多數農民都具有平均使用土地的觀點，我們不願以任何事物強其接受，我們寧願等待，直到農民自己丟棄這種觀點，繼續向前邁進時爲止。我們會經等待了，並把我們的力量準備起來了。

我們那時所通過的法律，是從一般民主主義的原則，是從那種把貧農和富農聯合在一起的東西，即對於地主的仇恨爲出發的。它是以關於平等一般的觀念爲基礎的，這種觀念無疑地乃是反對舊的君主政體的一種革命的觀念。我們應從這個法律，進而把農民內部加以區分。我們在普遍的贊同之下，實行了土地社會化的法律。這項法律，會由我們以及那些並未保有布爾塞維克底觀點的人們，全體一致地通過的。在誰應擁有土地這個問題上，我們原先是委託農民公社去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會離開了那農業能够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發展的道路，我們充分地認識到，在那時，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間，農業是不能採取那條道路的。由於我們的準備工作底結果，具有偉大的、世界歷史意義的步驟已經完成了，這一步驟不論在那個最民主的共和國都沒有採取過的。這一步驟，在今年夏天，即使在偏僻的俄羅斯鄉村中，也爲群眾實行了。

當事情弄到糧食困難與飢荒這種危險境地之時，當我們由於舊的承襲底結果與可詛咒的四年戰爭

的結果，由於反革命與國內戰爭而被奪去我國最富足的穀物產區之時，當事情已達到極點的時候，大城市有發生飢荒的威脅時，那時我們政權之唯一忠實與可靠的堡壘——城市與工業區最先遣工人們，就開始了一種聯合起來到農村去的運動。有些人說，工人們出發下鄉，爲的是傷起工人與農民之間的武裝衝突，這全然是一種挑撥的謠言。事情已經把這種謠言駁斥無遺了。工人們到鄉村中去，爲的擊退農村中間的剝削分子——即富農，這些傢伙當人民死於飢餓之際，却以糧食之投機操縱而積累起無量數的財富。他們下鄉，爲的是援助變成農村人口大多數的貧苦的勞動農民。他們下鄉，並非徒勞無功的。他們伸出了聯盟的手，他們的準備工作已經與群眾聯合在一起了。……

隨着那在全俄所進行的——貧農都起來了——正在採取着更明確的形式，貧農就從他們自身的經驗中認識到，反對富農的鬥爭究竟有什麼意義，他們體驗到：爲使城市獲得糧食的供應起見，爲了重新確立貨物的交換——無此一項，鄉村便不能生存——起見，他們是千萬不能跟隨着農村資產階級與富農走的。他們認識到，他們必須另自把他們自己組織起來。現在，我們已經採取了農村裡社會主義革命底第一個巨大的步驟了。在十月時，這還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們理解了能够接近耕家的這個時機，我們現在已經到達了這樣一點，就是在農村中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開始了，不知道自己的富裕兄弟，自己的富農兄弟，在從事糧食投機時，乃是從舊的僻蹊來觀察所發生的事物的這樣僻蹊的鄉村，是沒有的了。

因此，只有在現在，鄉村經濟，鄉村貧農，跟他們的領導者——城市工人團結起來，才對於真正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鞏固的基礎。只是在現在，社會主義的建設才在農村中開始進行。只是在現在才組織了蘇維埃和農莊，這些蘇維埃和農莊是有系統地力求大規模地集糧耕種土地，力求盡量應用學識、科學與技術，而此種學識、科學與技術，在舊的愚昧與反動的時代，甚至連最簡單的初步的人類文化，也創造不出來。

（列寧：『革命底一週年』，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六日）

『列寧選集』卷十二下冊，二一三—二一七頁）

鄉村中貧農委員會的成立，劃出了一個轉捩點，表明了城市工人階級，在「十一月」打垮後，已從這個任務進到更加艱苦、具有更高歷史意義的、真正的社會主義任務——把自覺的社會主義的鬭爭引進鄉村，把農民的精緒也激發了出來。如果城市工人沒有喚起鄉村無產階級、貧農和勞動農民，那麼，偉大的土地革命，十一月（舊曆十月）廢除土地私有的宣言，土地社會主義化的宣言，將必不可免地成了紙上空談的革命。因為鄉村無產階級、貧農和勞動農民是人民的絕大多數，他們（像中農）並不剝削別人的勞動，而且根本不贊成剝削，因此他們便可能進步，並且已經進步了，由反對地主的共同鬭爭，進到了一般的反對資本、反對剝削者（他們依靠金錢和動產的力量）的無產階級的鬭爭，由掃除俄國地主的任務，進到了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任務。

（列寧：『鄉村工作論文集』，匡亞明譯，四八頁）

黨把新的蘇維埃的工業組織問題解決以後，就進而解決農村問題。此時在農村中，貧農與富農的鬭爭，正在沸騰着。富農積聚着力量並侵佔着已從地主中奪來的土地。貧農需要幫助。富農進行着更對無產階級國家的鬭爭，不肯把糧食按固定價格賣給國家。他們想借助於飢荒感迫使蘇維埃國家放棄社會主義設施的實行。黨提出了要擊破反革命富農的任務。為要組織貧農和進行有成效的鬭爭反對那些擁有剩餘糧食的富農起見，於是就組織了工人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運動。

列寧當時寫道：

「工人同志們！誰你們記着：革命的情況是危急的。請你們記着：能拯救革命的，只有你們——別無他人了。現在所必須的，就是譏笑個挑選出來的、先進的、忠實於社會主義的工人，他們不會受

賄和不會打倒，而能發組織一般的力量去反對富農，反對投機商人，反對剝掠者，反對貪穢受賄，反對腐敗者。」（「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二五頁）

列寧說：「爲糧食而鬭爭——這就是爲社會主義而鬭爭」，而在這個口號之下，就組織了工人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運動。會頒佈幾個法令，以規定糧務獨裁，並賦與糧務人民委員部各機關以非常全權去按固定價格採買糧食。

按照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一日的法令，成立了貧農委員會。貧農委員會在與富農鬭爭中，在重分所沒收的土地與分配農具的事業中，在採辦富農所有剩餘糧食的事業中，在工人中心區域與紅軍底糧食供給事業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五千萬海克脫的富農土地，轉到貧農與中農手裡了。會從富農手中沒收一大部份生產工具以利於貧農。

貧農委員會之設立，會是社會主義革命在農村裡開展過程中的更進一步的階段。貧農委員會會是無產階級專政在農村中的支線點。當時由農民變成紅軍補充隊伍的工作，大部份都是經過貧農委員會來進行的。無產者之出發到農村中去工作和貧農委員會之設立，結果就在農村中鞏固了蘇維埃。並且對於爭取中農到蘇維埃政權方面的事業有了巨大的政治意義。

一九一八年末，當貧農委員會已完成其任務的時候，貧農委員會就不復存在，而已與農村中的蘇維埃溶合了。

（「聯共黨史」莫斯科本，二六四—二六五頁）

## (6) 斯大林論俄國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農民

這一時期是從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起，到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止。這一時期比較不長，總共祇有八個月，但是從群眾的政治教育和革命訓練上看來，我們敢說這八個月是等於平常的立憲發展時期底幾十年，因爲這八個月是革命的八個月。這一時期底特點就是農民更加革命化，他們對於社會革命

黨人失望，他們離開社會革命黨人，而從新轉到無產階級這一邊來，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認定無產階級是唯一的澈底的革命勢力，唯一能够把國家引向和平的那個勢力。這一時期的歷史，就是社會革命黨人（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布爾塞維克（無產階級民主派）之間為爭取農民，為爭取農民大多數而鬭爭的歷史。決定了這個鬭爭的命運的，是聯合政府時代，克倫斯基統治時代，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拒絕接收地主底土地，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主張繼續戰爭、前線上的六月進攻、兵士死刑底法令和郭尼洛夫底發動。

如果在前一時期內，革命的基本問題是推翻沙皇和地主政權，那麼在現在這時候，在二月革命後的時期中，在沙皇已經沒有了，而綿延不斷的戰爭，又將國家經濟破壞到底，使農民完全破產的時候，關於消除戰爭的問題，就成了革命底基本問題。真心顯然從純粹內部性質的問題轉移到了基本問題——關於戰爭的問題。「結束戰爭」、「擺脫戰爭」——這就是發因於戰爭的全國人民，而首先就是農民所發出的一般的呼聲。

但是當時為要擺脫戰爭，就必須要推翻臨時政府，必須要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權，必須要推翻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底政權，因為，他們，而且祇有他們，在當時總是延長戰爭，要把戰爭延長到所謂「勝利」的結局。當時，除了推翻資產階級以外，在實際上竟沒有別的可以得脫戰爭的道路。這會是真的革命，無產階級的革命，因為這革命推翻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最後一派——極左派底政權，即社會革命黨底和孟塞維克黨底政權，以便創立新的、無產階級的政權，以便使革命無產階級底政權，並擬以革命鬥爭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和主權民主和平的政權，布爾塞維克黨來掌握政權。大多數農民，當時祇贊助了工人為着爭得和平及不讓換政權的鬭爭。

當時，對於農民，是沒有別的出路的，而且也不能有別的出路的。這樣，克倫斯基統治時期，真是對於勞動農民群眾的一備最大的實驗的教訓，因為它明白指明了

：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底政權之下，國家是不能離開戰爭的，農民是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與立憲民主黨人不同的地方，不過是甜言的演說和虛偽的許諾，實際上他們所施行的也就是帝國主義的、立憲民主黨的政策，而祇有孟塞維克黨，才能是唯一能夠領導國家走上大道的政權，戰爭底繼續延長，不過是更加證實了這個教訓底正確，催促了革命，推動了千百萬農民藉柴和兵士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周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底獨立，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實。假若沒有聯合政府時期底明白教訓，無產階級專政就會沒有可能。

那曾經使資產階級革命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過程終於完成的情況，就是這樣。  
在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樣造成的。

（斯大林：「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

「斯大林選集」，卷一，五八—六〇頁）

十月革命有兩個特點，這兩個特點之所以要加以說明，首先是爲的去了解這個革命底內部意思和歷史意義。

這是些什麼特點呢？

第一、是這樣的事實，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我們國家裡降生時，是這樣的一個政權，這個政權，是在無產階級與農民勞動群眾聯盟（在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勞動群眾的情形之下）這種基礎上產生的。第二、是這樣的事實，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我們國家內成立，是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底結果，這個國家，在資本主義關係上還不大發展，同時在資本主義更發展的別些國家內仍保存着資本主義。這自然不是說，十月革命再沒有其他的特點。可是現時對於我們重要的正是這兩個特點，這不僅是因為它們明顯表出十月革命底實質，而且還因為它們越顯著地揭露「不斷革命論」底機會主義的本性。

現在簡單地來分析這兩個特點。

關於城市和鄉村小資產階級中的勞動群眾的問題，關於將這些群眾對無產階級方面來的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中的極重要的問題。革命底命運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鞏固程度，要取決於下述的情形：城市和鄉村中的勞動群眾，在採取政權的開爭中，將採取什麼態度？是將採取什麼行動？還是擁護無產階級，他們將成爲資產階級底後備軍，還是將成爲無產階級底後備軍？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法國革命之所以失敗，主要的因爲農民後備軍會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十月革命之所以勝利，是因爲十月革命會能從資產階級方面奪得資產階級底農民後備軍，十月革命會能將這些後備軍牽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無產階級，曾在這個革命中成了城市和鄉村中千百萬勞動群眾底唯一的領導力量。

（斯大林：「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

「斯大林選集」，卷一，一五一—一五二頁）

俄國工人階級在革命當中有佔農民人口絕大多數的貧農這樣一個嚴真的同盟者。革命八個月的經驗——而這經驗是完全可以等於「常態」發展幾十年的經驗的，——對於農民勞動群眾，不是徒然過去了的。在這個時間，他們會有可能來在事實上考驗俄國一切黨，並且確信：無論是一立憲民主黨人，無論是一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希維克，都不會去認真和地主鬪爭，並爲農民利益去流血，在俄國，只有一個黨才是和地主沒有聯繫的，並且是準備指點地主以便滿足農民需要的——這個黨，就是布爾什維克黨。這個情況，就成了無產階級和貧苦聯盟底實在的基礎。而工人階級與貧苦聯盟之存在，也就決定了中農底行爲，而中農是會經過極許久的，只是隨到十月起義時，才漸漸轉到革命方面來，而和貧農結合在一起。

根本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這樣的道理，那末十月革命就不會能夠勝利了。……

（「聯共黨史」，莫斯科本，二五三—二五四頁）

#### (四) 依靠貧農、聯合中農、建設

##### 社會主義社會

#### (一) 斯大林論蘇聯基本農民群眾

##### 能够被吸收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如果以前，在革命底第一個時期裡，主要的問題是推翻沙皇制度，而以後，在二月革命之後，首要的問題却是經過推翻資產階級，來擺脫帝國主義的戰爭；那末在現時，在國內戰爭消滅以後，在蘇維埃政權鞏固以後，經濟建設問題就成了首要的問題。加緊和發展國有化了的工業；爲着這一點而利用受國家所調節的商業來把工業和農民經濟聯繫起來；以糧食稅代替糧食徵收制，以便然後逐漸減少糧食稅底定額，而把事情弄成工業製造品同農民生產品的交換，振興商業並發展合作制，使千百萬農民都加入合作制；——這些便是列寧所擬定的、在建成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的道路上的經濟建設底任務。

有些人說，這些任務，對於我國這樣的農民國家，或許是不能做到的。有些懷疑派甚至說，這種任務簡直是空想的，是不能執行的，因爲農民總是農民，農民是由小生產者組成的，因此不可利用他們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底基礎。

但懷疑派是錯誤了，因爲他們沒有注意到在這裡有決定意義的一些情況。在這些情況中，主要的

情況是：

第一、決不可以把蘇聯的農民和西方各國的農民混爲一談。蘇聯的農民是與西方各國的農民不同的，因爲蘇聯的農民經過了三次革命底教訓，與無產階級一塊並且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反對沙皇和反對資產階級政權的鬥爭，從無產階級革命手中得到了土地與和平，並因此而變成了無產階級底後備軍；而西方的農民，却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和在自由資產階級領導下作了鬥爭，從這個自由資產階級手中得到了土地，並因此而變成了資產階級的後備軍。顯然用不着證明，蘇聯的農民，慣於看重自己與無產階級的政治親善和政治合作底意義，而且因爲有了這種親善和這種合作才得到了自由——這一點不能不是他們與無產階級作經濟合作的非常順利的條件。……

第二、決不可以把俄國的農業和西方各國的農業混爲一談。西方的農業是依照通常的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在農民深刻分化的環境中發展的，這時候，在一個極端上是大田產和私人資本主義的大地產，而在另一個極端上却是窮苦、貧困和雇傭奴隸地位。因此，在西方各國，分裂和解體完全是自然的。在俄國就不是這樣。在俄國，單是由于蘇維埃政權之存在和重要生產工具及生產資料都收歸國有這兩個原因，農業的發展就不會走這條道路。在俄國，農業的發展應該走上別條道路，就是使千百萬小農和中農合作社化的道路，就是在農村中發展廣大合作制，而由國家以優待的借款來幫助的這條道路。列寧在他的關於合作制的論文中，很正確地指出，俄國農業底發展應該走上新的道路，就是說，經過合作社來吸引大多數農民加入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將集體制底原則逐漸灌輸到農業內，開始在農產品底銷售方面，然後在農產品底生產方面。

（斯大林：『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

『斯大林選集』卷一，六〇—六三頁）

什麼時候都不相信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呢？

業。

這首先就是不相信農民底基本群眾由於我國發展底某些條件而能够被吸收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這第二就是不相信我們國家裡的無產階級，既管轄着國民經濟底命脈，就有能力把基本農民群眾吸收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反對派關於我們的發展道路問題的論論，暗中就是以上面這兩個原理作出發點的，「！」反對派是自觉地還是不自覺地這樣做的，那都是一樣。

（斯大林：「關於列寧主義底問題」，

「斯大林選集」，卷二，六八頁）

## （2） 列寧、斯大林論依靠貧農，聯合中農及對中

農的政策：不能急躁，不能用強迫手段，

要用說服辦法，成立自願的堅固的聯盟

在農村中，我們的任務就是消滅地主，打碎剝削者和富農投機家的反抗；為要做過這一點，我們祇能鞏固地倚靠半無產者，倚靠「貧農」。可是中農不是我們的敵人，他過去動搖過，現在動搖着，將來還會動搖。影響動搖着的任務與推倒剝削者及戰勝被剝削者的任務，並不是一樣的。善於達到與中農的聯盟——同時連一分鐘也不放棄與富農的鬭爭，和果敢堅固的倚靠貧農——這是現時的任務，因為正是現在，由於上述的那些原因，中農轉回到我們這方面來，乃是必不可免的事情。

（列寧：「星報」專論。蘇洛的「重賞的代價」，一九一八年）

我們對中農的政策是和他們建立聯盟，中農不是蘇維埃制度的敵人，不是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的敵人。自然，他會動搖，並只有由於確實可靠的實例，使他理解到社會主義是必需的時候，他才會接受社會主義。當然，中農是不能用理論的辯駁和鼓勵的講演去說服的，我們也決不想這樣做。但是他能夠用實例和勞動農民的堅固陣線去說服，能夠用勞動農民和無產階級的聯盟去說服的。在這裡，我們有賴於持久的逐漸的說服過程，有賴於許多過渡辦法，在這些辦法中，應具體表現着人民中無產階級化的社會主義群眾的協調，表現着共產黨人（他們正在進行反對一切形式的資本的戰鬥）和中農的協調。

（列寧：「在第一次全俄土地部貧農委員會和農業公社代表大會上的演說詞」，一九一八年，「農村工作論文集」，匡亞明譯，五三頁）

小而而易見的，這個基本問題——如何確切規定無產階級對中農的政策——是一個非常複雜而同時又是很迫切、很重要的問題。同志們！在理論的觀點上（這是絕大多數工人都已把握了的），這個問題是難不倒馬克斯主義者的。我告訴你們，就是考茨基，當他還在正確地解釋馬克斯的學說，並被一致認為馬克斯學說之權威的時候，他在「土地問題」一書中，也曾說，在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社會主義政黨的任務，就是使農民中立，這就是說，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中，保證農民中立，務使農民勿積極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我們。……

恩格斯——他和馬克斯一起，按下了科學的馬克斯主義的基礎，這學說是我黨始終用以指導自己，特別在革命時期以指導自己的——會把農民分為小農、中農和大農，這種分法，現在在大多數歐洲國家中，還是適用的。他說：「為基大農，也或許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必需用強力去壓制的。」以為在什麼時候，都可用強力對付中農（只有小農是我們的朋友）的思想，任何有見識的社會主義者，從來都

是反對的。這是恩格斯在一八九四年（在他死的前一年）說的話，那時農民土地問題已成為大家注意的問題了。恩格斯的這個觀點指明了一個真理，這個真理有時被人遺忘了，但在理論上我們是全部同意的。對於地主資本家，我們的任務是全部剝奪；但我們決不容許以任何暴力加之於中農。就是富農，我們也並不像對付資產階級那樣決絕，我們也不必對他們實行絕對的剝奪。我們的黨綱上已作了這個區別。我們說，富農的反抗及反動行為是必須鎮壓的，但並不是完全剝奪。

我們決定我們對於資產階級和中農的政策之基本區別——完全剝奪資產階級和聯合不剝奪別人的中農——這個基本路線是任何人都同意的。但這個路線在實際工作上却沒有一致遵守，而許多人還不知道如何在鄉村中去遵守它。當無產階級推翻了資產階級，鞏固了政權，而從各方面來創造新社會時，中農問題便提到了第一位，在盛行大規模農業和盛行小規模農業的不同國家中，建立共產主義，就要採取不同的道路。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社會主義者都不會否認的。這是一個基本的真理，從這個真理引伸下去，一個到建設共產主義的問題時，我們的主要注意力在某種程度上就恰恰應該集中到中農的身上。

……當我們遇到像中農這樣一個階層的時候，我們便發現，它是一個動搖的階級，中農一方面是貧有主，另一方面又是勞動者。他不剝削別的勞動者。幾十年來中農極其艱苦地保守着自己的地位，他忍受過地主資本家的剝削，忍受過一切。可是，他終究是一個私有主。因此，我們對於這個動搖階級的態度，便有許多困難。由於一年多的經驗，由於六個多月無產階級在鄉村中的工作，並由於鄉村中階級已開始分化的事實，使我們感到最重要的事情是應該防止急躁，禁止拙劣的理論空談，以及禁止把正在完成着但還沒有完成的事情，當作已經完成了的事情。

……強迫用之於中農是非常有害的。這是一個數目龐大的階層，包括着千百萬個個人。甚至產業最興盛的歐洲，技術和文化、城市生活和鐵路都異常發達，最易使人作如此想，可是，就在那裡，最

革命的社會主義者也沒有一個人會提議建設車農採厚禁道的辦法。……

強迫辦法在這裡是全無成效的，我們應該特別強調這個真理。這裡是經濟工作，它不是另一回事，因為這裡並沒有那種上層建築物，可以把它剷除，而建築的基礎仍穩固不動。在城市裡，代表那種上層建築物的，就是資本家，而這裡是沒有那種資本家的。所以，強迫辦法在這裡就要破壞全部革命事業。這裡所需要的是長期的教育工作。……

……一句話，最愚蠢的就是在中農的經濟關係上使用強制手段的觀念。

（列寧：「關於農村工作的報告」，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農村工作論文集」，匡亞明譯，六一—六八頁）

首先常常要問的問題是，什麼是中農呢？

自然，黨的同志們常常提到，他們會如何在農村中被問過什麼是中農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的回答是：不剷削別人的勞動，不倚靠別人的勞動來生活，不以任何形式利用別人的勞動果實，而全憑自己的勞動來工作和生活的，就是中農。

這樣的農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比較現在少，因為那時大多數農民是屬於窮苦的貧民階層，和現在一樣，那時只有極少數是屬於剷削者、富農階層的。

自從土地私有制廢除以來，現在中農正在增長着。蘇維埃政府已經決定，無論如何要和中農建立完全和平融洽的關係。不言而喻的，中農決不能馬上就接受社會主義，因為他墨守舊習，對於一切革新，都遲疑不定，如果不甘心在實際上在被邀參加的行動中考驗過，並確信了有改變的必要時，決不改變其生活方式。

因此，我們所必須了解，必須牢記及實行的，即工人共產黨員在鄉村出現的時候，他們的責任在於建立黨和中農的同志關係，建立和中農的同志關係，他們的責任就在於牢記着：一個不剷削別人

勞動的勞動者，就是工人的同志，我們應該以真誠互信和感召，達到自發自願的聯盟。共產黨政府所提出的任何辦法，祇應看作是忠告，看作是對中農的一個指示，看作是告訴中農應該採用新制的一種勸告罷了。

只有在實際上以共同工作來考驗這些辦法，審查它們的缺點，改正可能的錯誤，獲得和中農的協調。——只有這樣的工作，才能够保證工人和農民的聯盟。這個聯盟，是蘇維埃政府的主要力量和盤。這個聯盟是一個保證，是社會主義改革事業，戰勝資本和取消一切剝削形式的專業能够勝利完成的一個保證。

（列寧：「什麼是中農」，一九一九年，

「農村工作論文集」，匡亞明譯，七六一七七頁）

……我們須要仔細地分析一下那在農村經濟中，所發生的一些變化。在開始時情況是這樣的，就是我們看到了全體農民都參加了反對地主統治的鬥爭。貧農與富農都同樣參加了這個鬥爭，雖則，他們參加鬥爭的動機是各不相同的：富農進行鬥爭的目的，是要從地主那裡取得土地，並在這種土地上發展自己的經濟。這樣，就暴露了富農與貧農之間利益與志向，是不相同的。即使在今天，我們也可以看到，在烏克蘭，這種利害的不同，要比在我們這裡更加明顯些。貧農可以直接利用這種所沒收的地主的土地，是非常之少的，因為他們沒有為耕種土地所必需的資料與工具。於是我們看到，貧農就組織起來，不讓富農奪取從地主那裡取得的土地。蘇維埃政府會對俄羅斯與烏克蘭已經產生的貧農委員會予以幫助。結果如何呢？結果是，在農村裡，中農成了佔優勢的成份。我們是從統計上知道這一點的，而每個居住在鄉村裡的人，是從自身的觀察中知道了這一點的。富農與貧農這兩個極端的人數都減少了，大多數的人口，都近於中農的地位了。如果我們要提高我們農村經濟底生產力，則我們應當先計算到中農。共產黨正是根據於這種情況而確定自己的政策的。

談然農村已成為中農的，那裏就要幫助中農去提高他們的經濟，此外，我們就須要向他提出同樣的要求，如同我們曾向工人所提出的一樣。在下次黨的代表大會上所討論的主要問題，是關於糧食工作的問題，即把全部力量都用到經濟陣線上去，提高勞動生產力，並增加生產品的數量！不執行這個任務，任何前途都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對工人這樣說，那末我們對農民也應當這樣說。國家是從農民方面徵收一定的糧食稅，但是為報答起見，却要求他於徵稅之後，還能擴展自己的經營，他知道，從他那裡不再徵收任何其他東西了，他所留下的全部剩餘，可用於發展經營了。這就是說，對於農民政策的改變，是可以由農民自己地位的改變來說明的。農村已更加中農化了，為提高生產力起見，我們必須估量到這一點。

（列寧：「關於糧食稅的演說」）

「列寧選集」，卷十六，二〇七—二〇八頁）

怎樣可以使工農聯盟的思想與列寧關於農民是「最後的資本主義階級」這個著名的原理彼此相容呢？這裡沒有矛盾嗎？這裡的矛盾，不過是表面上的，似是而非的。實際上，在這裡並沒有絲毫矛盾。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裡曾經把農民說成爲「最後的資本主義階級」，同時在這個報告裡，他又再三說明工農聯盟的必要，他說：「專政的最高原則——這就是維持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以便使無產階級能夠保持領導作用與國家政權。」顯然的，無論如何，列寧不認爲這裡有絲毫矛盾。

列寧說：農民是「最後的資本主義階級」。對於這個原理，應當怎樣來解釋呢？這是不是說農民是由資本家組成的嗎？不，不是的。這是說：第一、農民是一個特別的階級，他把自己的經濟建築在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私有權基礎上，因此，他與無產階級不同，因爲無產階級是把經濟建築在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公有權基礎上的。這是說：第二、農民是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從自己的隊伍中分化

專、產生清和帶着資產家、富農以及一般的各種各樣的對峙者。

這種情形不是獨在工農聯盟組織事業而前的一個不可克服的障礙嗎？不，不是的。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之下的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不是與全體農民的聯盟，就是工人階級與農民勞動群眾的聯盟。不與農民資本主義分子作鬭爭，這樣的聯盟是不能實現的。不組織貧農——工人階級在農村的支柱——這樣的聯盟是不能鞏固的。因此，在無產階級專政底現在的條件之下的工農聯盟，只有在列寧的下面的一個著名的口號之下方能實現，這個口號就是：「依靠貧農，與中農成立堅固的聯盟，一分鐘也不要停止與富農的鬭爭。因為只有實行這個口號，才能把農民基本群眾引到社會主義建設區軌道上來。」

（斯大林：「糧食戰線上的問題」，

「斯大林選集」，卷三，二七八—二七九頁）

列寧會說：「中農是動搖的階級」。為什麼呢？因為中農一方面是勞動者，這使他與工人階級接近，而另一方面又是私有財產者，這使他與富農接近。因此就有中農的動搖。這不僅在理論上是對的，這種動搖在實際上也每日每時都表現出來。列寧說：「農民既然是勞動者，他就傾向於社會主義，寧願工人專政，而不願資產階級專政。農民既然是糧食出賣者，他就傾向於資產階級，傾向於自由貿易，就是說最後退到『預常的』、陳舊的『歷來的』資本主義。」（「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二四頁）

因此與中農的聯盟，祇有當他是反對資本主義分子為目標，反對一般資本主義，祇有當他是保障工人階級在這個聯盟裡的領導作用，祇有當他是便利着消滅階級的時候，他才可以是堅固的。

（斯大林：「論聯共黨內的右傾」，「斯大林選集」卷四，三一頁）

列寧在自己那篇標題為「蘇洛糊抵實實的自供」的論文裡，宣佈了與中農協定的口號以代替舊的並

中農的口號，這篇論文是在什麼時候發表的呢？它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廿一日發表的。就是說，差不多是在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這個決議案以後兩個星期的時候才發表的。列寧在這篇論文中簡直說道：我們之所以採取與中農協定的政策，是因為中農已轉向到我們這方面來了。請看列寧底話：「在鄉村裡，我們的任務，就是消滅地主，打破剝削者和富農投機家底反抗；爲要做這一點，我們只能堅固地依靠半無產者，依靠『貧農』。可是中農不是我們的敵人。他過去動搖過，現在動搖着，將來還會動搖；影響動搖者的任務與推倒剝削者及戰勝積極敵人的任務，並不是一樣的。至於達到與中農的協定——同時連一分鐘也不放棄與富農的鬭爭和只是堅固地依靠貧農——這是現時的任務，因爲正是現在，由於上述的那些原因，中農轉向到我們這方面來，乃是必不可少的事情。」（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九四頁）

從這裡就得得出什麼結論呢？從這裡得出的結論就是：列寧的口號，不是關係於舊時期，不是關係於設立貧農委員會和中立中農時期，而是關係於新時期，與中農協定的時期。這樣一來，他所反映的就不是舊時期底末尾，而是新時期底初頭。

列寧這個口號底要旨就是，他極其正確地抓到了黨的農村工作底三位一體的任務，這個任務表現在下面這樣的一個簡短公式裡：（一）去依靠貧農；（二）去與中農成立協定；（三）一分鐘也不要停止與富農的鬭爭。請試一試，從這個公式內拿出其中的一部份來作現今農村工作的基礎，而忘記它的其餘部份——那時候你就一定要弄到走頭無路的地步。在現今的社會主義建設階段條件下面，不依靠貧農和不與富農進行鬭爭，是不是可以和中農建立真正的和鞏固的協定呢？是不是可以的。在現今發展底條件下面，不依靠貧農和不與中農成立協定，是不是可以與富農作有成效的鬭爭呢？是不是可

以的。怎樣去衷中肯地把握黨的農村工作底這個三位一體的任務在一個概括的口號裡表現出來呢？我想，列寧底口號是這個任務底最中肯的表現。應當承認，誰也不能比列寧說得更中肯一些。

為什麼正是在現在，正是在農村工作底現今條件下面必須着重指出列寧這個口號底含義呢？因為，正是在現在，可以看見個別同志有這樣的傾向：就是想把黨的農村工作底三位一體的任務構成幾部分和把這些部分弄得彼此脫離。這一種情形已由今年一二月間我們的糧食的採辦運動底實際工作所完全證實了。應當與中農成立協定，——這是所有的布爾塞維克都知道的。可是要怎樣的成立這個協定呢？——這就不是每個人都懂得的了。有些人想用拒絕與富農的鬭爭或是減弱這種鬭爭的辦法來成立與中農的協定；據他們說，與富農鬭爭可以轉去一部分中農，即那部分富裕的中農。另外有些人想用拒絕組織貧農的工作或者減弱這種工作的辦法來成立與中農的協定；據他們說：組織貧農的工作弄得使貧農獨登一幟，這樣，就可以把中農從我們這裡嚇開。這樣離開正確路線的結果，就弄得忘記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就是忘記中農是一個動搖的階級，忘記只有與富農作堅決的鬭爭和加強在貧農裡的工作，才能使與中農協定堅固起來，忘記沒有這些條件，中農就可以認為富農是強者而動搖到富農方面去。請記起列寧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所說的話：

「必須決定對那個沒有一定不移的堅固立場的階級的關係。無產階級大多數都贊成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大多數都反對社會主義，決定這兩個階級間的關係是容易的。可是當我們講到中農這樣的階層時，那就知道，這是一個動搖的階級。他局部地是私有主，局部地是勞動者。他不剝削別的勞動者。他在數十年內費了極大的力量來維持自己的地位，他親自受了地主和資本家底剝削，他忍受了一切痛苦，而同時他又又是私有主。因此我們對待這個動搖的階級的關係是有莫大的困難的。」（請參看「俄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錄」，第三〇〇頁）

可是也有另外的離開正確路線的傾向，這些傾向的危險性並不比上述的傾向少些。有這樣的現象

這就是有人進行着反富農的鬥爭，可是進行得這樣拙劣，這樣粗率，以致打擊到貧農和中農的頭上來。結果富農還是沒有受損傷，而與中農聯盟的事業却發生了裂痕，而一部分貧農竟暫時落在進行着反蘇維埃政策的鬥爭的富農爪牙裡了。也有這樣的情形，就是有人企圖把反富農的鬥爭變為剝奪富農，而把糧食採辦工作變為糧食徵收，他們忘記了，在我們這樣的條件下面，剝奪富農乃是一件蠢事，而糧食徵收並不是與中農聯盟，而是與中農鬭爭。

這些離開黨的路線的傾向是由於什麼東西產生出來的呢？

是由於不懂得，黨的農村工作底三方面的任務是一個單一的和分不開的任務；是由於不懂得，決不可以把與富農鬭爭的任務和與中農協定的任務分開，決不可以把這兩個任務和將貧農變為黨在農村中的支柱的任務分開。

（斯大林：「列寧和關於與中農聯盟問題」，一九二八年  
二月十二日，「斯大林選集」，卷三，二八二—二八三頁）

第一個問題：農民問題上錯誤的根源在那裡？

答覆：在於不正確的對付了中農。在於在經濟方面用壓制的方法對付了中農。在於忘記了在經濟上聯合中農羣衆，是不應該靠着壓制方法的，是應該靠着和中農協商，是應該靠着聯合的中農。在於忘記了現在集體農場運動的基礎，是工、富農和貧農聯合中農，反對資本主義，尤其是反對富農。

在和中農聯合戰線進攻富農的時候，一切事情都很順利。但及至我們有些同志被勝利陶醉了，不自覺的開始離開進攻富農的道路爬上了反對中農的道路，及至他們因為追趕集體化最高的百分數，開始向中農使用壓制的辦法，剝奪他們的選舉權、破壞他們、奪去他們的財產的時候，進攻的方向就變過來了，和中農的聯合戰線開始破壞。很明顯的，富農又能够企圖重新站住他的腳跟了。

他們忘記了，在反對我們階級敵人的鬭爭中，壓制的方法是必要的，並且是有利的；但在對付我

們的同盟者中農的時候，壓制的方法是不許用的，是有害的。

他們忘記了，像鴉鵒那樣的奔跑，在解決軍事問題的時候是必須的，並且是有利的；可是在解決集體農場建設問題的時候，在聯合中農建設集體農場的時候，這種辦法就不中用了，就是有害的了。問題上錯誤的根源就在這裡。

（斯大林給集體農場工作者的同志們的答覆）

斯大林選集，卷四，一三二—一三三頁。

一九一九年三月，在矛盾情況的環境中——一方面，協約各國反蘇維埃政權的反動聯盟是在加強，而另一方面，在歐洲，主要是在遭受軍事失敗的國家中的革命高漲，却大大促進蘇維埃國家底地位，——就在這樣的條件之下，我們黨召集第八次代表大會。……

關於對中農態度的問題，在第八次黨代表大會工作中佔着重要的地位。由於實現著名土地法令的結果，農村已日益成爲中農的了。中農在當時農民人口中佔居多數。動搖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中農底情緒和行爲，對於國內戰爭和社會主義建設底命運，是有巨大意義的。國內戰爭的結局，曾大有賴於以下這一點：中農究竟是向着那方面動搖；究竟那一個階級——是無產階級，抑或是資產階級——將能吸引中農到自已方面來。捷克斯拉伐克軍隊、白匪當衆、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之所，以竟能於一九一八年夏天在俄國加河一帶推翻蘇維埃政權，就是因爲他們得到頗大一部份中農底援助。

官場在俄國中部組織叛亂時的情形，也是如此，但從一九一八年秋天起，中農群衆的情緒，已開始朝着蘇維埃政權方面轉變了。農民已經看見：白軍之勝利，其結果就是恢復地主政權，從農民手中奪去土地，搶劫擄打和殘殺農民。已將當農擊潰的貧農委員會底活動，也促進了農民情緒的改變。根據這種情形，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列寧就提出口號如下：

要善於與中農達到妥協。——分鐘也不要放棄以富農的鬭爭，而只是堅固地倚靠貧農。

「不」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九四頁）

當然，中農底動搖尚未完全停止；可是，中農已經是更接近於蘇維埃政權，已經是更堅定地贊助蘇維埃政權了。第八次黨代表大會所規定的關於對中農態度的政策，會大大促進了這一點。

第八次代表大會是黨在中農政策中的轉變關頭。列寧底報告和代表大會的決議，決定了黨在這個問題上的新路線。代表大會要求黨的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嚴格把中農與富農辨別清楚和分別開來。並用細心體貼中農需要的態度，把中農吸引到工人階級方面來。要用說服方法，而絕對不是用強制方法，不是用強迫方法和中農底落後性鬭爭。因此，代表大會指示說：在農村中實行社會主義設施（成立公社和農業勞動組合）時，不可採取強制手段。在凡是牽涉到中農切身利益的情形下，都要去和農作實際的妥協，要在決定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式上對中農讓步。代表大會責成實行無產階級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同時要保存無產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作用。

列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所宣佈的對中農的新政策，要求無產階級去倚靠貧農，去與中農維持堅固聯盟，並進行反富農的鬭爭。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以前，黨在大體上是實行中立中農的政策。

這就是說，黨曾設法使中農不站在富農方面，不站在一般資產階級方面。但現在這已經是不够了。

第八次代表大會已由中立中農的政策進到要與中農實行堅固聯盟，以便進行反對白匪和外國武裝干涉者的鬭爭，以及順利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了。

代表大會所採取的對農民基本群眾，對中農的路線，在反對外國武裝干涉者及其白匪奴僕的國內戰爭獲得勝利的結局中，起了決定的作用。一九一九年秋，當必須在蘇維埃政權和鄧尼金之間兩者擇一的時候，農民就擁護了蘇維埃，而無產階級專政就戰勝了自己危險的敵人。

### (3) 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對富農的政策

最近一年來我們工作底特點，就是我們的黨和我們的蘇維埃政權：第一，在各方面擴大了對鄉村中資本主義分子的進攻；第二，大家都知道，這一個進攻已經有了而且繼續的生出來很顯著的好的結果。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從限制富農的剝削傾向進而消滅富農這個階級了；這就是說我們在全部政策上造成了而且繼續還在造成一個舉足輕重的轉變。

以前黨一向是主張限制富農的剝削。大家知道這個政策是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宣佈的，當實行新經濟政策時，在第十一次黨的大會又重新宣佈過這個政策。大家都記得列寧給普列布拉仁斯基的著名的信（一九二二年），在這封信中，他又講到必需實行這一個政策。最後這個政策又由第十五次大會批准了。我們一直執行到最近。

這個政策對不對呢？自然對，它無條件是對的。我們在三五年前是否可以像現在這樣進攻富農？我們當時是否可以指望到這種進攻的勝利？不，不可能的。要是這樣，那就是極危險的冒險政策，就是極危險的以進攻為兇戲。因為我們一定要遭失敗。一遭失敗便會鞏固富農的地位。為什麼？因為那時我們在鄉村中還沒有像蘇維埃農場和蘇維埃農場那樣的支柱，作為大舉進攻富農的根據地。因為我們那時還不能拿集體農場與蘇維埃農場那樣的社會主義的生產來代替富農資本主義的生產。

一九二六年到二七年，季諾維埃夫與託洛茨基的反對派極力要把馬上進攻富農的政策強迫黨接受。黨不採用這種危險的冒險政策，因為它知道穩重的人決不肯拿進攻來作兇戲。進攻富農是件嚴重的事，不可把它與反富農的宣言混淆了。也不可把它與託洛茨基、季諾維埃夫的反對派要強迫黨提出的向富農極端的政策混淆了。進攻富農就是打破並消滅富農階級。除了這些目的之外，那麼所謂進攻

就是一個宣言，後是整邊，就是空口白話，却不是真正布爾塞維克的進攻。布爾塞維克就是準備動手，打擊富農，打擊他使他再也站不住脚。我們布爾塞維克就把這個叫做真正的進攻。我們在三五年前，是否能舉行這樣的進攻而希望得到勝利呢？這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論蘇聯的土地政策」，「斯大林選集」，卷四，一一〇—一一二頁）

第十五次大會主張加緊（和排擠）鄉村資本主義分子的政策，其出發點如何呢？其出發點就認為，雖然要限制富農，但是富農階級總還要暫時留在鄉村中。在這個基礎之上，第十五次大會便保留了出租土地的法令，同時，很明顯的知道，大半的富農是承租者。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再次的宣佈了便保留了鄉村中僱傭勞動的法令。同時要求正確的執行這個法令。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再次的宣佈了消滅富農是不容許的。這些法令和決議與限制（和排擠）鄉村中資本主義分子的政策，是否矛盾呢？毫無疑義，是不相矛盾的。這些法令和決議與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是否矛盾呢？毫無疑義是矛盾的！因此，現在在通盤集體化的區域內，應該放棄這些法令與決議。通盤集體化區域的發展不是與日俱進，而是與時俱進的。同時，在通盤集體化的區域內，集體農莊運動發展的進程早已把這些法令與決議推在一邊去了。

在這種解釋以後，是否還能認為，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是限制（和排擠）鄉村中資本主義分子的政策之繼續呢？很明顯的，是不能夠的。

該文的作者忘記了，當富農階級的手中還握着生產工具與自由使用土地的權利時，當我們實際還保存着村鄉中僱傭勞動的法令、出租的法令及禁止消滅富農的時候，用稅務及其他一切限制的方法是不能排擠富農階級的。作者忘記了，在限制富農的剝削傾向的政策之下，只能够排擠富農的個別隊伍，這與暫時保留富農階級並不矛盾，而是預先決定這個問題的。要排擠富農階級，那麼限制和排擠其個別隊伍的政策是不夠的。能够排擠富農階級，就應該在公開的鬥爭中打破這個階級的反抗，剝奪其生

存與發展的生產來源（自由的使用土地、生產工具、租佃、傭備勞動權等）。這就是向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之轉變。沒有這種轉變，排富農階級就是無味的空談，這只對於右傾分子有利。沒有這種轉變，在鄉村中任何大的、通幣的集體化都是無稽之談。我們在鄉村中進政富農及實現通幣集體化的貧農與中農，對於這一點瞭解的非常清楚。很明顯的，我們有些同志現在還不瞭解這一點。

因此，目前黨在鄉村中的政策，並不是舊的政策之繼續，而是由限制（和排擠）鄉村中資本主義分子的舊政策向消滅富農階級的新政策的轉變。

（斯大林：「論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

「斯大林選集」，卷四，二〇四—二二頁）

## （4）斯大林論小農經濟發展的兩條

### 道路——資本主義道路與社會主義道路

農民經濟並不是資本主義的經濟，農民經濟，如果拿絕大多數的農戶來說，是一種小商品性的經濟。但什麼叫做小商品性的農民經濟呢？這就是一種站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個十字路口的經濟。它可以發展到資本主義方面去，也可以發展到社會主義方面去；在資本主義國家裡，它正在向資本主義方面發展，而在我們這裡，在我們的國家裡，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它就應該向社會主義方面發展。

爲什麼農民經濟這樣不穩固，這樣不獨立呢？原因在什麼地方呢？

原因就在於農民經濟散漫、無組織，它們依賴着城市，依賴着工業，依賴着信貸制度，依賴着國內政權的性質，最後，其原因還由於這樣一個大家所知道的原理，即無論在物質方面或文化方面，農

村是跟着城市走，而不要當着城市走。

農民經濟與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就是經過農民的最深刻的分化，在一個極端上是巨大的大地產，而在另一極端上則是廣泛的貧困化。這樣的發展道路，在資本主義國家裡是必不可免的，因為那裡的農村，農民經濟，是依賴着城市依賴着工業，依賴着城市裡的信貸，依賴着政權的性質的，而在城市居統治地位的，則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工業，資本主義的信貸制度，資本主義的國家政權。

在我們的國家裡，城市底面目是完全不同的，工業是由無產階級管轄着，運輸業、信貸制度、國家政權等都集中在無產階級的手裡，土地國有化是全國通行的法律，——在這樣一個國家裡，農民經濟是不是一定要走這條發展道路呢？當然是不一定要走的。正是相反。正是因為城市是農村的領導者，而在我們國家裡統治城市的是把國民經濟的一切命脈都管轄在自己手裡的無產階級，正是因為這樣，農民經濟在自己的發展中，就應該走另外一條道路，走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這條道路究竟是怎麼樣的呢？

這條道路就是：使千百萬農戶在各種合作方面廣泛的合作化起來，把渾散的農戶團結在社會主義工業周圍，在農民當中進行集體制度，起初是在農產品底銷售方面和農民所需要的城市製造品的供給方面，以後就在農業底生產方面。

而且愈是下去，則在無產階級專政底環境之下，這條道路愈是成爲必不可免的道路，因為，銷售事業的合作化，供給事業的合作化，最後，信貸及生產事業底合作化（農業協作社），是提高農村幸福唯一道路，是使廣大農民群眾擺脫窮困破產的唯一方法。

（斯大林：「關於列寧主義底問題」，「斯大林選集」卷二，七〇—七二頁）

我們大規模的集中的社會主義工業是依馬克思的擴大複生產的理論而發展的，因為他本身是逐年

增長，有它自己的積累。它是大踏步的前進着。但是我們的小農經濟並不單是我們的大工業。夜之夢。我們的國民經濟中還是小農經濟佔大部份。是否可以說我們的小農經濟也是依照擴大複生產的原則而發展的呢？不是的，我們不能這樣說，我們的小農經濟大多數不但不能每年實現擴大複生產，而且還常常有實現簡單複生產的可能。這種小農經濟既不能擴大複生產，又在我們的國民經濟上佔着大部份，我們有這種農村經濟的基礎，是否能夠加速的繼續推進我們社會化的工業？這是不行的。蘇維埃政權與社會主義的建設是否可以在一個多少比較長久的時間內建立在兩個不同的基礎上一——在巨大的、統一的、社會主義的工業基礎之上、及在最富饒的、落後的、小商品的農民經濟基礎之上呢？這是不行的。如果這樣，連整個的國民經濟都要完全斷送了。那末出路又在那裡呢？出路在於擴大農村經濟，使它能夠積累，能夠擴大複生產，並由此改進國民經濟底農業基礎。但是怎樣把它擴大起來呢？要擴大它有兩條道路：有資本主義的道路，就是在農村內扶植資本主義來擴大農村經濟。這條道路是會使農民貧窮，使農業中的資本主義企業發展起來，這條道路是我們所要排斥的，因為他與蘇維埃的經濟是不相容的。另外又有一條道路，就是社會主義的道路，就是在農業上扶植集體農場與蘇維埃的國立農場，這條道路能使小農經濟合併為大規模的集體農場，用技術與科學武裝起來，把農業中的資本主義分子去排除出去。我們擁護第二條道路。道路只可採取一條，不取第一條便取第二條，不是後退——走向資本主義，即是前進——走向社會主義。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而且是不能有的。

（斯大林：「論蘇聯的土地政策」，「斯大林選集」，卷四，九四—九五頁）

### （五） 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經過合作

#### 道路把農民經濟納入社會主義建設軌道

我們堅決地站在小農方面，我們將儘可能設法來使小農生活改善，來使他們易於過渡到合作經濟，要是他們願意的話；如果那時他們還不能同意這一點，那末我們就要努力給他們以多量的時間，使他們在自己的「小塊土地上去把這一點想一想。我們所以將要這樣做，不僅是因為我們認定獨立勞動的小農可以轉到這方面來，而且是為着黨的直接利益起見。被我們救全着而沒有墜落到無產者地位的，和還在農民地位時就被我們吸引過來的農民人數愈多，則社會的改造亦愈是迅速和愈是容易實行。如果我們等待資本主義生產到處發展到極端的結果，等待到最後一個小手工業者和小農民都變成大資本主義生產底犧牲品的時候，才來進行這種社會改造，那是沒有益處的。為了農民底利益，而不得不用社會公款來担負些物質犧牲，這從資本主義經濟底觀點上看來，好像是白白費金錢，但這正是善於利用資本，因為這樣担負犧牲，在以後實行整個社會改造時，或者可以節省十倍百倍金錢。因此，在這個意思上說來，我們可以很慷慨地對待農民。

（恩格斯：「農民問題」，引自斯大林「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斯大林選集」，卷一，六一—六二頁）

反對派說合作制是國家資本主義底一種，在說這種話的時候，他們引用列寧著的「糧食稅」這篇文章，因為他們這樣說，所以他們就不相信能夠利用合作制作為農村社會主義發展底基本關鍵。在這裡反對派也犯了最嚴重的錯誤。這樣來解釋合作制，在一九二一年的時候，在列寧著作「糧食稅」這篇文章的時候，是足夠的私可以滿意的，當時我們還沒有已經發展的社會主義工業，當時列寧把國家資本主義設想為我們經濟中可能的基本形式，而把合作制看作與國家資本主義相聯絡的東西。但是這樣的解釋到現在已經是不夠了，已經成為歷史上的舊話了，因為從那個時候起，情形已經改變了，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已經發展起來，國家資本主義並沒有生活到我們當時所希望的這種程度，而現在包括千萬以上會員的合作社系統，却已經開始與社會主義工業聯絡起來。

如果不是這樣，那麼怎樣可以解釋這樣一件事實：就是列寧在寫了「糧食稅」這篇文章以後兩年，在一九二三年，就用另外一種觀點來觀察合作制，認為，「在我們的條件之下，合作制往往是與社會主義完全相符合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六頁）

對於這一點的解釋就是：在這兩年之內，社會主義工業已經長大起來，而國家資本主義則沒有發展到應有的程度，因此列寧就不把合作制看作與國家資本主義相聯結的東西而把它看作與社會主義工業相聯結的東西了。如果不是這樣，那麼怎樣可以解釋這件事實呢？

合作制底發展條件已經改變了。對於合作制問題的態度當然也應當變更。

在列寧「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上，有絕妙的一段話說明這個問題，這段話就是：

「在國家資本主義下面，合作企業與國家資本主義企業所不同的地方，就是合作企業第一是私人的企業，第二是集體的企業。在我們現存的制度下面，合作企業與私人資本主義企業所不同的地方，就是合作企業是集體的企業，但是他們與社會主義企業却沒有區別，要是它們是建立在國家所有的、即工人階級所有的生產資料上的話。」（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九六頁）

在這段小小的引證中，解決了兩個大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現存的制度並不是國家資本主義。第二個問題就是，與「我們的制度」相聯結着的合作企業，是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的」。我想很難比這些話說得更清楚了。

請看列寧這本小冊子中的另一段話吧：

「在我們看來，單是合作制底發展已經就等於（祇有上面所指出的一些「小小的」例外）社會主義的發展。而這樣一來，我們就不得不承認我們對於社會主義的整個觀點都有根本的變更。」（請參看同卷同頁）

很明顯的，我們在「關於合作社」這本小冊子裏對於合作社的新的估計，而這種新的估計是就反對派所不願承認的，新反對派違背事實，違背淺顯的道理，違背列寧主義而竭力隱瞞這種新的估計。

與國家資本主義聯結着的合作社，是一回事，與社會主義工業聯結着的合作社，是另外一回事。但從這一點上並不能做出一個結論。說在「糧食稅」這篇文章與「關於合作社」這本小冊子中間，橫着什麼鴻溝，這種說法當然是不正確的。譬如祇要引證「糧食稅」這篇文章裏的下面這段話，就馬上可以懂得「糧食稅」這篇文章與「關於合作社」這本小冊子在合作社估計問題上，是有不可分離的聯系。請看這一段話吧。

「從租讓制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就是從大生產底一種形式過渡到大生產底另一種形式。從小經濟主底合作社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就是從小生產過渡到大生產，就是過這樣一種過渡，這種過渡比較複雜，但是它如果成功，就能够包括更廣大的民衆，就能拔出舊有的與社會主義以前的關係，甚至資本主義以前的關係底更深遠的和更有生機的根蒂，而後面這種關係，在反抗一切「雜新」的意思上講來，是最頑強不屈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三七頁）

從這段引證中可以看出，列寧還在作「糧食稅」這篇文章的時候，就是說在我們還沒有已經發展的社會主義工業的時候，就已認為合作社如有成功，就可以把它變成反對「社會主義以前的」關係，亦即是反對資本主義的關係的那種強有力的鬭爭工具。我覺得正是這一個思想，後來成了他的「關於合作社」這本小冊子底出發點。

但是從這一切話當中應當得出什麼結論呢？

從這一切話當中，應當得出的結論就是：新反對派合作社問題的觀點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而是形而上學的，新反對派不把合作社當作其去其來和國家聯結着的，譬如與國家資本主義聯結着（一九二一

『或與社會主義工業聯盟的內心。一九三三年，歷史現象，而把影響作一種永久的和一成不變的東西』，看作『自在的物』。

於是反對派關於合作制問題就犯了錯誤，由此反對派就不相信農村可以經過合作制而發展到社會主義去，於是反對派就滾到舊時的道路，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

（斯大林：『關於列寧主義底問題』，『斯大林選集』，卷二，七八—八二頁）

列寧說：

『在商品生產制度之下，小經濟制度是不能夠使人類丟掉階級的窮苦和壓迫的。』（『列寧全集』，第十四卷，上冊，第四九頁）

列寧說：

『小經濟是不能脫離窮苦的。』（『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三七八頁）

列寧說：

『倘若我們照舊的坐在小經濟裡面，雖然是自由民坐在自由土地上，但我們終究免不了遇到滅亡的危險。』（『列寧全集』，第十四卷，第一部，第一六八頁）

列寧說：

『祇有奔着公共的聯合的勞動，才能够脫離帝國主義戰爭逼着我們走上的絕路。』（『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三七五頁）

列寧說：

『必須轉變到大規模經濟中的公耕制度，因為不這樣做，就不能脫離俄國現在所受的破壞，就不能脫離那種簡直是絕望的情形。』（『列寧全集』，第十四卷，上冊，第一六九頁）

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集體農場是免除窮苦和黑暗的獨一無二的方法。

（斯大林：「給集體農場工作的同志們的答覆」，「斯大林選集」，卷四，一四七—一四八頁）

這條道路（指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編者）就是：使千百萬農戶在各種合作方面廣泛地合作化起來，把分散的農戶團結在社會主義工業周圍，在農民當中進行集體制度，起初是在農產品底銷售方面和農民所需要的城市製造品的供給方面，以後就在農業底生產方面。

而且愈是下去，則在無產階級專政底環旁之下，這條道路愈成爲必不可免的道路，因爲，銷售事業的合作化，供給事業的合作化，最後，信貸及生產事業的合作化（農業協作社），是提高農村幸福的唯一道路，是使廣大農民羣衆擺脫貧窮破產的唯一方法。

有人說：在我們這裡，農民，就其地位說來並不是社會主義性的，因此他們沒有能力走向社會主義的發展。說農民就其經濟狀況說來並不是社會主義性的，這當然是對的。可是，並不能根據這一點來否認農民經濟能够按着社會主義的道路去發展，因爲既然是已經證明了，農村是隨着城市走的，而統治城市的則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在十月革命的時候，農民，就其地位說來也不是社會主義性的，他們當時並不想在國內建立社會主義。他們當時所努力要求的，主要的是消滅地主政權和停止戰爭，奠定和平。然而他們當時還是隨從了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爲什麼呢？因爲在當時，推翻資產階級和由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是蘇聯帝國主義戰爭的唯一道路，是奠定和平的唯一道路，因爲在當時沒有別的道路而且不能有別的道路，因爲在當時我們的黨得以摸到，得以找到這樣一個標準，在這個標準以內可以使農民的特別利益（推翻地主、奠定和平）與國家的一般利益（無產階級專政）結合起來，並使前者服從後者，這種標準對於農民是可以接受的和有利的。因此，農民雖然有其非社會主義性，當時還是隨從了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

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關於吸收農民走上社會主義建設軌道的問題，也應該這樣說。農民「稅其狀況說來不是社會主義性的，可是他們應該走上而且一定會走上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因為除了與無產階級聯絡以外，除了與社會主義的工業聯絡以外，除了使農民經濟經過農民廣泛的合作化而走上社會主義發展軌道以外，就沒有而且也不能有其他的道路足以使農民擺脫貧窮破產的境地了。爲什麼一定是經過農民廣泛的合作化呢？

因爲廣泛的合作化就是「我們所找到的這樣一個標準，在這個標準以內，可以使私人的利益，私人商業的利益，和由國家對這種利益的審察及監督聯合起來，可以使這種利益受一般利益的支配。」（列寧）這個標準，對於農民是可以接受和有利的，這個標準可以保證無產階級有可能來把基本農民羣衆吸收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去。正因爲對於農民，經過合作社來銷售自己的商品和經過合作社來爲自己的經濟領導機器，是有利的事情，正因爲這樣，所以農民應當走上而且一定會走上廣泛的合作化道路。

而在社會主義工業佔統治地位的條件之下，農民們底廣泛的合作化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小商品性的農民經濟離開舊的、使農民大批破產的資本主義道路，而過渡到新的發展道路，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正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爲農民經濟新的發展道路而鬭爭，爲吸收農民基本羣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鬭爭，是我們黨底當前任務。

（斯大林：「關於列寧主義底問題」）

「斯大林選集」，卷二，七二—七四頁）

我在不久以前一篇論文中（「大轉變的一年」）發揮了一些論據，證明農業上大經濟比小經濟優越，當時所指的是大規模的黨業或農場。很明顯的，所有這些論據也完全適用於集體農場，因爲集體

農場也是大規模的經濟單位。我所指的不單是發達的有機器和拖拉機作基礎的集體農場，同時也指那些初級的、依賴農民器具的、即所謂「一手工作坊式」的集體農場。我講的是現時在統籌集體化的區域內所建立的、其依靠農民生產工具底簡單湊合的那些初級集體農場。例如，在從前的頓河洲、河帕拉區底集體農場。這種集體農場，就技術上看來（機器少，拖拉機少）似乎和小農經濟差不多。其實農民工具簡單湊合在集體農場內，便得到了我們底實行家所夢想不到的功效。功效在什麼地方呢？功效就在於一成立農場，就使耕種的面積擴大了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以至於百分之五十。這種「竊破腦袋」的功效，是怎樣來的呢？這是因為農民在個人勞動的條件之下力量薄弱；一旦把工具合併起來，統一於集體經濟內，便變成了極大的力量；因為農民能夠耕種在個人勞動條件下難於耕種的荒地（和生地；因為農民可以把生地拿到自己手裡來；因為一切荒地、小塊的土地、牠畝的邊界等等都有使用底可能了。

在最近以前，農民還用舊式農具，用個人勞動的方法去種田。大家都知道，個人勞動使用舊舊的、現在已經不中用了的生產工具，決不能賺得必需的資料來過寬裕生活，經常的提高物質狀況，發展自己的文化，和跑上社會主義建設的廣闊大道。現在呢，自從加緊發展集體農場運動以後，農民就可以把自己的勞動和鄰人的勞動聯合在集體農場之內，開闢生地，利用荒地，得到機器和拖拉機，因此自己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兩三倍。這表示什麼呢？這是說農民現在，因加入集體農場之故，可以費同等的勞力而得更多的生產。這就是說糧食的生產比以前便宜得多了。這是說，如價格不變，則農民出賣糧食得到的比以前多得多了。

經濟形式是什麼來決定的呢？當然是由生產過程中人底關係來決定的。難道還有別的東西可以決

定經濟的形式嗎？但是要問：在集體農場內難道有生產工具私有主這個階級和喪失了這些生產工具的階級嗎？集體農場內難道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嗎？難道集體農場不是在國家的土地把主要的生產工具社會化嗎？有什麼根據來肯定集體農場這種經濟形式不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之一？

當然，集體農場內是有矛盾的。當然在集體農場內是有個人主義的，甚至於富農的殘餘，這些殘餘還沒有消滅，但是一到了集體農場的鞏固和機器化的程度加强的時候，這些殘餘是一定要消滅的。可是整個集體農場，把它的矛盾與缺點都算在一起，把它當作一種經濟看，它在基本上是代表農村發展底新路線，農村社會主義發展底新路線，去對抗舊農，去反抗資本主義的發展路線的，這難道也可以否認嗎？集體農場（當然不是指那些集體農場而言）在我們的條件之下是鄉村中社會主義建設底基礎與基礎。是在與資本主義分子作死鬥中生長起來的，這難道可以否認嗎？

（斯大林：「論蘇聯的土地政策」，

「斯大林選集」，卷四，一〇二頁（一〇七頁）

人們有時候把集體農莊運動與合作社運動對立起來，這些人大概是認為，集體農莊是一個東西，而合作社却是另一個東西。這當然是不對的。有些人甚至還把集體農莊與列寧的合作制計劃對立起來。不消說，這樣的對立是絲毫不符實情的。實際上，集體農莊是合作社底一種，是生產合作社底最明顯的一種。有銷售合作社，有供給合作社，也有生產合作社。集體農莊一般地是合作社運動底分不開的一部分，局部地是列寧的合作制計劃底分不開的一部分。實行列寧的合作制計劃——這就是把農民從銷售合作社和供給合作社提高到生產合作社，提高到集體農莊的合作社。局部地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才有下面這樣的事實，就是：在我們這裡，集體農莊只是由於銷售合作社和供給合作社發展和加强的結果才開始產生和發展起來。

（斯大林：「糧食戰線上的問題」，

「斯大林選集」，卷三，二七三—二七四頁

有些同志以為，過渡到新的道路，過渡到集體農莊的道路，在我們這裡，這件事務是在三年以前開始的，這只是局部正確的。當然，集體農莊大批的建設，是在三年以前開始的。大家都知道，這個過渡底特徵會是：富農階級被我們擊潰，千百萬貧農、中農加入集體農莊，所有這些都是對的。但爲要開始這個大批群眾過渡到集體農莊的過程，就須備有一些先決條件，如果沒有這些條件，群眾的集體農莊運動，一般講來是不可能的。第一、要有蘇維埃政權，蘇維埃政權過去會幫助了、而且現在仍在幫助農民走上集體農莊的道路；第二、要趕走地主及資本家，剝奪它們的工廠和土地，宣佈工廠和土地爲民衆底公產；第三、要壓服富農階級，剝奪它的機器和拖拉機；第四、要宣佈祇有統一在集體農莊以內的貧農和中農，才能使用機器和拖拉機；最後、要使國家工業化，建設新的拖拉機工業，建設新的農業機器製造廠，以便用大批的拖拉機和機器來供給集體農莊的農民。如果沒有這些先決條件，那就根本不要去想三年以前開始的大批群眾過渡到集體農莊道路的事情了。

因此，要過渡到集體農莊的道路，首先就須完成十月革命，推翻資本家和地主，奪取他們的土地和工廠，建設新的工業。

過渡到新的道路，過渡到集體農莊的道路，這們過程，就是從十月革命時候起開始的。這個過程祇在三年以前才用新的力量擴展起來，這是因爲祇有在那個時候，十月革命底經濟上的結果才全盤表現了出來，祇有在那個時候，會能推進國家工業化的事業。

因此，十月革命是農民過渡到新的集體農莊的道路上去的一個先決條件和必要前提。

（斯大林：「在全蘇聯集體農莊突擊隊員第一次代表

大會上的演說」，「斯大林選集」，卷五，七三—七五頁）

我們集體農莊政策之所以能夠得到勝利，正是因爲這種政策是依靠着集體農莊運動的自願性和對

蘇聯境內各區域特殊條件的估計。不能用強力來組織集體農莊。如果這樣，那就是愚蠢和反動了。集體農莊運動應該依靠基本的農民群眾積極的幫助。不應該把集體農莊建設發達的區域內的機械模範式的搬到不發達的區域內去。如果這樣，便是愚蠢和反動行爲了。這種「政策」，一下子就會使集體農莊的思想煙消雲散。在決定集體農莊建設的速度與方法的時候，必須小心的研究蘇聯各區域中特殊的條件。出產五穀的區域，在集體農莊運動方面比一切區域都先進。爲什麼？第一、因爲在這些區域內，我們已經有了許多穩固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正因爲這個緣由，農民才能够相信新技術的意義與力量，相信新的集體經濟組織的意義與力量。第二、因爲這些區域，在收買糧食的運動中，有了兩年來與富農鬭爭的經驗，這自然不能不使集體農莊運動事業的進行更加容易些。最後、因爲在這些區域中，最近兩年來，我們從工業中心裡加派了大批優秀的幹部人材去工作。不能夠說在其他的區域內，譬如：在我們北部的消費區域，或者是落後的民族區域，例如土耳其斯坦，也有這些順利的條件呢？不能，這是不夠說的。很明顯的，對於蘇聯各區域的特殊條件加以估計的這個原則，和自願性的原則同樣是健全的集體農莊運動的最重要的先決條件之一。

（斯大林：「勝利衝昏頭腦」，

「斯大林選集」，卷四，一二五—一二六頁）

本黨政治戰畧的一個極大好處，就是在每個時期黨都會去選擇運動中的主要點，抓着這一點，然後再推動全部運動向一個總的目標進行，以便解決問題。能不能說黨在集體農莊建設的系統上已經選定了集體農莊運動的主要點呢？可以這樣說，而且應該這樣說。這個主要點在什麼地方呢？是不是土地公耕社呢？不是的，不在這裡。在土地公耕社裡生產工具並不社會化，他已經是集體農莊運動過去的階段了。這個主要點是農業公社嗎？也不是的，也不是農業公社。農業公社目前還是集體農莊運動中單獨的現象。如果農業公社成了普遍的形式，那末，不僅是全部生產已經社會化，而且分配也社會

化了，這個條件還沒有成熟。集體農莊運動目前的主要點，它的普通的形式，而且是我們現在應該培植的，就是農業勞動組合。在農業勞動組合裡面，主要的生產方法已經社會化了，這主要的是與五穀經濟有關的，例如：勞動、土地使用、機器及其他的器具、牲畜、經濟建築物等等。在這裡面沒有社會化的還有：園藝地（如小菜園、菜園等）、住房、一部份的奶牛、小牲畜、家禽等。勞動組合所以是集體農莊運動的主要點，因為他是解決五穀問題最適宜的形式。而五穀問題又是全部農村經濟系統中的主要點，因為要是不解決這個問題，那末，無論是畜牧事業（小的或大的）或供給工業原料的特別農產物與原料植物的問題，都是不能解決的。因此，農業勞動組合在目前是集體農莊運動中的主要點。

（斯大林：「勝利衝昏頭腦」，

「斯大林選集」，卷四，一二七—一二八頁）

## （6）蘇聯實行農業齊體化及其偉大成就

農業，特別是穀物業底情形，却不同了。雖然整個說來，農業是超過戰前水平了，但是它的主要部門——穀物業——出產總量，却只佔戰前水平百分之九十一，而穀物出產總量中的商品部分即賣出去供給城市需要的部份，却未必已達到戰前水平百分之三十七；而且，當時一切事實都說明穀物出產總量中的商品部份，將有繼續低落的危險。

這就是說，一九一八年開始在農村中發生的、由大的商品的農莊分碎為小農莊，而小農莊分碎為極小農莊的現象，還在繼續着：小的和極小的農民經濟成為半自然的經濟，祇能出產最低限度的商品穀物；一九二七年時期的穀物業，雖然出產着比戰前穀物業稍少些的穀物，然而，它所能出賣給城市的數量，却只是稍許比戰前穀物業所能出賣的穀物數量三分之一多一點。

毫無疑義的，在穀物業這種狀況之下蘇聯的軍隊和城市就會陷於性的飢餓情況中。這會是穀物業底危機，在這種危機後面，養畜業的危機，勢必跟隨而至。

爲要擺脫這種狀況，就必須在農業方面過渡到大規模的生產，這種大生產是能够使用拖拉機和農機並把穀物業區商品產量提高幾倍的。當時在國家面前擺着兩種可能：或者是過渡到大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這就是農民群眾遭受破產，使工農聯盟陷於滅亡，使富農勢力加強並使社會主義在農村中遭受失敗；或者是走上把小的農民的農莊統一成爲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農莊，統一爲集體農莊的道路。這種農莊是能够利用拖拉機以及其他現代機器來迅速提高穀物業及其商品產量的。

不言而喻的，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祇能够走上第二條道路，即集體農莊的農業發展道路。

這就是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前夜的環境。

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是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開幕的……

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工作報告中指出工業化底成功和社會主義工業底迅速增長時，向黨提出任務如下：

『在國民經濟一切部門中，無論是在城市中，無論是在鄉村中，都要擴大和鞏固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命脈，抱定要消滅在國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的方針。』

斯大林同志拿農業來和工業比較，並指出農業——特別是穀物業——因本身零散而不允許採用近代技術以致落後時，會着重指出：農業這樣值不得羨慕的情形，給整個國民經濟造成威脅的狀況。

『出路在什麼地方呢？』——斯大林同志問道。

『出路，——斯大林同志回答道——就在於要以公共的土地耕種制爲基礎來使小的和零散的農莊過渡到大的和聯合的農莊，要以新的更高的技術爲基礎來過渡到集體的土地耕種制。』

出路就在於逐漸的、但一貫到底地、不是停滯進方法、而是用更妥協和更靈活的方法，把小的和較小的農莊統一為大的農莊，以公共的、協作的集體的土地耕種制為基礎，採用農業機器和拖拉機，採用增加農業強度的科學方法。別的出路是沒有的。」

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極力開展農業集體化的決議。代表大會規定了擴大和鞏固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網的計劃，並給了關於如何為農業集體化而鬪爭的明確指示。

（「聯共黨史」，莫斯科本，三四二—三四五頁）

黨根據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的指令，已進而向富農作堅決的進攻了。黨在實行自己的進攻中所發現的口號，就是：「堅固地倚靠著貧農和鞏固與中農的聯盟，進行堅決的反富農的鬪爭。」為回答富農拒絕按固定價格出賣剩餘糧食給國家起見，黨和政府就實行了許多反對富農的非常辦法，採用了刑律第一百零七條，就是說，凡遇富農及投機商人拒絕按固定價格出賣剩餘糧食給國家時，得根據法庭判決而沒收富農及投機商人所有的剩餘糧食；並給與貧農許多優待，由於這些優待，貧農會從被沒收的富農糧食中，領得百分之二十五以供自己支配。

非常辦法是發生了自己的效力：貧農和中農已加入堅決的反富農鬪爭了，富農已被孤立了，富農和投機商人底反抗已被打破了。到一九二八年年末，蘇維埃國家已擁有充足的由自己支配的後備糧食，而集體農莊運動，則以更有信心的步驟向前邁進了。……

農民在這次並不比工人落後。在農村中，建設集體農莊的農民群眾底勞動高漲，也開始了。農民群眾已開始確定地轉向集體農莊方面來了。以拖拉機和其他機器為武裝的蘇維埃農莊和機器拖拉機站，在選裡起了巨大的作用。農民成群結隊地來到蘇維埃農莊，來到機器拖拉機站，參觀拖拉機以及其他農業機器底工作，表示出自己的歡欣，並就地通過決議——「加入集體農莊」。農民會定分成許多小的和最小的個體農莊，沒有少許像樣子的工具和曳引力，沒有耕種廣大荒地的可能，沒有改善經濟

的前途，而使受貧困所拘束，孤零而無所倚靠的，——現在，農民畢竟已找到出路了。找到走到優美生活的道路了，這條道路就在於把細小的農莊聯合為集體，聯合為集體農莊，這條道路，就在於能夠辦任何「硬土」，任何荒地的拖拉機。這條道路就在於國家以機器、金錢、人材和意見給予的幫助，這條道路，就在於擺脫富農奴役的可能，而這些富農剛在不久之前，才被蘇維埃政府所擊破和打得永遠不能翻身，使千百萬農民群眾引以為快。

在這個基礎上，詩黎的集體農莊運動就開始了，隨後就開展了，到一九二九年末，則已特別加強起來了，並使集體農莊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增長起來，這種速度，甚至於就連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也是未曾知道的。

在一九二八年，集體農莊播種面積，計有一百三十九萬海克脫，在一九二九年，計有四百二十六萬二千海克脫，在一九三〇年，集體農莊則已經有可能規定耕種一千五百萬海克脫土地的計劃了。斯大林同志在其論文「偉大轉變的一年」中（一九二九年）曾說到集體農莊增長底速度，他說：

「必須承認，這樣洶湧的發展速度，甚至於就連我們的社會主義化的大工業也未曾知道，而社會主義化的大工業發展底速度，一般說來，乃是規模很大的。」

這就是集體農莊運動發展過程中的轉變。  
這就是群眾集體農莊運動底開始。

「現時集體農莊運動中新現象在什麼地方？」——斯大林同志在其論文「偉大轉變的一年」中這樣說，他接着就回答道：

「現時集體農莊運動中的新的和有決定意義的現象，就是農民現時加入集體農莊，並不是以個別集團為單位，如像從前那樣，而是以整個鄉村，整個鄉鎮，整個區，甚至於整個府為單位。而這是說明什麼呢？這就是說明，中農已走進集體農莊了。這就是農業發展過程中的根本轉變之基礎所在，而

這個轉變，乃是蘇維埃政權最重要的成績……。」  
這就是說，在全盤集體化基礎上消滅富農之為階級的任務，是正在成熟着，或者是已經成熟了。

（「聯共黨史」，莫斯科本，三四八一—三五六頁）

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所開展的、大批農民加入集體農莊的運動，是黨和政府過去全部工作的結果。社會主義工業之增長，以至於開始為着農業來生產大批拖拉機和農業機器；在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採辦糧食運動時與富農所進行的堅決鬭爭；逐漸教導農民走向集體經濟的農業合作社之增長；第一批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之良好的經驗，——所有這些，都準備了過渡到全盤集體化的條件，農民以整鄉、整區、整府為單位加入集體農莊的條件。

過渡到全盤集體化之經過，並不是由於基本農民群眾之簡單的和平的加入集體農莊，而是由於農民反富農的群眾鬭爭。全盤集體化，就是要全村所有一切土地都轉入集體農莊之手，然而這些土地頗大一部分，曾在富農手中的，——因此，農民就把富農從土地上趕走，沒收富農底財產，奪取富農底牲畜和機器，並要求蘇維埃政權逮捕和驅逐富農。

這樣，全盤集體化就是消滅富農。

這就是在全盤集體化基礎上，消滅富農之為階級的政策。

在一九二九年末，因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之增長，蘇維埃政權就離開這個政策（指一九二九年以前蘇維埃政府所實行的限制富農的政策——編者），而實行一個急劇的轉變了。它已進到消滅富農之為階級的政策，進到剷除富農之為階級的政策了。它廢除了租地法和勞動鼠備法，這樣就使富農既喪失土地，又喪失雇傭工作者。它取消了關於禁止沒收富農財產的命令。它准許了農民沒收富農底牲畜、機器和其它農具以利於集體農莊。富農是被剝奪了，富農之被剝奪，也如在一九一八年，資本案

在工業方面被剝奪一樣，而其不同處，則是舊底生產資料這次已不是轉入國家之手，而是轉入已經聯合起來的農民之手，於是說，轉入集體農莊之手了。

這是一個最深刻的革命大變革，是從社會的舊質態進到新質態的飛躍，照其結果來說，它是與一九一七年十月的革命大變革有同等意義的。

這個革命底特殊處，就在於它是由上面，由國家政權所提倡，和在千百萬為反對富農束縛，為自由的集體農莊生活而奮鬥的農民群眾從下面來的直接贊助之下實現的。

這個革命，一舉而解決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三個根本問題。

(1) 它已經把我們國內人數最多的剝削者階級——富農階級，即資本主義復辟的支柱消滅了。

(2) 它已經把我們國內人數最多的勞動者階級——農民階級，從產生着資本主義個體經濟道路上，轉移到公共的、集體農莊的、社會主義經濟道路上了。

(3) 它已經在國民經濟最廣闊的和為生命所必需的，但同時又是最落後的部門——農業中，為蘇維埃政權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礎。

於是，就在國內消滅了資本主義復辟底最後的根源，並創造了為建成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所必需的新的、有決定意義的條件。

## 四 中國農民土地問題

### (一) 列寧、斯大林論殖民地半殖民地農

#### 民問題

#### (I) 列寧論要善於把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踐

#### 應用於以農民爲主要群衆的國度

東方人民之大多數所處的狀況，甚至比在歐洲最落後的國度——俄國更壞，可是我們的鬭爭所以如此容易進行，是因爲工人和農民會更聯合起來反對資本和封建制度；在這裡與東方人民的聯系更其強烈，是因爲東方人民的大多數都是勞動群衆的代表者，都不是在帝國主義工廠作坊中受過訓練的工人，而是勞動的、被剝削的農民羣衆底典型的代表者，這些農民正感受着中世紀壓迫的痛苦。俄國革命指示出，農民羣衆底任務，是怎樣把數萬萬散漫的農民勞動羣衆結合起來，勝利地舉義，反對了中世紀的壓迫……

的)：你的依據若是一般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時，在應用於歐戰各國所沒有的條件下，在應用於特殊的條件下，需要善於把這個理論和實踐應用於以農民為主要群眾，所要解決的鬥爭任務不是反對資本而是反對中世紀殘餘的這種條件。這是一項艱巨而特殊的任務，然而這一任務却是特別可感謝的，因為這把還沒有參加過鬥爭的群眾捲入鬥爭了。……

(列寧：「東方人民醒醒了」，共產國際、列、斯「論中國」，四〇頁)

### (3) 列寧論殖民地半殖民地

#### 無產階級政黨要與農民建立一定的關係

我們曾經爭論：主張共產國際和共產黨應當援助落後國度裡面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這在原則上命題上是不是正確的呢？這種爭論底結果，我們會達到了一致的解決：用「民族主義革命運動」以代替「資產階級民主運動」。毫無疑義的，任何民族主義的運動只能是資產階級民主的運動，因為落後國度裡居民底基本群眾乃是農民，而農民乃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關係的代表者。誰要是以為無產階級政黨——假如它在這樣的國度裡面，一般地能夠發生的話——不與農民運動成立一定的關係，不在事實上援助農民運動，就能够在這些落後的國度裡面實行共產主義的黨界和共產主義的政策，那就是空想。

(列寧：「民族解放運動與共產國際底關係」)

黨界，共產國際、列、斯「論中國」，五六頁)

### (3) 斯大林論農民問題實質上是農民問題

托起，含求契同志還沒有完全弄明電報一語。因此，便企圖把民族問題降低到憲法的立場上，就是說，把民族問題當作改良的問題。

從這錯誤中又產生出了他的另一個錯誤，這裏二個錯誤就在於他不願意把民族問題在實質上看作農民問題，這並不是土地問題，而是農民問題，因為這是兩個不同的東西。至於說民族問題不能與農民問題視作一個東西，那是完全正確的。因為除了農民問題之外，民族問題還包括民族文化、民族國等等問題在內。不過，民族問題的基礎，它的內在的本質，仍是農民問題，這也是毫無疑義的。所謂農民民族運動的基本軍隊，沒有農民這支軍隊，就沒有而且也不能有強大的民族運動，即可以此來說的。所謂民族問題，在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正是這道理而說的。……

（斯大林：「論斯捷夫的民族問題」，

共產國際、列、斯「論中國」一九二九二頁）

……現在民族問題已由地方的和國家內部的問題轉為世界性的問題，轉變為關於殖民地與附庸民族底帝國主義鬥爭的問題，這時候民族問題的本質是在什麼地方呢？這時民族問題的本質是在於殖民地與附庸民族底人民大眾反對統治民族底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方面對於這些殖民地和附庸民族之財政剝削、政治的奴役以及文化的暴行。在民族問題的這一提法之下，各民族底資產階級相互間的競爭。還有什麼意義呢？很明顯的，它沒有決定的意義，在若干情形之下，甚至沒有重要的意義了。很明白的，這最主要的並不是指某一民族底資產階級在競爭中打倒或者可以打倒另一個民族底資產階級而言，而是指統治民族底帝國主義集團和壓迫殖民地及附庸民族底基本群眾！尤其是農民階級革命的鬥爭了。如果說民族運動底基本軍隊是農民階級，各民族底資產階級相互間的競爭，那末就不能把民族問題看做在實質上是農民的鬥爭了。反過來說，如果說把民族問題看做在實質上是農民的鬥爭，那末，像說

不能把民族問題更有意義的作為各民族的發展階級之競爭。要在這幾個公式之間劃一個等號，那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再論民族問題」）

共產國際、列、斯「論中國」，一九三二一九四頁）

### （4）一 列寧論孫中山「平均地權」的意義

……中國這一個落後的、農業的、半封建的國家之經濟的條件，提在四五萬萬人民底生活日程上的，只是這種壓迫與剝削（對資本的壓迫與剝削——租者）底一個一定的、歷史上特殊的形式——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曾經在農業生活及自然經濟的統治上；中國農民所受的封建剝削底來源，就是它在這種或那種形式下被束縛於土地這個事實。……

孫中山在其文章底前段大談其「經濟革命」，談到如此清楚而又如此懇切，試問這個「經濟革命」，在事實上要做到什麼呢？

要做到地租轉交國家，即取消那種在簡單一稅制來實行土地國有。在孫中山所提出和所宣傳的「經濟革命」裡面，當的現實的東西是絕對沒有的了。

窮鄉僻壤的土地價值與上海的土地價值間的差別，就是地租大小上的差別。要使土地底「價值之增加」成為「人民之財產」，那就是說把地租即土地所有權，交給國家，或者換一句話說，使土地國有化。

這樣的改良，在資本主義範圍以內是否可能呢？不但可能，而且它是最純粹的、最徹底的、完滿到合於理想的資本主義。……

土地國有化，可以消滅地租，只保留下了級差地租。照馬克思的學說，所謂土地國有，就

是在農業上儘量剷除中世紀的殘留與中世紀的關係，土地買賣有最大的自由，農業最容易的適應於市場。歷史的作弄就在於：民粹主義為着與農業中的「資本主義作鬭爭」，而主張這樣的土地綱領，但這個綱領底完全實現，却表示農業中的資本主義底最迅速的發展。

在亞洲一個最落後的農民國家裡，流行着這種最先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土地綱領，這是什麼經濟上的必要性所引起的呢？這就是毀壞各種各色的封建制度之必要性。

中國越落在歐洲與日本之後，便越有四分五裂和民族解體的危險。只有革命的人民大眾底英雄主義、才能「維新」中國，在政治方面創造「中華民國」，在土地方面實行國有化以保證最快的資本主義的進步。

……孫中山所代表的革命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認為在政治改良及土地改良事業上，儘量發展農民群眾底自動性、堅決性及勇敢心，乃是中國「更新」的道路，這是正確的。

（列寧：「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

共產國際、列、斯「論中國」，九十一〇頁）

## （二）斯大林、毛澤東論中國革命是反帝反封建

兩支巨流之匯合，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  
的基本問題，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  
主要力量

搖搖欲墜同宗屬是主權與之，他是在於也不過得中國者，其意義與性質。共產國際從下述一點出發的：即封建殘餘乃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障礙。共產國際在從前一點出發的，即中國農村中封建殘餘及封建地租剝削上面的全部封建關係，如豪軍、若省長、若張作霖等，——都是今日中國土地革命的主要障礙和目前農民階級的基礎。若是在許多省份內，農民收入底百分之七十，要貢獻給地主和劣紳；若是地主（或豪的或沒有武裝的）不但是經濟的、而且是行政的和審判的權力；若是直到現在在許多省份內還在實行着半世紀的買賣婦女和小孩的事情，那末不能不承認封建殘餘是中國各省應進之基本形式。正因為封建殘餘及其全部軍閥官僚上層建築，乃是中國壓迫之基本形式，所以，現在中國革命在選擇着一個接其力量及其發展長說來最偉大的土地革命。什麼叫做土地革命呢？土地革命乃是對封建地主的革命。唯共如此，所以共產國際說，中國在現在正在經歷着資產階級民主的革命。

但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僅是在反對封建殘餘而已，它同時還反對帝國主義。為什麼呢？因為帝國主義及其所有在中國的金錢和軍事的力量，正是那支持、鼓舞、培植、維持封建殘餘及其全部軍閥官僚上層建築的力量。因為不同時進行反對中國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就不能消滅中國的封建殘餘。因為誰想消滅中國的封建殘餘，誰就必須舉手反對在中國的帝國主義及帝國主義集團。因為不與帝國主義作鬥爭的鬥爭，便不能徹底打倒和消滅中國封建殘餘。唯共如此，所以共產國際說，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同時又是反帝鬥爭的革命。

這樣，今日的中國革命，便是兩支革命運動巨流——反對封建殘餘的革命運動與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之匯合。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乃是反對封建殘餘與反帝國主義鬥爭之匯合。

（斯大林：『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的任務』，一九二七年）

五月，共產國際、列、斯、論中國，一四八頁）

我知道，在國民黨人中間，在共產黨人中間，有些人不主張開辦農會的革命，害怕農民捲入革命，破壞了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但志願在共產黨人中間，中國農民捲入革命，對於推翻舊政則中國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亦將趨強大大越行力量。

中國革命者，爲了喚起中國數萬萬的農民起來革命，所應走的道路是什麼呢？

我想，在當前條件之下，只能談到三條道路：

這一條道路，這就是成立農民委員會和中國革命者加入這種委員會、以影響農民的道路。（會場喊聲：「但是農民協會呢？」）我想，農民協會將組織在農民委員會的周圍，或者農民協會變成農民委員會，而付與實現農民要求所必需的某種權力。關於這條道路，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了……但是這條道路還是不夠的。誰以爲中國這個事情的革命者已經很够了，那定可笑的。在中國，約有四萬萬人口，其中約有三萬萬五千或是中二人（即漢族——譯者），其中十分之九以上是農民。以爲幾萬個中國革命者，就能激發這個農民大洋，那真是自欺欺人，這就是說，這應該找別的道路。

第二條道路，這就是經過新的、人民革命的政權機關以影響農民的道路。毫無疑義的，在新解放的省份裡，將成立廣東政權機關的新政權。毫無疑義的，這個政權和這個政權底機關，要是它想真正推進革命的話，那就應該設法滿足農民最迫切的要求。所以，共產黨人和中國一般革命者底任務，就在於加入新政權的機關，使這個機關接近農民群眾，經過這個機關幫助農民群眾，滿足其迫切的要求。至於方法：或是用蘇聯民主主義的辦法，或是用清教徒的辦法，則依情況而定。

第三條道路，就是共產黨革命黨以影響農民。我已經說過了革命黨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意義。中國的革命軍隊是這樣一種力量：它是第一個深入於新的省份的，它是第一個深入於農民群眾，農民首先會來向新的政府，向它的政策之進攻。農民對於新政府、對於國民黨、對於一般中國革命

的關係，將依革命軍隊的品質，將依它對於農民和地主的關係，將依它對於農民幫助的程度以轉移，要是再注意到不少懷疑分子依附於中國革命軍隊，這些分子可以變壞軍隊的面目，那末便可明白，軍隊的政治面貌和其對於農民的政策，在農民眼中有多麼大的意義了。所以，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一般革命者，應該極力使軍隊中反農民的分子守中立，保持軍隊的革命精神，並做到使軍隊幫助農民，掀起他們參加革命。有人說，在中國，一般人民都是熱烈地歡迎革命軍隊的。但是一到軍隊駐紮以後，却發生了若干的失望。這在我們蘇聯內戰時期，也有同樣的情形。這是由於軍隊在解放新的省份而駐在該地時，不得不靠該周圍的人民來給養。我們蘇聯的革命者，普通是用經過軍隊幫助農民以反對地主的辦法來彌補這個缺點的，中國革命者，也必須學會用經過軍隊實行正確的農民政策的辦法來彌補這個缺點。

（斯大林：「論中國革命前途」，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共產國際、列、斯「論中國」，一一五—一一六頁。）

「在中國現在是需要提出農民馬上奪取土地的口號嗎？你對於湖南農民奪取土地這件事情，怎樣估計？」

我想是需要的，而且是絕對需要的。事實上在許多區域裡，沒收土地的口號已經在執行着。在許多區域裡，如湖南、湖北等地，農民已經在從下面上的奪取着土地，設立着自己的法庭，自己的制裁，並實行自衛。我想，在最近的將來，全中國的農民都要歸到實行沒收土地的口號的。中國革命底力量就在這裡。如果武漢政府想獲得勝利，如果它想要創造反對張作霖、反對蔣介石、反對帝國主義的實際的力量，——它就應當盡力支持奪取地主土地的農民土地革命。如果以為在中國只用軍事力量，就可以打倒封建制度和帝國主義，那是癡人作夢。沒有土地革命，沒有數百萬工農群眾積極幫助武漢軍隊，要想打倒這些反動力量，是絕對不可能的。

反對派常常把蔣介石的叛變估計爲中國革命之衰落。這簡直是胡說八道。把蔣介石叛變估計爲中國革命衰落的人，在實際上就是維護蔣介石的，在實際上就是變成蔣介石回到國民黨裡來的。顯然，他們以爲，如果蔣介石不叛變的話，那末革命的情形也許要好些。這種想法是愚蠢的、不革命的。蔣介石之叛變，在事實上是使國民黨洗去了污點，把國民黨的核心推向左邊了。自然，蔣介石底叛變，不能不使許多區域裡的工人受到局部的失敗。不過，這只是局部的、暫時的失敗而已。在事實上，因爲蔣介石底叛變，整個革命已進到了其發展底最高階段，土地革命階段。中國革命底力量初威勢，就在這個地方。

不能把革命運動看做一直上昇的運動。這是對於革命的舊本的非現實的觀念。革命總是曲線進行的，它在一些區域裡進攻和破壞了舊制度，而在其他區域裡却遭受局部的失敗，實行退守。蔣介石底叛變，是中國革命進程中這種曲折之一，這種曲折是必要的，因爲藉此可以給革命洗去污點，把革命推動到強大的土地革命的道路上去。

但是要使土地革命能够普遍形成，那就須有一個概括的口號。這個口號就是沒收地主的土地。

（斯大林：「與中國勞動大學學生的談話」，一九二七年）

五月，共產國際、列、斯「論中國」，一四三頁）

……中國現時的社會，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社會。只有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才能認清中國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任務、中國革命的動力、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革命的前途與轉變。所以，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是說，就是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

中國現時社會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那末，中國現階段革命的主要對象或主要敵人，究竟是誰呢？

不是別的，就是帝國主義與半封建勢力，就是外國的資產階級與本國的地主階級。因為在現階段中國社會中，壓迫並阻礙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主要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他們二者，二者互相勾結以壓迫中國人民，而以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為最大的壓迫，因而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第一個和最兇惡的敵人。

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國以來。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與勾結日本公開投降或準備投降的一切漢奸。

中國資產階級本來也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他們也曾經領導過光榮的革命鬥爭，也會經在革命中起過主要的或部份的領導作用，例如：辛亥革命、北伐戰爭與當前的抗日戰爭。但是他們曾經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年這一個長時期內勾結帝國主義，並與地主階級組成反動同盟，背叛了曾經援助過他們的朋友——共產黨、無產階級、農民階級與其他小資產階級，背叛了中國革命，變成了人民的公敵，造成了革命的失敗。所以，當時革命的人民與革命的政黨（共產黨），曾經不得不把資產階級也當作革命對象之一。在抗日戰爭中，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一部分，以汪精衛為代表，已經叛變，已經變成漢奸，所以抗日的人民也已經不得不把這些背叛民族利益的大資產階級分子當作革命對象之一。

由此，也可以明白，中國革命的敵人是非常強大的。中國革命的敵人不但有強大的帝國主義，而且還有強大的半封建勢力，而且在一定時期內還有勾結帝國主義與半封建勢力以與人民為敵的資產階級，因此，那種輕視中國革命敵人力量與觀點是不正確的……。

——毛澤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第二章，「毛選」卷二

地主階級是封建制度的代表，是帝國主義與半封建中國的主要社會基礎。是剝削農民和壓迫農民的階級，是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阻礙中國向前發展的總利益的階級。

因此，作為階級來說，地主階級是革命的對象，而不革命的動力。

但是地主階級中，最反動的是大地主階層。至於中小地主，特別是破產與半破產的小地主，則有比較不同的情形。當革命還是反對封建主義與大地主時，他們往往是能够保守中立或暫時參加鬥爭的。尤其是從這個階層出身而受過科學教育的知識份子，很多都能够這樣做。……

（毛澤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第二章，「毛選」卷二）

既然現階段上中國革命的敵人主要是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那末，現階段上中國革命的任務是什麼呢？

毫無疑義，主要的就是打倒這兩個敵人，就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對內推翻封建殘餘壓迫的民主革命，而首先的任務便是打倒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

中國革命的兩大任務，是互相關聯的。如果不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就不能消滅封建殘餘，因為帝國主義是封建殘餘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如果不消滅封建殘餘，也不能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因為封建殘餘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主要社會基礎。所以，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這樣兩個基本任務是互相分別，又是互相統一的。

（毛澤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第二章，「毛選」卷二）

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農工政策的三民主義。不要農工政策，不真心實意的扶助農工，不實行「整理地畝」上的一「超農民家」，那就是準備革命失敗，也就是準備自己失敗。斯大林說：「殖民地的地畝問題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這就是說，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現在的抗日，實質上是農民的抗日。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實質上就是授權給農民，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主義。大眾文化，實質上就是提高農民文化。抗日戰爭，實質上就是農民戰爭。現在是「上山主義」，大家都在山頭上。開會、辦事、上課、出報、著書、演劇，都在山頭上，實質上都是農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實質上都是農民所給。說「實質上

，就是說基本上，並非忽視其他部份，這是斯大林自己解釋過的。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這是小學生的常識，大城市失陷後，更不止百分之八十了。因此農民問題，就成了中國革命的基  
本問題，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第十節，「毛選」卷二）

農民——這是中國工人的前身，將來還要有幾千萬農民進入城市，進入工廠。如果中國需要建設強大的民族工業，建設很多的近代式的大城市，就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長過程。

農民——這是中國工業的市場，只有他們能夠供給最豐富的糧食、原料與吸收最廣大的工業品

。農民——這是軍隊的來源，士兵就是穿起軍服的農民，他們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敵。

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民主政治的主要基礎。中國的民主主義者如不依靠三萬萬六千萬農民羣衆的援助，他們就將一事無成。

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文化運動的主要基礎。所謂掃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眾文藝，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萬萬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

我說的「主要基礎」，當然不是忽視其他約佔人口九千萬的人民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視在中國人民中政治上最覺悟與具有領導一切民主運動資格的工人階級，這是不應該發生誤會的。

認識這一切，不但中國共產黨人，而且一切民主派，都是完全必要的。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選」卷二）

### (三) 毛澤東論中國必須實行土地改革、解

#### 放農民及在解決農民生問題

#### 上的兩條路線

在中國建立這樣的共和國，它在政治上是新民主主義的，在經濟上也是新民主主義的。

它將採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及少地的農民，實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係。但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而是變為農民的私產。農村的富農經濟，也是容許其存在的。這就是「平均地權」的方針。這個方針的正確的口號，就是「耕者有其田」的口號。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第六節，「毛選」卷二）

爲着消滅旧大資產者與建設新中國，必須實行土地改革、解放農民。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是目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時代的正確主張。

爲什麼把目前時代的革命叫做「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這就是說，這個革命的對象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而是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這個革命的一切設施，不是一般的廢除私有財產，而是一般的保護私有財產，這個革命的結果，將爲資本主義掃清道路而使之獲得發展。「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裡轉移到農民手裡，變爲農民的私有財產，使農民從封建的土地關係上獲

的解放，使農業從舊式的落後水平進到近代化的水平，從而使工業獲得市場，造成了將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可能性。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是一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主張，並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主張，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張，並不單是我們共產黨人的主張。所不同的是，在國內條件下，只有我們共產黨人把這項主張看得特別認真，不但口講，而且實做。那些人們是革命民主派呢？除了無產階級是最徹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農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農民的絕對大多數，總是說，除開那些帶上了封建尾巴的一部份富農之外，無不積極的要求「耕者有其田」。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革命民主派，「耕者有其田」使農業生產力獲得發展，對於他們是有利的。自由資產階級是一個動搖的階級，他們需要市場，他們也贊成「耕者有其田」，他們多半和土地聯系着，他們中的許多人又懼怕「耕者有其田」。所以反對「耕者有其田」的是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因為他們是代表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級的。中國沒有單獨代表農民的政黨。自由資產階級的政黨沒有堅決的土地綱領。因此，只有具備了堅決的土地綱領，為農民利益而認真奮鬥，因而獲得最廣大農民羣衆作為自己偉大同盟軍的中國共產黨人，成了一切農民與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領導者。

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六年，中國共產黨執行了孫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出而張牙舞爪，進行了十年反人民戰爭，亦即反「耕者有其田」的戰爭的，就是那個集中了孫中山先生一切不肖子孫在內的團體——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

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讓了一大步，將「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為減租減息政策。這個讓步是正確的，推動了國民黨參加抗日，又使解放區的地主與農民聯合起來反對日本侵略者。這個政策如果沒有特殊阻礙，我們準備在戰後繼續下去，首先在全國實現減租減息，然後尋我適當方法，有步驟地達到「耕者有其田」。

但是背叛孫先生的人們不但反對「耕者有其田」，連減租減息也反對。國民黨政府自己頒佈的「

二五號社二類法令，自己不實行，僅僅在中國解放區實行了，因此也就成立了罪狀：名之曰「奸區」。

在抗戰期間，出現了所謂民族階級與民主民生階級的兩端毀論，這是錯誤的。

大戰當前，民主民生不該提起。等日本人走了再提好了——這是國民黨反人民集團的謬論，其目的是不願抗日戰爭獲得徹底勝利。有些人居然隨聲附和，不自覺的作了這種謬論的尾巴。

大戰當前，不解決民主民生就不能趕走日本人——這是中國革命民主派的正論，為整個中國近代史，尤其是八年抗戰史所證明，也為法蘭西、意大利、波蘭、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等國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所證明。在波蘭等國所執行的，不是如我們的減租減息，而是「耕者有其田」。

在抗日期間，一切服從抗日，減租減息及一切民主改革是為着抗日的，不是自己孤立起來的。為着團結一切社會階級反對共同敵人，不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權，並適當地交租交息，獎勵地主的資本向工業方面轉移，同時，更使開明紳士和其他人民的代表一道參加社會工作與政府工作。對於富農，則鼓勵其發展生產。所有這些，是在堅決執行農村民主改革的路線裡面包含着的，是完全必要的。

兩條路線：或者堅決反對中國農民解放民主民生問題，而使自己腐敗無能，無力抗日。或者堅決贊助中國農民解決民主民生問題，而使自己獲得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最偉大的同盟軍，藉以組織雄厚的戰國力量。前者就是國民黨政府的路線，後者就是中國解放區的路線。

動搖於兩者之間，口稱贊助農民，但不堅決實行減租減息，武裝農民與建立農村民主政權，這是機會主義者的路線。

國民黨反人民集團動員一切力量，向着中國共產黨放出了一切惡毒的箭：明的和暗的，軍事的和政治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兩黨的爭論，就其社會性質說來，實質上是在農村關係的問題上。我們

究竟在那一點上觸怒了國民黨反人民集團呢？難道不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面嗎？國民黨反人民集團之所以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歡迎與鼓勵，難道不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面，給日本侵略者幫了大忙嗎？所謂「共產黨破壞抗戰、危害國家」，所謂「奸黨」、「奸軍」、「奸區」，所謂「不服從政令、軍令」，難道不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在這個問題上做了真正符合於民族利益的認真的事業嗎？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選」卷二

#### （四）

### 毛澤東論新民主主義的農業發展道

### 路——在個體經濟基礎上實行勞動互

### 助，以提高生產力

土地制度獲得改革，甚至僅獲得初步的改革，例如減租減息之後，農民的生產與興趣增加了。然後幫助農民在自願原則下，逐漸的組織在農業生產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生產力就會發展起來。這種農業生產合作社，現時還只能是建立在農民個體經濟基礎上的（農民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的合作互助的勞動組織，例如變工隊、互助組、換工班之類，但是生產力的發展與生產量的增加，已屬驚人。這種制度，已成為中國解放區的普遍的制度。今後應當儘量推廣。

這裡應當指出一點，就是說，變工隊一類的合作組織，原來在農民中就有的，但在那時，不過是農民悲慘生活的表現。現在中國解放區的變工隊，形式與內容都起了變化，它是農民群眾為着發展自己的生產力，爭取富強生活的表現。中國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

「填、穴、小、溝、鑽、到、底、看、其、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這、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澈、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實、行、土、地、改、革、解、放、農、民、發、展、現、代、工、業、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新、中、國、只、有、這、一、切、才、能、使、華、國、社、會、生、產、力、得、解、放、才、是、華、國、人、民、所、迎、歡、的。」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選」卷二）

今年邊區在發展生產上，又來了一個革命，這就是用合作社方式，把公私勞動力組織起來，發動了群眾生產的積極性，提高了勞動效率，大大發展了生產。

過去，束縛邊區生產力使之不能發展的，是邊區的封建剝削關係，一半地區經過土地革命，把這種封建束縛打破了；一半地區經過減租減息之後，封建束縛減弱了。這樣合起來，整個邊區就破壞了封建剝削關係的一大半，這是第一個革命。

但是，如果不從個體勞動轉移到集體勞動的生產方式的改革，則生產力還不能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因此，建設在以個體經濟為基礎（不破壞個體的私有財產基礎）的勞動互助組織，即農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就是非常需要了，只有這樣，生產力才可以大大提高。現在陝甘寧邊區的經驗：一般的變工扎工勞動是二人可抵三人，模範的變工扎工勞動是一人可抵二人，甚至二人以上。如果全體農民的勞動力都組織在集體互助勞動之中，那末，現有全邊區的生產力就可提高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百。這辦法，可以行之於各抗日根據地，將來可以行之於全國。這在中國經濟史上，是要大書特書的。這樣的改革，生產工具根本沒有變化，生產的成果也不是歸公而是歸私的，但人與人的生產關係變化了，這就是生產制度上的革命，這是第二個革命。

（毛澤東：「論聯合社」，「毛選」卷五）

由於是農村，農民是分散的個體生產者，使用着落後的生產工具，受着封建的剝削剝削。爲了

提高生產興趣與生產力，我們就採取減租減息與組織互助兩個方針。減租提高了農民的生產興趣，互助提高了農民的生產力。我已得到華北華中各地的材料，這些材料都說：減租之後，農民興趣大增，願意組織如同我們這裡的變工隊一樣的互助團體，三個人當成了四個人。如果是這樣，九千萬人就當成了一萬萬二千萬人。還有兩個人當成三個人的。如果不採取「強迫命令，欲速不達」的方針，而採取「耐心說服，典型示範」的方針，那麼，幾年之內，就可能使大多數或全體農民都組織在農業生產的與手工業生產的互助團體裡面。這種生產團體，一經成為習慣，不但生產量大增，各種創造都出來了，政治也會提高，文化也會進步，衛生也會講究，流氓也會改造，風俗也會改變，不要很久，生產工具也會改良，到了那時，我們的農村社會，就會建立在新的生產力上面了。

（毛澤東：「兩三年內完全學會經濟工作」，「毛選」卷五）

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於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在邊區，我們現在已經組織了許多的農民合作社，不過還不是蘇聯式的，被稱為集體農莊的那種合作社。我們的經濟是新民主主義的，我們的合作社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勞動。這又是幾種樣式。一種是「變工隊」、一種是「扎工隊」、一種是「唐將班子」這一類的農業勞動互助組織，從前江西蘇區叫做勞動互助社，又叫耕田隊，現在前方有些地方也叫互助社。無論叫什麼名稱，無論每一單位的人數是幾個人的，幾十個人的，幾百個人的，又無論單是由金勞動力組成的，或有半勞動力參加的，又無論實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繁忙時，竟至集體吃飯住宿，也無論是臨時性的，還是永久性的，總之，只要是群眾自願參加（決不能強迫）的集體互助組織，就是好的。這種集體互助的辦法是群眾自己發明出來的，從前我們在江西綜合了群眾的經驗，這次我們在陝北又綜合了這樣的經驗，經過去年歲

耕作的提倡，今年一年的實行，就大為條理化和普遍化。今年邊區有許多變工隊，實行農體的耕種，翻草、收割，收成比去年多了一倍，簡直是百分之二百。群眾看見了這樣大的實效，明年一定有更多的人實行這個辦法。我們現在不希望到明年一年就把全邊區的幾十萬個全勞動力與半勞動力都組織到合作社裡去，但是在幾年之內是可能達到這個目的的。婦女群眾也要全部動員參加一定分量的生產。所有二流子都要得到改造，參加生產，變成好人。在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上，都應該廣泛組織這種集體互助的生產合作社。

（毛澤東：《組織起來》，《毛選》卷五）



# (一)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毛澤東

(一九二七年三月，在《指導週報》及《中央副刊》上發表)

## 一 農村革命

### 農民問題的嚴重

我這回實地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從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計三十二天，在鄉下、在縣城召集有經驗的農民及農運同志開調查會，仔細聽他們報告，所得材料，頗為不少。許多農運的道理，與在漢口、長沙從紳士階級聽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許多奇事，則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我想這些情形，全中國無論何省都有，所以，各種反對農運的議論，都必須迅速的矯正；革命當局各種對農運的錯誤處置，必須迅速的變更。這纔才於革命前途所有補益。因為目前農運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及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壓抑不住。他們將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最後葬入墳墓。『獨革命的黨、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腳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於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的命運將強迫你迅速的選擇罷了。』茲將我的考察和我的意見，逐段寫出，作為革命同志的參考。

### 組織起來

湖南農運，自湘中、湘南已發達各縣來說，大約分爲兩個時期：去年一月至九月爲第一時期，即組織時期。此時期內，一月至六月爲秘密時期，七月至九月革命軍驅趙爲公開時期。此時期農會會員人數總計不過三四十萬，能直接指揮的群眾也不過百餘萬，在農村中還沒有什麼鬭爭，因此各界對它也沒有什麼批評。因農會會員能作嚮導，作偵探，作挑夫，軍官們還有說幾句好話的。十月至今年一月爲第二時期，即革命時期。農會會員激增至二百萬，能直接指揮的群眾增加到一千萬（農民入農會大多數每家只上一個人的名字，故會員二百萬，群眾便計一千萬）。在湖南農民全數中，差不多組織了一半，如湘潭、湘鄉、瀏陽、長沙、醴陵、寧鄉、平江、湘陰、衡山、衡陽、耒陽、郴縣、安化等縣，差不多全體農民都到了農會的組織中，都立在農會指揮之下。農民既已有了廣大的組織，便開始行動起來，於是在四個月中造成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

### 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力歸農會

農民有了組織，便行動起來。他們主要攻擊的目標，爲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思想制度，城裡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這個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他們的體面威風，掃地以盡。紳士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說到了「一切權力歸農會」。連兩公婆扯皮的小事，都要到農民協會去解決。一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到場，便不能解決，農會的人在會場裡放個屁也是響的。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說農會好，不能說農會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停止了他們的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在農會威力之下，土豪劣紳們頭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紳崽子則在鄉裡向農會投降。

「我出十塊錢，請你們准我進農民協會！」小劣紳說。

「噫！誰要你的臭錢！」農民的回答。

好些中外地主，富農乃至中農，從前反對農會的。此刻求入農會不可得。我到各處，常常遇到這種人，遠遠向我求情：「請省裡來的委員作保！」

前鎮地方進了口糧，有正冊、另冊二種，好人人正冊，匪盜等壞人入另冊。現在有些地方的農民，便拿了錢那些從前反農會的人：「把他們入另冊！」

那些人怕入另冊，便多方設法求入農會，一心要想把他的名子上進那農會的冊子去才放心。農會往往嚴厲拒絕，所以他們總是懸心吊膽的過日子，躲在農會的門外，好像無家可歸的樣子，鄉裡話叫做「打零」！總之，四個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謂「農民會」，現在却變成頂榮耀的東西。從前拜倒在紳士下的人，現在都拜倒在農民權力之下。無論什麼人，都承認去年十月以前與十月以後是兩個世界。

糟得很與好得很

農民在鄉裡造反，攪亂了紳士們的噩夢。鄉裡消息傳到城裡來，城裡的紳士就立刻跟着大譁。我到長沙時，會到各方面的人，聽到許多的獨談着議。從中層以上社會乃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罷，受了那班滿城風雨的「糟得很」派議論的壓迫，他閉眼一想鄉村情狀，也居然氣餒起來。沒有法子否認這「糟」字。很進步的人也只是說：「這是革命過程中應有的事，雖則是糟！」總而言之，無論什麼人都無法完全否認這「糟」字。實在呢？如前頭所說，乃廣大的農民群衆，起來完成他們歷史的使命，乃鄉村的民主勢力起來，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這

備有組織與實力，乃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像而沒有權到  
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都做到了。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乃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  
，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腳。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來會成就過的奇勳。這是「好得很」。完全  
沒有什麼「糟」，完全不是什麼「糟得很」。論功行賞，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績作十分，則市民  
及軍事的功績只佔三分，農民在鄉村革命的功績要佔七分。「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  
擊農民起來的理論，明明是地主階級企圖保存封建舊秩序，阻礙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革  
命的理論。每個革命的同志，都不應該跟着瞎說。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  
裡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無數萬成群的奴隸——農民，在那裡打翻他們的  
吃人的仇敵。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好得很」是農民及其他革命派的  
理論。一切革命同志須知：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  
現在有了一個變動，乃革命完成的重要原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是反革命。

### 「過分」的問題

又有一般人說：「農會雖要辦，但現在農會的舉動未免太過分了。」這是中派的議論。實際怎樣  
呢？的確的，農民在鄉裡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敲風掃光。這  
等於特地注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造出「有土必豪無紳不劣」的話，有些地方甚至五十畝田的也  
叫他土豪，架長擔子的也叫他劣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勒索捐款，打鬻子。若是反對農會  
的土豪劣紳家裡，一幫人滾進去，殺豬出穀。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動  
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  
象，這就是一般人所謂「過分」，所謂「矯枉過正」。所謂「未免太不成話」，這派議論繞以有罪。

其實也是錯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自己逼出來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壓迫農民的權利，踐踏農民，農民才有這種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爲惡最甚的地方。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個劣紳，誰個不劣，誰最壞，誰個稍好，誰個總要變，誰個處前從轉，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的極少。所以唐孟憲先生也說：「農民在鄉下揭土豪劣紳，十個有九個是對的。」第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交價彬彬，那樣一盞具恭儉讓一。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權力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農民群眾，以形成這個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過分的舉動，都是農民在農村中由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這些舉動，在農民運動第二時期（革命時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時期內，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大權力，必須不准人批評農會，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所有一切過分的舉動，在第二時期都有革命的意義。實質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間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不鎮壓必須過重，不過重不能鎮壓。這派的議論，表面與前一派不同，但實質與前一派同站在一個觀點上，依然是維護特權階級利益的地主理論。這種理論，阻礙農民運動的興起，其結果破壞了革命。我們不能不堅決的與這種

## 二 革命先鋒

### 痞子運動

國民黨右派說：「農民運動乃痞子運動，乃藉農運動。」這種議論，在長沙頗盛行。我們到鄉下

，其精神與實質，農協會可以與，但現在農協會不行，要發大議論，這種議論，與在波的話是二意，都是說農運可做（因農運已起來，無人敢說不可做），但現在做農運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級農民協會辦事人，說他們都是些「痞子」。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皮鞋的，談爛傘子的，穿絨長褲子的，瞎鏡打腳的，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紳士們打在泥溝裡，在社會上沒有立足地位，完全剝奪了發言權的人，現在居然伸起頭來了，不但伸起頭，而且掌權了。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協之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發他們手裡弄成很兇的東西了。他們舉起他們那粗黑的拳頭，加着紳士頭上的，他們用繩子捆綁了劣紳，給他戴上高帽子，穿着綉綉的湘潭、湘鄉叫遊園，醜態百出，他在那粗黑無情地斥責，每天都有些送進紳士們的耳朵裡去。他們發號施令，指揮一切。他們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 革命先鋒或革命元勳

二件事或一種人，有相反的兩種看法，便出來相反的兩種議論。一「痞子」與「好得狠」是一例，「痞子」與「革命先鋒」又是一例。前面說了農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業，農民做了國民革命的主要工作，但這種革命大業，革命主要工作，是不是農民全體做的呢？不是的。農民中有富農，有中農，有貧農三種。三種狀況各不同，對於革命觀念也各別。富農（有錢餘，有錢剩的，叫富農）耳裡聽得的是江西一狀如水，聽作石打傷了脚，坐飛機回國來了，吳佩孚重新佔了岳州，農民協會必定立不人，三民主義也興不起，因為這是所謂從來沒有的東西。鄉農民協會的辦事人（多叫「痞子」之類），拿了農會的冊子，跨進富農的大門，對富農說：「請你進農民協會。」富農的回答：「農民協會？我在这裡住了幾十年，種了幾十年田，沒有看見什麼農民協會，也吃飯。我勸你們不要的好！」什麼中農度好點的話說。什麼農民協會，砍腦殼會，莫害人！富農中態度惡劣

的說。新充得很，農民協會居然成立了好幾個月，而且敢於反對紳士。鄰近的紳士因為不肯繳鴉片捐，被農民協會捉了去遊鄉，縣城裡並且殺了大紳士（如湘潭的晏容秋，寧鄉的楊致澤）。十月革命紀念大會，反英大會，北伐勝利總慶祝，上萬的農民舉起大小旗幟，雜以扁担鋤頭，浩浩蕩蕩的出隊示威，當農心裡才開始惶恐起來。在北伐勝利總慶祝中，他們聽見說九江都打開了，蔣介石沒有傷脚，吳佩孚究竟打敗了。而且「三民主義萬歲」，「農民協會萬歲」，「農民萬歲」等等，明明的寫在「紅紙告示」（標語）上面。

「農民萬歲，這些人也算作萬歲麼？」富農表示很大的懷疑。農會於是神氣十足了。農會的人對富農說：

「把你們入另那！」

「再過一個月，入會的每人會費十塊錢！」

在這樣的形勢與威脅之下，富農才慢慢的進了農會，有些是繳過五角錢或一塊錢（本來只要一百錢）入會費的，有些是託人說情才進了農會允許的。亦有好些頑固黨，至今還沒有入農會。富農入會後，多把他家裡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子到農會去上一個名字，因為他們始終怕抽了。入會後，也並不熱心幹農會的事，他們的態度始終是消極的。中農呢？（沒有餘錢剩米，也不欠賬，每年保得衣食住的，叫中農）中農的態度是游疑的，他們想到革命與他們沒有什麼大的好處。他們鍋裡有米煮，沒有人半夜裡敲門來討賬。他們也根據從來沒有有的道理，獨自皺着眉頭在那裡想：「農民協會果然立得起來麼？」「三民主義果然與得起來麼？」他們的結論是：「怕未必！」他們以為這全決於天意：「農民會……聽得天意順不順？」在第一時期內農會的人拿了冊子，進了中農的門，對着中農說道：「請你加入農民協會！」「莫性急啦！」中農這樣回答。一直到第二時期，農會勢力大盛，中農方加入農會。他們在農會雖比富農要好，但始終不能積極，仍然保存他們那種游疑的軌跡。鄉村中一向

苦戰奮鬥的，只有一種人。就是豪紳。從秘密時期起，一直到公開時期，都是他們在那裡奮鬥。報紙也是他們在那裡組織，革命也是他們在那裡革命。只有他們與土豪劣紳是死對頭，他們毫不退讓的與土豪劣紳奮鬥到底，一切壞的工作都只有他們做得出。他們對於富農中農說：

「我們早進了農會，你們為什麼還遲疑？」

富農或中農帶着譏笑的腔調說道：

「你們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有什麼不進農會！」

的確，貧農們不怕失掉什麼，他們是農村中生活落伍或半落伍的，他們中間之一些，確實是「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他們有什麼不進農會？據長沙的調查：貧農佔百分之七十，中農佔百分之二十，富農佔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貧農中，又分赤貧、次貧二類。全然無業，即既無土地，又無資本，完全失去生活根據，不得不出外當兵，或出外做工，或打流當乞丐，或為非作歹做盜賊的，都是「赤貧」，佔七十分之二十。半無業，即畧有土地或畧有資本，但吃的多，收的少，終年在勞碌愁苦中過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農（富佃除外）、半自耕農等，都是「次貧」，佔七十分之五十（貧農數目，他縣或沒有長沙還多，但相差當不大遠）。這個貧農大群眾，乃農民協會的中堅，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勳。沒有貧農階級（照紳士的話說，沒有「痞子」），決不能造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貧農（特別是赤貧部份），因為最革命，所以他們取得農會的領導權，所有最下一級農協（即鄉協）的委員長、委員，在第二、第三兩個時期中幾乎全數是他們。（衡山縣鄉協職員，赤貧階級佔百分之五十，次貧階級佔百分之四十，窮苦知識分子佔百分之十）。這個貧農階級，是非常之需要的。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他們革命大方向始終沒有錯。他們損傷了土豪劣紳的體面。他們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紳在地上，並且踏上一隻腳。他們在革命期內的許多「過分」舉動，實

在正是革命的需要。湖南有些縣的縣政府、縣黨部與縣農會，已經做了若干錯處，竟有循地主之見，派兵拘捕下級農會職員的。衡山、湘鄉二縣的監獄裡，關了好多個鄉農協會委員長、委員，這個錯誤非常之大，無意中助長了反動派的氣焰。只要看拘捕了農協委員長、委員，當地的不法地主們便太高興，反動空氣便大增高，就知道這事是不錯誤。我們要反對那些「痞子運動」、「倍農運動」的反革命口號，同時尤要注意不做幫助土豪劣紳（雖然是無意的）打擊貧農領袖的行動。事實上，貧農領袖中，從前雖有些確是「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但現在多數都變好了。他們自己在那裡努力斃牌賭博、清盜匪。農會勢盛，地方牌賭禁絕，匪患潛蹤。有些地方真個這不拾遺，夜不閉戶。據衡山的調查，貧農領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變得很好，很能幹，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習慣。這只能叫他「少數不良分子」，決不能跟着土豪劣紳的口白，籠統的罵「痞子」。對於這些「少數不良分子」，只能在「農會盛頓紀律」的口號之下，對他們的籍眾宣傳，對他們本人訓練，去把農會鞏固紀律弄好，決不能隨便派兵捉人，損失貧農階級的信心，延長土豪劣紳的氣勢。這一點是非常要注意的。

## (一) 『農村調查』序言

毛澤東

這個材料延至今天才付印，但專部調查又遺失了。

現在黨的政策，不是內戰時期那樣的土地革命政策，而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全黨應該執行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及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指示，應該執行即將到來的七次大會的指示。所以印這個材料，一為保存歷史陳跡，二為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現在我們的同志，很多還保存着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裡想發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現數。對於中國各個社會階層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

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層的生動情況。普通調查是不可能也不需要，有意識有計劃的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方法，只有這樣，才使我們具有對中國問題的最基礎知識。

要做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與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事情的。

第二是開調查會，東張西望，道聽塗說，決然得不到什麼完全的知識。我用開調查會的方法得來的材料，湖南一個，井岡山一個，早失掉了。尋鄖調查帶到延安，又不見了。這裡印的，主要是一個與國調查，一個長岡鄉調查與一個才溪鄉調查，閱者單看這三個，就可知道如何找到材料的方法。開調查會是最簡單易行又最忠實可靠的方法，我用這個方法得了很大的益處，這是比較什麼大舉還要高明的學校。到會的人，應是真正有經驗的中級下級幹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縣調查及井岡山兩縣調查，找的是各縣中級負責幹部，尋鄖調查找的是二部份中級幹部，一部份下級幹部，一個窮了的老秀才，一個破了產的商會長。一個知縣衙門管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他們都給了我很多聞所未聞的知識。使我第一次獲得中國監獄全部腐敗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縣作調查時，一個該縣的小獄吏。與國的調查與長岡、才溪兩鄉調查，我的是鄉級工作同志與普通農民。這些幹部、農民、秀才、獄吏、商人與錢糧師爺，就是我的被愛的先生，我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與採取同志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開調查會每次人不必多，三五個七八個人即好，必須給與時間，必須有調查綱目，還必須自己口開手寫，並同到會人展開討論。因此，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與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成的。

。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是往往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我再度申明：出版這個黨內參考材料之主要目的，在於指出一個如何了解下層情況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們去記那些具體材料及其結論。一般的說，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還沒有來得及也永遠不可能留我們預備完全的甚至起碼的材料，如同歐美日本資產階級那樣。所以，我們自己非做搜集工作不可。特殊的說，實際工作者須隨時去了解變化着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也不能依靠別人預備的。所以，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與實際相聯系。「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曾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却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發有言權的。有許多人，「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的發議論，提意見，這也揚評，那也指摘，其實這種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的。因為這種議論或批評，沒有經過周密調查，不過是無知妄說，我們黨吃所謂「欽差大臣」的虧，是不可勝數的。而這種「欽差大臣」乃是滿天飛，幾乎到處都有。依然是斯大林的話說得對：「不與實際相聯系的理論只是空洞的理論」。當然又是他的話對：「不與理論相聯系的實際也只是盲目的實際」。除了盲目的、無前途的、無遠見的實際家，是不能叫做「狹隘經驗論」的。

我現在還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國事情與國際事情的必要，是與我自己對於中國事情與國際事情依然還只是一知半解，這種事實相聯聯的，並非說我是什麼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慳得。和全黨同志們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願。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

（完）



馬恩列斯毛

論農民土地問題

編輯者 土地問題研究會

出版者 太岳新華書店

發行者 太岳新華書店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出版

